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7年第6期 总第18期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7 年第 6 期 • 总第 18 期)

顾问: 叶兴国

主编: 罗玉英

副主编: 谢丹迎 王群

编辑: 田文夫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胡灏

责任编辑: 谢 蓉

制作: 艾 致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目 录

一、经贸动态

9 月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1
专家表示 9 月份贸易顺差回落 “拐点”尚未显现.....	7
世界竞争力格局—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最新结果分析....	8
9 月高层要论.....	13

二、金融动态

美国次级债市场的现状及其深远影响.....	18
全球大银行因信贷市场动荡损失惨重.....	22
格林斯潘: 信贷危机影响可能在第四季度显现—CNBC.....	23
巴曙松: 人民币国际化起点和趋势.....	23
全面“通胀时代”是否已经来临?	25
中国保留对股市进行干预的权利	28
吹不破的中国“泡沫”?	29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再攀新高.....	30
《货币战争》: 中国版的“阴谋论”?	31
《动荡年代》中的格林斯潘.....	32

三、商务英语动态

The Key for Successful Reader-writer Interaction: Factors Affec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L2 Revisited.....	35
The TOEIC Game.....	49

四、法学动态

修改刑法打击贿赂犯罪的五项建议.....	51
新刑法典施行十年来立法分析.....	55
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58
反倾销的滥用及其贸易保护主义效应.....	62
法科研究生的学习研究方法和为人生活态度.....	66

五、高教动态

教育部关于开展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的通知.....	68
教育部长周济: 坚持教育公益性 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69
外校生鸠占鹊巢 大学更应该大气.....	71
大学变衙门, 导师自然有问题.....	72
高校就业率的“真实性”从何而来?	73
细数大学生争奖学金怪现状 功利主义腐蚀象牙塔.....	74
经济学家温元凯: 大学生在校创业九成会失败.....	77
南大联手旅游集团 今后学生可到港澳实习.....	78
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启示.....	79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经贸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本期要目

- 9 月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 专家表示 9 月份贸易顺差回落“拐点”尚未显现
- 世界竞争力格局—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最新结果分析
- 9 月高层要论

2007 年 10 月

第 6 期[总第十八期]

月度
分析
报告

2007 年 9 月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2007-10-8 来源：国研网

1. 工业生产

1-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4%，同比加快 1.1 个百分点。8 月份当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增加值小幅回落，同比增长 17.5%，增速比上月减缓 0.5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8.52%，同比下降 0.28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共实现出口交货值 6178 亿元，同比增长 20.1%。

从增长角度看，工业增加值继续回落，其中，轻工业增幅回落较多。8 月轻、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4.6% 和 18.8%，增速比上月减缓 1.3 个和 0.1 个百分点。1-8 月，轻、重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 和 19.4%，同比加快 0.7 个和 1.1 个百分点。

从主要行业看，纺织业增长 14.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9.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21.9%，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19.0%，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2.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28.4%，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 20.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8.5%，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3.9%。

从主要产品看，原煤、原油和发电量分别为 1.94 亿吨、1591 万吨和 2990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8.2%、2.3% 和 15.0%；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4080 万吨、4158 万吨和 4827 万吨，分别增长 15.9%、13.6% 和 23.7%；水泥 1.21 亿吨，增长 13.3%；汽车 66 万辆，增长 21.7%，其中轿车 37 万辆，增长 17.1%。

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增幅回落。当月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0.1%，增幅比上月回落 2.1 个百分点，同比回落 3.8 个百分点。1-8 月，工业出口交货值 45412 亿元，增长 21.9%，同比回落 2 个百分点。

工业产品销售率有所下降。当月全国工业产品销售率 98.5%，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1-8 月，产销率 97.8%，与去年同期持平。

8 月份数据显示，1-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比 1-7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本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比 7 月减缓 0.5 个百分点，总体看，工业生产有缓慢回落的趋势。

图 1：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率（%） 1999 年 8 月—2007 年 8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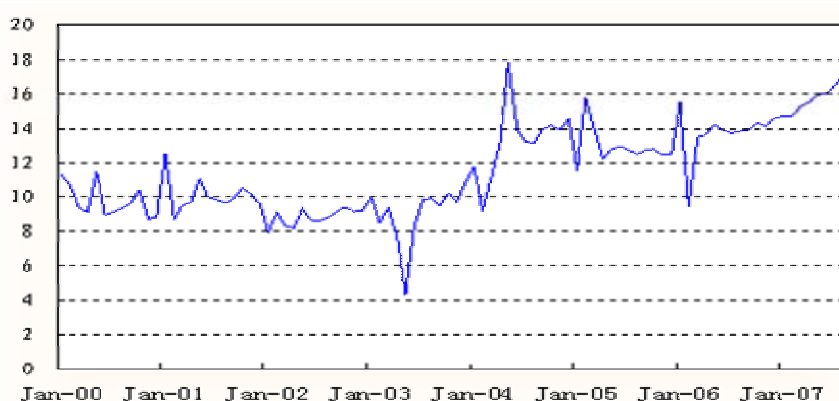
2. 社会消费

1-8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159亿元,同比增长15.7%,增幅再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其中8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17亿元,同比增长17.1%,与7月份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绝对额上升119亿元。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4855亿元,同比增长17.6%,县及县以下零售额2261亿元,增长16.1%。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5973亿元,同比增长17.2%;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985亿元,增长19.1%;其他行业零售额158亿元,增长3.9%,变化幅度与7月份相比不大。

分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吃、穿、用商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6.3%、25.7%和24.6%。其中,粮油类增长44.0%,肉禽蛋类增长45.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25.7%,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9.7%,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30.0%,日用品类增长26.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9.2%,家具类增长29.5%,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7.1%,化妆品类增长23.7%,金银珠宝类增长53.3%,通讯器材类增长5.3%,汽车类增长42.3%,石油及制品类增长15.4%。

图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

1999年8月—2007年8月



3. 固定资产投资

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66659亿元,同比增长26.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28777亿元,增长16.7%;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4277亿元,增长29.0%。





从项目隶属关系看,中央项目投资 6435 亿元,同比增长 13.2%;地方项目投资 60224 亿元,增长 28.4%。

从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 783 亿元、29626 亿元和 3625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2.9%、29.5%和 24.3%。

从行业看,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 908 亿元,同比增长 2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 1081 亿元,增长 10.5%;非金属矿制品业投资 1621 亿元,增长 49.6%;黑色金属矿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 1499 亿元,增长 12.9%;有色金属矿采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 741 亿元,增长 29.2%;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 4607 亿元,增长 11.5%;铁路运输业投资 1193 亿元,增长 3.4%。

从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投资 59093 亿元,同比增长 27.0%;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分别完成 3224 亿元和 3976 亿元,分别增长 32.5%和 17.1%。

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截止到 8 月底,城镇 50 万元以上施工项目累计 237000 个,同比增加 29286 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211981 亿元,同比增长 17.9%;新开工项目 149751 个,同比增加 18665 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51942 亿元,同比增长 16.7%。

从到位资金情况看,城镇投资到位资金 76778 亿元,同比增长 27.1%。其中,国内贷款增长 12.7%,利用外资增长 16.3%,自筹资金增长 32.2%。

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截止到 8 月底,城镇 50 万元以上施工项目累计 23.7000 个,同比增加 29286 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211981 亿元,同比增长 17.9%;新开工项目 149751 个,同比增加 18665 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51942 亿元,同比增长 16.7%。

从到位资金情况看,城镇投资到位资金 76778 亿元,同比增长 27.1%。其中,国内贷款增长 12.7%,利用外资增长 16.3%,自筹资金增长 32.2%。

1-8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9.1%,比 1-7 月下降 1.4 个百分点,比 1-6 月下降 2.2 个百分点,而 1-3 月数据为目前今年最高水平 32.7%。但是 1-8 月指标比去年同期增速高 0.6 个百分点,而 1-7 月比去年同期高 2.8 百分点,1-6 月比去年同期高 2.5 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认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从项目隶属来看,中央项目反而有增加,而地方项目有所下降;从产业来看,一、二、三产业都有所下降;从行业来看,除大幅上升的铁路运输业和小幅上升的有色金属外,其他行业的投资均有下降,其中煤炭下降达 6.2 个百分点。综合以上表现,可以认为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图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 1999 年 1-8 月—2007 年 1-8 月



4. 对外贸易

8月份,我国出口总额1113.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7%,进口总额863.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1%,贸易顺差为249.8亿美元,顺差规模继续扩大,同比增长32.8%。

今年1—8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3697.1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7657.3亿美元,增长27.7%,比1—7月减缓0.9个百分点;进口6039.8亿美元,增长19.6%,比1—7月提高0.1个百分点。

虽然8月单月出口总值为历史新高,但增幅比1—7月放慢5.9个百分点,比7月份大幅回落11.5个百分点;当月进口创单月进口总值历史新高,比1—7月提高0.1个百分点,8月贸易顺差增长32.8%,比1—7月大幅减缓48.1个百分点。今年6月以来,国家通过采取加征出口关税、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扩大加工贸易限制类产品目录等手段连续对外贸政策进行调整。随着政策的落实到位,8月份当月我国出口速增开始回落,进口增速稳中趋升,外贸领域的宏观调控措施效果开始显现。8月份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值为1977.4亿美元,增长21.6%。其中当月出口1113.6亿美元,增长22.7%,单月出口总值为历史新高,但增幅比1—7月放慢5.9个百分点,比7月份大幅回落11.5个百分点;当月进口863.8亿美元,增长20.1%,创单月进口总值历史新高,比1—7月提高0.1个百分点。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为249.8亿美元,增长32.8%,比1—7月大幅减缓48.1个百分点。

图4: 出口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与进口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 1999年8月—2007年8月



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创1996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8.2%,高出7月份2.8个百分点;烟酒及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7%;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7%;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2.3%;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4.3%。而衣着类价格同比下降0.9%;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1.3%;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1.1%。

虽然涨幅之高让人有些意外,但分析其结构却在预料之中。与7月份相比,构成CPI的八大类产品都是五涨三降,核心CPI都是0.8%,而且,导致CPI上涨的因素都没有改变。食



品类价格上涨占了 5.9 个百分点, 在 CPI 涨幅中的比重为 90.8%。在食品中, 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又是主要推手, 上涨 49.0%, 推动 CPI 上涨 3.4 个百分点。

图 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同月=100)

1999 年 8 月—2007 年 8 月



6.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8 月份, 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6%, 涨幅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3.8%, 比上月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

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 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2%, 涨幅与 7 月份相同, 其中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出厂价分别上涨 3.9%、3.9%和 1.5%; 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5%, 其中食品类、衣着类、一般日用品类、耐用消费品类价格分别上涨 8.6%、1.2%、1.8%和下跌 0.5%。

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中, 8 月份燃料动力类、有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原料类购进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2.8%、6.0%和 3.1%, 黑色金属材料类上涨 5.8%。

分品种看: 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2%。成品油中的汽油和煤油出厂价格分别下降 5.3%和 0.3%, 柴油价格上涨 0.4%。

化工产品价格类中, 聚苯乙烯价格同比上涨 6.1%, 顺丁橡胶下降 0.6%, 涤纶长丝下降 2.3%。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8%。其中, 原煤出厂价格上涨 3.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7.0%。其中, 普通大型钢材价格上涨 7.0%, 普通中型钢材上涨 10.9%, 普通小型钢材上涨 11.2%, 线材上涨 4.6%, 中厚钢板上涨 7.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2.2%。其中, 铜、铝、铅、锌的出厂价格涨幅在 3.1%—43.7%之间。

此外, 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中, 燃料动力类、有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原料类购进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2.8%、6.0%和 3.1%, 黑色金属材料类上涨 5.8%。





从8月份工业生产数据涨幅止跌反弹来看,前几个月的食品价格上涨压力正在向下游生活资料行业传递。值得关注的是,8月份钢材价格上涨较快,尤其是普通大型和中型钢材,价格同比分别上涨7.0%和10.9%,明显高于7月份4.9%和6.3%的涨幅。而由于去年同期石油价格开始下跌,未来数月PPI涨幅可能继续攀升。

图6: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

1999年8月—2007年8月



7. 货币供应量

本月,货币供应量增长18.09%,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水平。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8.72万亿元,同比增长18.09%,增幅比上年末高1.15个百分点,比上月低0.3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4.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77%,增幅比上年末高5.29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1.83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2.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04%。今年1—8月累计净投放现金750亿元,同比多投放596亿元。

8月,人民币贷款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本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7.10万亿元,同比增长16.96%,比上月提高0.44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5.61万亿元,同比增长17.02%,增幅比上年末高1.95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0.39个百分点。

8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3029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1160亿元。从分部门看:居民户贷款增加1283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73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8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003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1746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42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59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153亿元;票据融资减少24亿元。1—8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08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5438亿元。8月末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为1971亿美元,同比增长22.09%,8月份外汇各项贷款增加77亿美元,同比多增33亿美元。

8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8.97万亿元,同比增长15.7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7.74万亿元,同比增长16.52%,增幅比上年末低0.30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0.55个百分点。

8月份,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6462亿元,同比多增2419亿元。从分部门情况看:居民户存款减少418亿元,同比多减1616亿元(去年同期增加1197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存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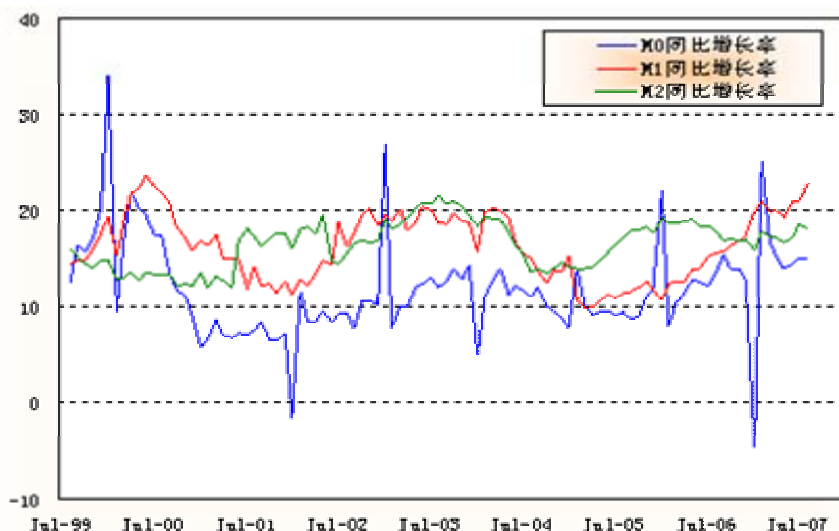




增加 6701 亿元，同比多增 4200 亿元；财政存款减少 167 亿元，同比多减 559 亿元（去年同期增加 392 亿元）。1—8 月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 4.19 万亿元，同比多增 4201 亿元。8 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 16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8 月份外汇各项存款增加 4 亿美元，同比少增 2 亿美元。

数据显示，虽然三季度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措施，试图控制过快增长的银行贷款，但 8 月新增贷款达到 3029 亿元，前 8 月贷款达 3.08 万亿，已突破今年 3 万亿目标关。另外，股市的巨大财富效应继续分流储蓄，居民储蓄减少 418 亿，同比减少 1616 亿，人民币存款活期化的趋势没有直接改善。8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875 亿元，同比少增 22 亿元，8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下降 0.2 个百分点，虽然仍是年内高位，但是说明贷款增速有所回落。另外，M2 同比增速下降到 18% 以下，也是因为贷款的回落。信贷与 M2 的回落表明前期央行宏观调控的效果已经逐渐有所显现。信贷与货币供应量的后续趋势，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仍然不容乐观，可能仍会延续前期的紧缩政策，但是抑制信贷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可能会造成国内需求受到压抑，导致国内需求减少，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因此，综合其他因素，可以认为银行间的流动性仍然会相当充裕，对后续债市走势持乐观态度。

图 7：货币供应量月度同比增长率（%） 1999 年 8 月—2007 年 8 月



专家表示 9 月份贸易顺差回落 “拐点” 尚未显现

2007-10-15 作者：卢铮 来源：《中国证券报》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 9 个月，我国贸易顺差达到 1856.50 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 1775 亿美元的顺差水平。其中，9 月份我国贸易顺差为 239.14 亿美元，较上月回落 10.6 亿美元。

分析人士表示，9 月份，顺差回落并不能表明外贸顺差绝对减少的“拐点”显现，预计全年顺差水平将维持高位运行。





进出口同步放慢

花旗银行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9月出口增速放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经济放缓,中国对美出口有所减慢。

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张永军则认为,9月,出口增幅与上月变化不大,显示国家今年出台频繁的调整进出口退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估计未来几个月的出口增速会保持在20%左右,但整体增幅会小于上半年。

9月份,进口增速也明显放缓,仅为16.1%。沈明高认为,进口放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进口替代,特别是在机械、电子设备方面,一些中小企业改用国产而不用进口的设备。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国内需求仍较弱。“如果由于进口替代因素造成进口放慢,这可能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除非中国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能够起来,否则进口还是会保持较慢增速。”沈明高说。

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进口减少仍符合我们产业政策调整目标。“我们不能说为了短期的平衡而取消长期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毕竟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更重要。”梅新育表示。

在进出口同步放缓的情况下,沈明高认为,除非出口进一步放慢,否则外贸顺差将可能继续保持高位。“中国对欧洲等其他地区出口仍然强劲。

此外,只要美国经济放慢不影响到全球经济,中国对外出口的增势就不会改变。另外从人民币升值、企业竞争力等角度来看,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外贸顺差下行拐点的出现。”沈明高说。

加强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

梅新育预计,今年全年的顺差水平将维持在2500亿美元,因此,由顺差而导致流动性过剩因素,还将继续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有增无减,加大了资本内流吸引力的情况下,要抵御国际游资压力,需要确保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我们可以逐步减少资本管制的项目,但是剩余管制项目的效率必须确保。”梅新育表示。

梅新育还认为,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上半年外债规模增长是明显放慢的。“这可以说明,尽管目前资本变相内流的言论不少,但总体而言,我们国家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还是不可低估的。这为我国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保障。”梅新育说。

世界竞争力格局——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最新结果分析





5月10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正式发布了《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2007年,IMD取消了一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体(如中国浙江)参评,新增了立陶宛和乌克兰两个国家,参评经济体总数是55个;评比体系与评比方式也无大的变化;评比结果仍然有总排名,按照不同人口规模、所在地域、财富水平、竞争力要素项目这4个分组排名,2007年的评比结果与上年具有较大的可比性。

一、2007年度世界竞争力排名概况

2006年,世界经济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快速增长,参评的55个经济体都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平均增长率约为5%,全球竞争力格局也处于调整之中。

(一)总排名状况。

美国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在经济绩效、政府效率、商务效率和基础设施四大要素排名中,经济绩效与基础设施排名仍然第一,商务效率排名第6位,政府效率仅排在了第19名,下滑5位。新加坡总排名第2位,较美国而言,其要素竞争力相对均衡,四大要素排名分别是第4位、第1位、第4位、第3位。

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变化不大,2007年德国和新西兰进入了竞争力第一梯队,而日本和爱沙尼亚则被挤出前20名。但竞争力第一集团内部还是发生了一些较显著的变化,如卢森堡从第9位上升到第4位,荷兰从第15位前进到第8位,澳大利亚从第6位下降到第12位,芬兰从第10位下降到第17位,等等。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排名变化:去年从第21位上升到第17位,今年又跌落到第24位。其原因在于各竞争力要素排名的全面下滑:经济绩效排名从第14位下降到第22位;政府效率排名从第26位下降到第34位;商业效率排名从第22位下降到第27位;基础设施排名从第2位下降到第7位。

此外,在发达国家中,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的竞争力相对较弱,都排在了前30名之外。意大利的竞争力排名虽然有所上升,但仅排在第42位,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前20名的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共有4个,都来自亚洲,分别是:新加坡和中国的大陆、香港及台湾。





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大国排名变化不大,仍排在第三阵营。排在倒数后三位的国家分别是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和克罗地亚。2007年又增加了立陶宛和乌克兰两个国家参评,分别排在第31位和第42位。

表1 对区外大国介入南海《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评比总体排名

经济体	2007年		2006年		经济体	2007年		2006年	
	积分	排名	积分	排名		积分	排名	积分	排名
美国	100.000	1	100.000	1	韩国	61.564	29	57.680	32
新加坡	99.121	2	90.993	3	西班牙	61.208	30	58.384	31
中国香港	93.541	3	96.866	2	立陶宛	61.071	31		
卢森堡	92.207	4	81.513	9	捷克	59.624	32	63.003	28
丹麦	91.926	5	86.031	5	泰国	57.758	33	62.598	29
瑞士	90.432	6	81.541	8	斯洛伐克	57.722	34	57.436	33
冰岛	88.689	7	90.206	4	匈牙利	57.627	35	57.316	35
荷兰	85.864	8	75.928	15	希腊	57.431	36	54.149	36
瑞典	84.119	9	76.992	14	约旦	57.132	37	51.292	40
加拿大	83.824	10	81.689	7	哥伦比亚	56.899	38	57.351	34
奥地利	83.184	11	79.301	13	葡萄牙	55.984	39	52.808	37
澳大利亚	82.387	12	82.501	6	斯洛文尼亚	55.172	40	51.641	39
挪威	81.992	13	79.722	12	保加利亚	48.737	41	50.873	41
爱尔兰	81.856	14	80.647	11	意大利	48.268	42	43.531	48
中国大陆	79.484	15	71.554	18	俄罗斯	47.315	43	44.738	46
德国	78.022	16	68.640	25	罗马尼亚	47.286	44	42.130	49
芬兰	77.337	17	80.894	10	菲律宾	47.163	45	49.041	42
中国台湾	76.050	18	72.993	17	乌克兰	45.479	46		
新西兰	75.506	19	71.191	21	墨西哥	45.305	47	44.871	45
英国	75.447	20	71.393	20	土耳其	45.221	48	47.069	43
以色列	74.321	21	68.929	24	巴西	44.706	49	46.416	44
爱沙尼亚	74.303	22	71.424	19	南非	44.479	50	52.007	38
马来西亚	74.091	23	70.080	22	阿根廷	43.350	51	43.663	47
日本	72.405	24	74.231	16	波兰	42.734	52	39.955	50
比利时	71.543	25	68.092	26	克罗地亚	38.523	53	38.957	51
智利	68.567	26	69.997	23	印度尼西亚	37.410	54	36.051	52
印度	63.380	27	64.416	27	委内瑞拉	30.954	55	32.662	53
法国	62.561	28	60.813	30					

资料来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7。



**表2 四大要素的前三位排名**

排名	总排名	经济绩效	政府效率	商务效率	基础设施
第一名	美国	美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美国
第二名	新加坡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爱尔兰	瑞士
第三名	中国香港	卢森堡	瑞士	丹麦	新加坡

资料来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7。**表3 美国的竞争力排名变化**

年份	总排名	经济绩效	政府效率	商务效率	基础设施
2005	1	1	16	3	1
2006	1	1	14	4	1
2007	1	1	19	6	1

资料来源: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5, 2006, 2007。

(二) 分类排名状况。

1. 分地区排名。在亚太地区的 13 个经济体中,新加坡取代中国香港成为本地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第 3 位是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则超越了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位于最末,菲律宾在本地区位于倒数第 2 位。在欧洲—中东—非洲地区的 34 个经济体中,卢森堡取代冰岛,成为本地区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丹麦、瑞士和冰岛,克罗地亚、波兰和南非的竞争力则在本地区表现最差。在南北美洲的 8 个经济体中,美国、加拿大、智利仍位居前 3 位,其中,智利是拉美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委内瑞拉尽管凭借石油资源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仍是本地区(也是全部参评经济体)的最后一名,这充分体现了 IMD “竞争力不等同于财富”的基本理念。

2. 基于财富的分组排名。在人均 GDP 低于 10000 美元的 22 个经济体中,与 2006 年相同,中国大陆排名第一位,其次为爱沙尼亚、马来西亚和智利;排在最后三位的是克罗地亚、印度尼西亚和委内瑞拉。在人均 GDP 高于 10000 美元的 33 个经济体中,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竞争力最强,其后是卢森堡、丹麦和瑞士,排在后四位的分别是希腊、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

3. 基于规模的分组排名。在 2000 万人口以上的 28 个大规模经济体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分列 1—4 位。在 2000 万人口以下的 27 个经济体中,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卢森堡排列前三名,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则排在最后三位。

二、世界竞争力格局:历史与未来





除了排名外,2007年IMD还对全球竞争力格局的历史趋势和未来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

1. 全球竞争力的趋同性。IMD自1989年开始使用世界竞争力评比体系。该体系由300多个指标构成,其中,2/3是统计指标,1/3是问卷调查指标。2007年的指标总量为323个。

为了反映竞争力的历史变化趋势,IMD利用其数据库,以美国的竞争力为标杆(分值为100)对参评经济体在过去10年来的竞争力表现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呈现趋同趋势:在55个参评经济体中,40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分值相对上升或保持稳定;只有15个经济体的分值出现相对下降。

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瑞典、奥地利、澳大利亚、丹麦、瑞士和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竞争力表现明显改善,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快速缩小自己与美国的竞争力差距。其中,俄罗斯的追赶速度最快,与美国的差距每年平均缩小5%,斯洛伐克和约旦为4.5%强,中国大陆约为2.7%。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意大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法国等经济体的竞争实力与美国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照此趋势,它们将会进一步失去其现有的竞争力位势。

2. 新兴国家的崛起。IMD认为,竞争力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它表明了一种通往繁荣之路的能力。国际竞争力评比所显示的趋势是,经济力量正在并仍将向新兴国家转移,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三国的外汇储备额合计超过了1.7万亿美元。新兴国家的企业正在加速收购全世界的产业资源。《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突出体现了这一经济权力调整趋势。新兴国家的企业和品牌突然出现在世界每个角落。工业化国家长期拥有的竞争力优势正在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工业化国家难以忍受这样一种权力转移,不愿放弃抵抗。于是,保护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它们正利用WTO规则或借助其漏洞来应对新的挑战。过去几年,保护主义手段变得更加巧妙,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公司治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社会权利等都成为了新的关键词。IMD认为,今后,随着新兴市场向新兴力量的转变,国际经济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张,这会对国际竞争力的现有格局构成挑战。

3. 影响世界竞争力格局的重大问题。除了对历史和现实分析外,IMD还勾勒出了未来的“竞争力路线图”,试图以此描绘和评估未来40年影响世界竞争力格局的45个重大问题。按照时间和影响大小两个维度,IMD将这些问题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坐标系。





这45个问题分别是：美国贸易赤字，美国预算赤字，石油价格高于60美元，资源需求上升，中国大陆和印度过度消耗原材料，美国债务规模攀升，某些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元逐渐贬值，亚洲国家金融体系脆弱，非洲具有新的吸引力，“南方”（发展中国家）公司的收购行动，各地对职业经理人的渴求，不断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家庭债务规模创新高，俄罗斯再度成为世界主导力量，企业应采取的新环保战略，生命科学和环保吸引大量投资，知识产权与开放体系之争，服务业竞争力与一体化，新中产阶级兴起，劳动成本差别缩小，生产率差异消失，企业税率趋同，从廉价劳动力到廉价智力，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激烈竞争，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服务于穷人的商业新模式，中、印、俄成为新的技术力量，欧洲和日本养老金体系的风险，各国政府与超国家组织，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人抵触流动，新兴力量会增强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国际市场壁垒的消失，技术鸿沟的消失，赤贫人口减少，中国大陆养老金体系的风险，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低出生率，预期寿命的提高与支出增加，西方国家的价值多元化趋势，气候变化影响经济资源，流行病风险上升。

在上述问题中，按照2007—2050年的时间次序，影响比较大的10个问题包括：房地产泡沫，亚洲金融体系发展滞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对职业经理人的渴求，新兴的中产阶级，从廉价劳动力到廉价智力，欧洲和日本养老金体系的风险，中国大陆养老金体系的风险，气候变化影响经济资源，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低出生率问题。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46P-9

9月 高层 要论

曾培炎：进一步实施地区协调发展总体战略

国务院9月24日召开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实施地区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形成各区域经济优化布局、人口合理分布、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有效保护的新格局，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曾培炎对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客观分析国土空间情况，综合评价各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二是合理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空间布局。三是以主体功能规划为依据，指导城市、土地等相关规划，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四是发挥财政、产业、投资、土地、环保、人口等政策的作用，对主体功能区实行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的绩效评价和考核办法。五是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构，深入调查研究，完善规划方案，努力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点评：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尽可能好的发展。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逐步实现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曾培炎：五大措施推动服务业成国民经济主导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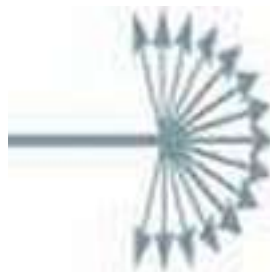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日前在全国服务业工作会议上提出，服务业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服务业的支撑作用，走出一条服务业与工农业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使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曾培炎提出五个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要加强规划引导。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拓宽领域、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增强功能、规范市场，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二是要突出发展重点。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环保服务、工程总包、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各地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切实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三是要深化改革开放。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服务领域，降低一般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深化服务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借鉴国外服务业发展先进经验，支持有实力的服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四是要加大政策支持。继续实行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抓紧修订歧视和不合理限制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对需要扶持的服务产业在税收、折旧、土地、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增加财政对服务业的资金投入，发挥好服务业引导资金的作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业人才开发，加快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五是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地方和部门领导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法规标准，规范市场监管，做好统计信息工作，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

点评：据统计，2006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82000多亿元，占GDP的39.5%，今年3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0年，全国服务业产值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就业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到2020年，全国服务业产值比重超过50%，就业容量显著增加，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

万钢：长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科技部部长万钢日前表示，科技部将长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今后将主要支持产业方向与我国科研方向一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比如说IT、生物技术、能源环境、资源探索、环境保护、纳米技术等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





今后,科技部不会因为一个企业是小企业而支持,而是主要支持研究方向与我国科研方向一致的领域,这些企业可以从星火、火炬、863、支撑等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申请资金支持,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万钢表示。

他还指出,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到今天,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对中国能源、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在这几年科研的重点,明确的放在改进现在的制造工业技术水平,促进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使我们的工业结构变得更加合理,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他强调,我国在完成节能减排这个约束性指标的同时,改造和提升我们企业的技术水平,使企业应用更新的技术,更加节约能源,更加环境保护,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毕井泉:经济增长的速度确实偏快并未过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9月4日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国经济过热的判断。他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确实偏快,存在着转为过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毕井泉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1.5%,同比提高了0.5个百分点。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国经济过热的判断。经济的过热和过冷,都是对经济发展总体现象的一个描述。其实质就是要看总需求和总供给是不是平衡,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速度与过热和过冷挂钩。

毕井泉指出,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尽管目前经济运行比较平稳,增速攀升也相对比较缓慢,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确实偏快,存在着转为过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所以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要坚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稳定、完善和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政策。

点评:从当前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现在存在的只是猪肉等个别商品供应不足,并没有出现全面的供应紧张,即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的局面。



欧新黔:将从4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欧新黔9月1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日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我国下一步将重点在4方面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促进其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是放宽和规范中小企业市场准入,改善创业环境,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开采领域,允许中小企业、社会资金以资本形式进入。

二是改进金融服务,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办好证券市场中的中小企业板块,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三是加大技术创新和人才开发支持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提高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四是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中小企业监测体系,及时发布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发展规划、投资重点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引导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张晓强:鼓励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外资和技术引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9月27日表示,中国鼓励的自主创新,是一种开放式创新,是开展国际合作、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创新,并不排斥外资和技术引进。

张晓强指出,对于中国实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是不是很成功,要辩证地来看待。首先要看到,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是中国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利用外资,引进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培训了人才,增加了就业税收,扩大了出口,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

中国政府鼓励的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大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一些重要技术,通过自身的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和国外的合作伙伴,按照优势互补、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继续开展技术引进和高技术产业合作。

点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高技术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通过利用外资快速发展,规模到了世界第二位,但是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水平,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比较少,大而不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高虎城:呼吁国际社会正确评价“中国制造”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9月24日表示,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今年外贸总额有望超过两万亿美元,但中国政府并不追求贸易顺差。并呼吁





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给予正确评价。

高虎城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总体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使绝大多数的产品具备了进入跨国采购网络的实力,成为国际跨国采购供应链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中国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外部的,有些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应该客观科学地认识这些问题和挑战,这对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分工、更好地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近来国际上对“中国制造”的一些置疑,高虎城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近年来中国出口美国、欧盟和日本产品的合格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出口产品每年都在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制造”受到广大贸易伙伴的信赖。国际社会应理性、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出口产品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制造”给予正确的评价。

吴晓灵: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是可持续发展首要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9月17日在由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题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三大挑战,要避免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难以为继的情况出现,解决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调整国民收入的格局。

吴晓灵指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挑战,一是消费相对不足,对外发展不均衡;二是难以维持我们的高投资的状态,三是我们的收入差距正在加大,社会保障不够健全,这样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也难以为继。在她看来,虽然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多多种方式,但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的格局。

吴晓灵建议,在初次分配中,第一,应该调整资源税的征缴方式,要加大企业利用资源的成本,节约资源并做好资源替代的准备。同时,加大地方在资源税中的留用比例,解决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第二,要切实落实治理污染的要求,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成本。第三,要提高劳动力的最低工资,以此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第四,要建立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减少企业的储蓄。

在二次分配中,吴晓灵认为要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建立起农村和城市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更迫切的是,要用风险补偿的方式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引导金融资本进入农村,提高对农业的收入。这里并不是指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建议用财政的方式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来源: 国研网《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



SIF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金融动态

JIN RONG DONG TAI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7 年 10 月

第 6 期 [总第十八期]

- 美国次级债市场的现状及其深远影响
- 全球大银行因信贷市场动荡损失惨重
- 格林斯潘：信贷危机影响可能在第四季度显现—CNBC
- 巴曙松：人民币国际化起点和趋势
- 全面“通胀时代”是否已经来临？
- 中国保留对股市进行干预的权利
- 吹不破的中国“泡沫”？
-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再攀新高
- 《货币战争》：中国版的“阴谋论”？
- 《动荡年代》中的格林斯潘

国际金融

美国次级债市场的现状及其深远影响

美国的按揭贷款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优质贷款市场（Prime Market），优质贷款市场面向信用等级高（信用分数在 660 分以上），收入稳定可靠，债务负担合理的优良客户，这些人主要是选用最为传统的 30 年或 15 年固定利率按揭贷款，较少采用较为复杂的创新按揭工具。

第二层次是“Alt-A”贷款市场，这个市场既包括信用分数在 620 到 660 之间的主流阶层，也包括少部分分数高于 660 的高信用度客户。

第三层次是次级贷款市场（Sub-prime Market）。次级市场是指信用分数低于 620 分，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次级市场总规模大致在 8600-13000 亿美元左右；其中有近半数的人没有固定收入的凭证，这些人的总贷款额在 4500-6500 亿美元之间。

这三个层次的贷款市场中，优质市场的贷款人通常还款能力较强，采取较长贷款期限的固定利率贷款，而 Alt-A 和次级债的贷款人则还款能力较弱，往往选择更复杂、基于风险定价的按揭贷款工具。

另外、第三层次的按揭贷款典型的创新思路，就是允许借款人在初期的偿还额，不仅可以不归还贷款本金，甚至可以不完全归还贷款利息，这种做法被称为负分期按揭。这些创新工具包括：1。除了通常的 5% 低首付之外，无本金贷款在美国也很流行，借款人在初期的还款压力很低，但是初期未能归还的利息被滚动计入本金，这种“利滚本”的方式可使得贷款本金不断上升。2。可调整利率贷款，这种贷款有三年、五年和七年等多种。借款人在开

头约定的几年内，只需要归还较低固定利率的按揭，过了约定期限后利率将被重新逐年调整，还款利率急剧上升。3。一般而言，覆盖 Alt-A 和次级债的按揭合同都会包含偿还金额重新设置条款和最高贷款限制条款。前者是指 ARM 类型的贷款定期自动重新设置偿还额；后者是指如果借款人的初期还款较少，“利滚本”导致按揭贷款本金不断上升，到初始本金的 110%-125% 时，借款人的每期偿还额和利率均将调整，使得还款压力急剧上升。4。一些中老年人的按揭贷款被利用按揭工具“倒置”过来，商业银行利用成熟的保险精算技术，对归还了大部分按揭贷款本息的中老年贷款人，不仅不要求他们继续归还按揭贷款，反而由银行向他们提供资金，按揭“倒置”的前提是，这些中老年人去世后不动产的所有权被让渡给银行。5。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定期对不动产进行价值重估，并对重估增值部分提供追加贷款。这些金融创新工具带有的合约再安排的特性、“盯市”（mark to market）的特性，都要求按揭贷款人的保持相当稳健的财务状况，以及对风险的高度敏感。

综合比较各种统计，从 1990 年至今，美国房地产按揭贷款余额大约在 10 万亿美元，其中约一半被证券化为 MBS，国际投资者持有美国 MBS 实际本金的大约 20%，也就是 1 万亿美元。在全部按揭贷款中，大约有 40% 以上的贷款属于“Alt-A”和次级贷款产品。从 2003 年算起，“Alt-A”和次级贷款这类高风险按揭贷款总额超过了 2 万亿美元。目前，次级贷款超过 60 天的拖欠率已逾 15%，正在快速扑





向 20% 的历史最新记录, 220 万次级人士将失去住宅。而“Alt-A”的拖欠率在 3.7% 左右, 但是其幅度在过去的 14 个月里翻了一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 2 万亿美元的 Alt-A 和次级贷款在短期内至少会损失掉 10% 到 15%, 也就是大约 2000-3000 亿美元。在未来一至三年的中期内会损失多少, 取决于两点, 一是美国房价是否能够重新上涨, 二是美国房价上涨是否比美元利率上涨更快, 这两点都难以保证。

在美国次级债危机之后, 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从 5.3% 跌到 4.7%。此外, 反映金融市场波动程度的 VIX 指数也从正常的 10-12 的水平, 一度急剧上升到 30。欧洲和东亚多个资本市场综合指数均在短时间内迅猛下跌。金融体系的动荡均接近甚至超过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程度。因此, 次级债对全球的冲击和暴露的问题是相当严峻的。

美国次级债危机暴露的一系列问题

次级债从受到市场追捧的创新投资品种, 演变到今天的有毒资产, 和美国投资银行业、评级机构业事实上的高度勾结密切相关。对次级债问题的深入追究, 有可能导致类似“安然事件”般的冲击再度出现。

一是次级债券的信用评级问题。所有的次级贷款债券中, 大约有 75% 得到了 AAA 的评级, 10% 得了 AA, 另外 8% 得了 A, 仅有 7% 被评为 BBB 或更低。实际情况是, 2006 年第四季度次级贷款违约率达到了 14.44%, 今年第一季度更增加到 15.75%。Alt-A 和次级债两类证券的违约率可能会随着美国房价的大跌而急剧增加。四大评级机构从美国按揭贷款评级中获得的收益累计超过 30 亿美元。由于为投资银行发行的各种创新工具提供评级成为其业务的主要收入, 因此评级公司很难对按揭贷款证券 MBS 给出中立的评级判断。

次级债危机以来, 评级机构和在安然事件中一样, 出了问题才迅速降低次级债的评级, 从 2005 年第四季度到 2006 年第四季度, 标准普尔已经把大约 1210 亿美元的次级贷款评级予以调降, 其中 80% 被调降到“BBB”及以下的评级, 同期穆迪氏把 520 亿美元的次贷评级降到“BBB”及以下的评级。但目前其在美国已经面临严峻的诉讼压力。俄亥俄州的检察官马克·德安 (Marc Dann) 评论说, “这些

评级公司在每笔次级贷款生成的评级中都大赚其钱, 他们持续给这些证券 AAA 的评级,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欺诈的同谋。”

二是投资银行设计的各种按揭证券化工具获得较好评级之后, 开始进入承销环节。在过去三年, 承销 Alt-A 债券和次级债投资银行包括: 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美林、花旗、德意志银行、美洲银行等著名国际银行。由于信用评级较好, 相当多的政府公共基金和对冲基金成为此类债券的主要投资者。迄今为止, 究竟谁是美国 Alt-A 和次级债的主要投资者, 仍然是一个敏感而不清晰的问题。我们估计, 到 2006 年底, 对冲基金持有 10%、退休基金持有 18%、保险公司持有 19%、资产管理公司有 22%, 其余部分持有人的状况不详。从表面上看, 商业银行并未大量持有次级债, 但是对冲基金可能把自身持有的次级债抵押给银行并获得贷款, 这些贷款很可能再度被用来投资次级债, 次级债的问题可能会蔓延到公共基金、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等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

美国本土的公共基金, 尤其是养老基金已经面临次级债投资损失的威胁, 其中包括: 弗吉尼亚州公共雇员退休基金、俄亥俄州警察退休基金、加州公共雇员退休基金, 德州教师退休基金, 新墨西哥州投资协会基金等等,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各有损失。我们认为此轮美国次级债危机目前的主要受损者是美国的公共基金和对冲基金, 其次才是欧洲、日本的公共基金,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略有损失。

三是迄今为止, 美联储对此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予以清晰的阐述。这也许是因为次级债问题已多次发作, 其中 1998-2000 年间次级贷款的贷款损失率一度曾经高达 4.5%, 而在 2001-2002 年间, 美国次级债也因新经济泡沫的破裂, 而有短暂的拖欠率大幅上升到 11%-12% 的记录, 但问题均得以迅速平息。国际清算银行一直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 并强烈警告世界可能会面临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该行还认为, 今后几个月全球信贷领域的景气周期将发生趋势性的转变。此外, 目前包括联合国、OECD、IMF 等主要国际机构均已把 2008 年美国 GDP 的增长预期调降到只有 2%。但是从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来看, 问题似乎被轻描淡写。伯南克曾表示, 次级贷款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但没有迹象表明正在向主要贷款





市场蔓延,整体市场似乎依然健康。

四是具有美国政府信用支持的 Ginnie Mae 和另外两家机构房地美、房利美一道,可能对 MBS 的评级和发行代理有所影响,因而包含了道德风险。这种政府支持机构的建立用意良好,是为了中低收入阶层能够享有住房保障,但是其存在严重扭曲 MBS 的风险收益现象。据统计,截至 2005 年底,美国全部的 MBS 当中,和 GSE 过手的发行达到 3.68 万亿美元,而其他发行(Non-agency Issuance)和不动产 ABS 分别只有 1.19 万亿和 0.59 万亿。因此在全部 MBS 当中,大约 70%左右和 Ginnie Mae、房地美和房利美相关。在 2003 年之后,GSE 类型的 MBS 和美国国债之间的利差从超过 250 个基点下降到不足 100 个基点,政府信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信用,并带来道德风险。

美国次级债危机是否会蔓延到美国整个按揭贷款市场,远远没有美联储那么乐观。1. 贷款工具设计的复杂性使得 Alt-A 类型的贷款也可能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最终将可能有 20%的美国次级贷款进入拍卖程序。由于各层次的按揭贷款通过 CDO、CDS 等复杂工具,被组合到一起作为权益凭证出售。因此,次级债的问题可能拖累第一和第二层次的按揭贷款市场。2. 从已经进行的次级债拍卖看,贷款损失严重。例如美林公司拍卖贝尔斯登基金持有的超过 8 亿美元的贷款抵押债券时,这些被公开拍卖的 AAA 评级的债券当中,只有 1/4 的债券有人询价,而且价格仅为票面价值的 85%至 90%。因此,美国按揭贷款的总体损失情况可能不会低于 10%至 15%。3. 从各国央行的注资情况看,危机至今,各国央行已累计注资 4400 亿美元。从注资规模看,次级债问题相当严峻。

美国次级债问题对全球的影响

这次美国次级债的危机具有“新危机”的特点,一是和先前的拉美危机、东亚危机不同,次级债危机爆发在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并且有可能拖累欧洲和东亚,可能影响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二是危机不仅影响以富裕群体投资者为主的私募基金,也影响和国民养老、医疗、保险等相关的公共基金,并且这种影响遍及美国、欧洲和东亚。三是次级债危机并没有立即导致汇率和银行业出现问题

次级债的问题像冰山一角被掩盖起来慢慢融化,或迟或早会严重损害投资银行业,并对商业银行系统构成压力。四是美元和美国国债再度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危机中美元汇率坚挺、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而不是像新兴市场危机那样导致本币急剧贬值。我们倾向于认为,尽管今年第二季度美国 GDP 增长高达 4%,但是次级债危机可能使得美国明年经济增长减少 1-1.5 个百分点。美国次级债问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其严重性可能被低估了,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可能受到严重拖累,欧、美、日在 2008 年的 GDP 增速均将低于 2.8%,外部需求的萎缩对我国也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冲击。

第一,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并不局限在次级债本身,基本理由有三点。一是目前无论是优质、还是 Alt-A 还是次级贷款,都通过信用衍生品的设计,被糅合在一起,而此类衍生品目前的余额可能超过 2 万亿美元,并且缺乏流动性。因此 CDO、CDS 市场潜伏的问题,比目前已经暴露的次级债问题要严重。二是次级债危机,其根源还是美国居民的还款能力问题,而还款能力问题则可归结为居民消费过度、储蓄率过低的问题。因此,次级债可能仅仅只暴露了冰山的一角。三是次级债问题,还可以看出房利美、房地美两大由美国政府信用支持机构的存在,有可能带来了一定的道德风险,使得次级债得以以较高信用等级发行和泛滥。

第二,从历史经验看,美国房地产价格调整从来都不是短期的,而将经历 3-4 年的调整期,调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否恰当,以及在美国是否能够形成强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这次美国次级债危机可以唤醒人们对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储贷危机的回忆。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通过了《存款机构法案》允许储蓄机构购买公司债,以提高其资产收益水平,这是储蓄机构从 1933 年的 G-S 法案之后首次获得这样的许可。当时的储蓄贷款机构很快便关注到了当时高收益的垃圾债券,最为著名的垃圾债创新、发行和承销机构为德雷克赛公司,其总裁米尔肯是毁誉参半的金融天才,也是迄今仍然流行的 REITs 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的创造者。米尔肯成功地说服了许多储贷机构购买其发行的垃圾债。在经济景气阶段,垃圾债的高收益很容易让人忘记其“垃圾”的本质,但是一





旦经济出现减速的迹象,那么垃圾债的违约情况就会急剧上升,收益也一落千丈。当时的储贷机构满足于赚取垃圾债的高收益和储蓄低利率之间的利差,但是却忽视了垃圾债的风险。结果问题逐步积累,并且最终成为1987年股灾的导火索之一。从1983年到1989年,失去清偿能力的储蓄机构每年都在500家以上,总资产都超过2300亿美元,是当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资本金的10余倍。清理储贷危机如此艰难,一直拖延到1989年10月,老布什签署了“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制法案”之后才彻底重组了储贷机构,但是美国政府付出了1660亿美元的救助成本,1800余家储贷机构破产,数百人入狱。而德雷克赛公司最终被罚款6.5亿美元并于1990年破产,米尔肯个人则被罚款10亿美元并判入狱10年。1981-1990年最终被形容为“贪婪的十年”。

现在看来,次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直接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房地产问题使居民消费有所萎缩,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迅速下降,从而拖累美国经济增长;二是为延缓次级债问题的蔓延和爆发,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美国国际收支对资本内流的依赖也会加深,再加上次级债通过居民消费滑坡拖累美国经济,最终可能会加速美元的疲软,美元利率和汇率双双向下调整不可能不对欧洲和东亚带来压力。三是次级债危机不仅使包括以对冲基金为主的美国富裕群体的财富缩水,也使得投资次级债的美国养老、医疗、保险等基金也面临较大挑战、受损较为严重的一些州政府已经通过大规模提高交通违章罚款来作为应急措施。但综合来看,美国经济在中期内面临调整压力。

第四,由于美国各层次MBS的信用评级非常高,使得欧洲私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对此类证券的投资较多。从次级债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四次向市场注资累计达到2889亿美元。相比而言,美国七次注资和日本四次注资累计总额分别只有975亿和296亿美元,美日两国累计注资额还不及欧洲第一次注资的1300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欧洲对次级债问题的警惕,以及对欧元地位的忧虑。

和亚洲金融危机时,伴随着剧烈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所不同的是,次级债危机不是显性的而是隐性的。由于次债的受害者是公共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为对冲基金提供杠杆支撑的商业银行,

而这些金融机构虽然资产方有所受损,但在各国央行注入流动性的支持下,现金流的平衡并无问题,只是等待时日来逐步化解次级债带来的不良资产问题。因此,次级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缓慢而隐蔽的,很难会以危机的方式猛烈爆发。

第五,全球化背景下,并非本国金融体系保持健康就一定能够避免危机,在次级债危机中,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股市短期内的跌幅均超过了亚洲危机时期。恰恰是由于东亚经济金融相对健康,因此欧美投资者才在遭遇流动性突然紧缩时,优先选择从东亚撤资,以降低资产变现的成本。如果投资银行和基金经理均采用类似策略,东亚市场的变现成本就会逐渐接近欧美市场,这个过程也恰恰就是欧美危机向东亚转嫁的过程。

目前看来,次级债危机是否会蔓延,取决于三点,一是大量的次级债是否会被公开拍卖。如果是,那么这将是美按揭贷款危机蔓延的标志。二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是否动摇,以及美联储如何做到在美元不断疲软和降息的背景下,吸引足够多的国际资本内流。三是欧洲如何忍受欧元继续高企,迅速补充受损的公共基金和维持区域内经济增长。

美国次级债问题对我国的影响

一,危机是考验和建立一国货币国际地位的良机。因此,保持人民币币值对美元的坚挺是自亚洲危机之后,再度确立人民币国际声望的重要机遇。在这次危机中,各主要央行都努力维持本币的表现,其中欧洲央行最为积极,美元也成为国际游资的“避风港”,短期汇率有所上升。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走势相对强劲,这有利于缓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压力,也为改善中国的外贸条件,进一步确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条件。

二,美国次级债问题给全球股市和初级产品市场带来振荡,其中全球股市跟随美国次级债问题大起大落,这也间接增加了国内A股市场的波动性,但是A股市场的基本格局未受到全球股市的太大影响。包括有色金属、能源等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因美国次级债问题而回落,说明操纵全球初级产品的大资本受此问题拖累部分撤资调入美国国内,这对我国资源进口而言,是相对有利的。

三,根据外电披露,我国外汇储备中,涉及美





国按揭贷款证券总量大约有 1300-1600 亿,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一层次优质贷款,第二、第三层次占比应当很少。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当中,除中行和建行略受影响之外,其余银行几乎不持有次级债。因此目前看来,受损最突出的可能是我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国房贷类资产,损失的具体数额取决于美国次级债问题的发展。如果问题严重,估计未来三年损失在 100-120 亿美元之间。我国也可以在次级债的过程中,进行适当的资产置换,考虑到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以及一些处于危机中的美国 MBS 可能被严重低估,是否可以考虑在危机较为严重时,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适当释放美国国债,并购入一些质量较好的次级债。在危机缓解的时候,再释放次级债购回美国国债,在平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从全球流动性的情况看,在出现次级债危机之前的 2007 年 7 月,国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仍然是非常充沛的。但到了 8 月末,流动性陡然收紧,显示出从流动性过剩到紧缩相当快速。也显示出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保持一定余地是必要的,尤其在 2007 年宏观经济指标偏热、通货膨胀压力显现时,央行的紧缩更应持续渐进,而不应过于急促。

四,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和我国的房贷问题有不可比性。截至 2007 年第 2 季度,我国房贷累计余额在 4.3 万亿,其中给开发商的贷款为 1.7 万亿,给个人的按揭贷款为 2.6 万亿。在按揭贷款中,只有最长 10 年的固定利率类贷款和最长 30 年的浮动利率类贷款,平均的按揭成数不到六成,平均贷款期限 17 年,对应于一元贷款的抵押物市值通常超过二元。因此我国的按揭贷款出现类似美国次级债问题的可能性极小。

五,由于次级债主要是美国公共基金和对冲基

金所持有,因此次级债危机受损最严重的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很可能集中精力,花三年左右的时间来解决国内的按揭贷款问题。如果问题严重,不排除美联储降息的可能。这可能会对中美经贸方面产生不同影响,贸易冲突有可能缓解,而汇率压力可能继续加大。中美贸易冲突可能缓解的理由在于,次级债可能导致美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下降,此时对中国商品不得不暂时采取忍耐态度;

六,从 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我们估计大约有不少于 3000 亿美元的热钱流入我国。如果次级债问题严重,不排除这些热钱回撤欧美的可能。因此在美国次级债问题明朗之前,应当对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采取相对谨慎的姿态,不应过于急切地鼓励国际资本的流出。此外,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整个过程来观察,可以看出投资银行业和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的高度勾结和操纵。因此,对美国要求在华设立独资的投资银行、特许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等,需持高度警惕的态度。

最后,加强国际财经问题的前瞻性研究。令人庆幸的是,在保尔森初次访华时,美国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方面的官员和金融家没有来得及向中国游说。而是直到 2007 年 4 月,美方才到华推销此类已经明显出现问题的次级债。但是如果有前瞻性的研究,能够指出和提醒决策部门关注美国的有毒资产问题,那么也许风险就更容易得到规避。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日期:2007-10-9

作者:钟伟

全球大银行因信贷市场动荡损失惨重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将于本月发布第三季度业绩报告,届时,预计它们将会披露因持有抵押贷款证券和杠杆贷款而蒙受总共大约 30 亿美元损失。

这一数字将会使得全球各大银行因今夏的信贷市场动荡而宣布的资产减损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

Sanford Bernstein 分析师霍华德·梅森(Howard

Mason)预计,摩根大通可能宣布其杠杆贷款业务损失大约 14 亿美元,与花旗(Citigroup)上周宣布的相关损失大致相当。他预计该行还将在按揭贷款和按揭担保证券方面蒙受 7 亿美元资产减损,从而使得总损失达到 21 亿美元。

至于美国银行,他预计该行的杠杆贷款损失大约为 7 亿美元,抵押贷款业务损失 3 亿美元。美林公司





(Merrill Lynch)上周宣布自己蒙受 50 亿美元损失；瑞银(UBS)称自己损失了 37 亿美元；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宣布损失 31 亿美元；花旗则称自己损失 27 亿美元。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戴维·怀顿(David Wighton)纽约报道

2007 年 10 月 8 日

格林斯潘：信贷危机影响可能在第四季度显现—CNBC

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 Fed)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周一称，几乎可以肯定，信贷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会在当前季度显现。

格林斯潘在接受 CNBC 电视频道采访时表示，虽然目前信贷危机状况有所缓解，但其对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及其他主要利率的残留效应仍将逐步体现，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经济增长出现放缓。

他表示，信贷危机影响虽然没有在第三季度数据中得到反映，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影响会在第四季度显现。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预计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低于 50%。

当被问及新兴市场的强劲走势时，格林斯潘表示，没有明显迹象显示新兴市场会走软。他还表示，中国显然是这个市场的中心，从某些角度来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 10% 的速度应该会放缓，但是这种状况还没有出现。

当被问及中国股市上涨势头能否持续时，格林斯潘说，毫无疑问，他认为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的上涨势头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在随后接受 Fox Business News 的采访中，格林斯潘表示，美国住房市场泡沫导致了信贷危机，而住房市场泡沫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发放机构以及金融机构，他们的放贷行为很恶劣，近乎欺诈。Fox Business News 于今天首次开播。他还表示，在金融行业及监管机构对信贷危机进行快速调整的同时，与 2005 年至 2006 年相比，目前的次级抵押贷款资产债券的发行基本是零。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本文由道琼斯通讯社提供

2007 年 10 月 16 日

中国金融

巴曙松：人民币国际化起点和趋势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价值储备等货币功能，最终成为被国际市场广泛使用和持有的国际货币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指人民币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价值储备货币工具的经济过程。

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就是衡量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具备国际货币的特征和功能的程度，其度量指标由价值尺度的国际化指标、支付手段的国际化指标、价值储备的国际化指标和国际经济政策工具的指标这四大指标构成。

作为价值尺度，人民币计价范围主要在边贸。

一是边境贸易主要以人民币计价。随着经济的

发展，中国内地与周边经济体的贸易额越来越大，在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出于减少货币交易环节和降低成本的需要，一些与中国内地贸易、投资往来频繁、数额较大的经济体，即使在人民币未完全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也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在中国内地与周边经济体的贸易中，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已经相当普遍，可以说人民币具有“硬通货”作用。但是，在中国内地与西方经济体的贸易中，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还很少见；在没有中国内地参与的其他国际贸易中，还没有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情况出现。

二是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人民币计价发行的债券的零的突破。目前，在今年以前的国际金融市场上，





还没有发行以人民币标价发行的债券,而国际金融市场上以美元、欧元计价发行的债券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以日元计价发行的也达到了1000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银行今年1月表示将进一步扩大中国香港人民币业务,具体就是指在中国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5家银行计划在中国香港共发行100亿元(人民币,下同)的人民币债券。国家开发银行6月27日起在中国香港发售债券总额为50亿元的首只人民币债券。

作为支付手段,人民币已遍布周边经济体。

一是流通范围主要在周边经济体。周边经济体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量正不断增加。有调查表明,2004年末人民币现金在周边经济体的存量为216亿元,占当年中国内地现金流通量21468亿元的1%,比1996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4.6%,增长十分迅速。

具体而言,人民币边贸结算量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中国香港作为重要金融中心,为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提供了有利平台。人民币在中国港澳地区的可接受度、流通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出入量越来越大。特别是在2003年允许中国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2004年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安排之后,两地之间人员及经贸往来活动日益频繁,促进了人民币现金在中国港澳地区和中国内地之间的流动以及流动规模的扩大。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巴基斯坦、新加坡、缅甸、老挝等经济体“自由流通”,已经受到“二美元”的礼遇。2004年,在中蒙边境贸易中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结算量约为90%;在中朝边境贸易中约为45%,在中俄边境贸易中约15%。在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泰国、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其他周边经济体,人民币也被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成为与这些经济体边贸结算中的主要货币。

二是人民币流通范围局限于周边经济体。尽管人民币在周边经济体的流通量已经初具规模,且在逐年增加,但人民币国际贸易的流通量占货币供应量和与中国内地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仍然极低,而且在非周边的其他亚洲经济体及欧美等地没有利用人民币结算的情况。相对于中国内地去年34.56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和1.76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

额,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流通量对中国内地经济的影响还很有限,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微弱。

三是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逐渐发展。境外存在多种人民币衍生产品,其中,以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DF)的交易最为活跃。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境外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以来,新加坡的人民币NDF交易迅速活跃起来,日均成交额已超过10亿美元。去年8月28日,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推出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及日元三种主要货币的期货和期权,首次将人民币纳入交易所交易。由于CME的巨大影响力,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的发展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又进了一步。

作为价值储藏手段,人民币开始出现制度性变迁。

一是作为官方储备货币的零的突破。去年12月1日,菲律宾货币委员会开始接纳人民币为菲中央银行储备货币。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境外流通开始出现制度性的变迁,人民币向国际化跨出了重要一步。人民币成为菲律宾官方储备货币,说明人民币的空间范围在法律上已经延展到菲律宾境内。

二是非中国内地居民开始将人民币作为一项存款。2004年2月,中国香港首次推出人民币存款业务,人民币存款余额稳步上升,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后更是突飞猛进,2005年9月达到226亿元。恒生银行在汇改后一周曾出现一天存款5000万元的“井喷”现象,远远超过平时人民币单日存款最高峰1000万元;东亚银行一日增长了数百个存款账户,占升值前3周新增账户总数的一半。

作为国际经济政策工具,人民币受到各经济体重视。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贸易、物价、就业和经济增长影响加大。一些“热钱”流入中国内地,参与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就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同时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增长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国际上许多经济体也逐步在其汇率体系中考考虑人民币因素。2005年11月5日,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央行)宣布调整汇率指数,将人民币纳入一篮子货币,新指数(6612.772,-20.69,-0.31%)在当年12月发布。2005年4月1日起,欧洲央行已在其每日统计并发布的欧元指导汇率体系中加入了人民币等7种新货币。





而且,利率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流动影响也愈来愈大,人民币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开始得到世界经济体的重视。

通过以上四个人民币国际化指标的分析,总体看来人民币还不是一个国际货币。这一结论的最大表征就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计价的交易数量微乎其微,而且流通范围较为局限。人民币在周边流通的主要职能是计价单位和支付手段,而作为国际金融市场投资交易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等高级国际货币职能的表现则非常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务为零,世界各金融机构包括各经济体中央银行所持的人民币资产也几乎为零。总而言之,人民币目前所能发挥的国际货币职能相当有限,而且多限于周边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货币自由化的深入阶段和货币区域化的初始阶段。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其实现受到多方面条件的综合影响。在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众多条件中,金融环境的支持是众学者共同强调的一个核心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来说一个经济、金融问题,在其实现过程中,与金融业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必要条件。

具体而言,首先,金融机构为人民币业务提供开展的平台,为人民币国际流通提供渠道。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分布广泛程度,以及这些机

构的运营状况,决定着人民币使用和流通的范围和便捷程度。所以,积极支持中资银行等扩张境外分支机构,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集团,可以为人民币的国际流通提供必要的机构支持。其次,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实现其各种货币功能的舞台。人民币实现国际货币职能,为世界市场所认同,有赖于开放、稳定和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都于此有相当的距离。而金融制度则保证着人民币对内价值(利率)和对外价值(汇率)的合理和稳定,这是人民币拥有国际信用、为国际市场广为接受的前提。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7 年 10 月 11 日

(本文作者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袁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吴博、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尹竹青、天津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淼,有删改)

(责任编辑:任菲)

全面“通胀时代”是否已经来临？

进入 2007 年,中国经济持续火热,GDP 增速不断加快,而 CPI 增速则在 8 月刷新了 10 年高点。消费、投资、出口等经济指标全方位升温,不断刺激着市场的神经。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未来又将如何演变?央行紧缩的力度又该怎样才算合适?

继 8 月份成功推出“专家学者把脉中国宏观经济”系列后,本报再邀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美林证券亚太区经济学家陆挺、瑞士信贷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巴克莱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中央

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副主任李命志 10 位中外顶级经济学家,就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及政策再度展开“风云对话”。

“通胀时代”来临尚无定论

记者:物价上涨,会否引发全面通胀形成?如何引导人们的通胀预期?

本土专家看法

通胀预期是通胀加速主因





祝宝良：

今年，引发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统计显示，在 1-8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9% 中，食品价格带动了 3.0 个百分点。不过今年以来，粮食价格涨幅基本稳定在 6% 以内，肉、禽、蛋的生产成本基本稳定，其价格没有持续上涨的基础。3%-5% 的物价涨幅在目前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属可以承受范围的。

目前，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和股市价格上升较快，资本市场即是存在泡沫，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对流动性过剩的调控不断取得成效，资产泡沫问题不会进一步积累。

通货膨胀预期是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上涨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预期增强，会导致消费、投资需求加速增长，引发新一轮物价上涨。针对居民通货膨胀预期较高，应加强舆论引导，坚决打击违法涨价的行为。

美元滥发是源头

刘煜辉：

通胀本质还是货币过多导致的货币贬值，源头在于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滥发。美元对中国财富的稀释作用，还有以美元等计价资产在原材料、工业标准方面对中国经济的扼制，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日趋沉重。

未来是否会形成全面的通胀，我以为关键看预期。一旦货币贬值预期强化并扩散，人工成本的压力、地价的压力等等必然会推动制成品价格的全面上升。

现在我们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根本还没有完全展开，我们的煤电油运的价格由于政府还能控制，还低于国际水平，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而保持低通胀的关键，主要来自于民众对于政府控制价格的信心，但这种信心能维持多久？中国已经进入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除非把未来要推进的资源要素改革的步伐缓下来，那样情况只可能更糟，结构失衡加剧到一定程度，到那时，就不是仅仅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了。

未必跨入通胀时代

郭田勇：

在流动性过剩的市场条件下，我国的确面临较大的通胀的压力，但并不意味着必然进入“通胀时代”。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综合运用多种工具手段，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对流动性过剩进行有效治理，就可以遏制通胀、维护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认为，食品价格的上涨未必会传导到非食品领域、形成全面通胀。当前制造业正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激烈竞争的中下游企业消化上游成本提高的能力较强。因此，上游价格一定幅度内的上涨并不必然会传导至中下游。

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通胀通过消费者的预期传导。因此，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稳定通胀预期显得至关重要，事实上，近期央行加息政策的着眼点就在于消除广大消费者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

连续高增长负面影响凸现

李命志：

从 2003 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 10% 以上，并且还有逐步加快的趋势。连续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强烈的价格上涨压力。尽管从表面看，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是粮食和食品，但是，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供应持续超经济增长，流动性过剩没有得到遏制的背景下，没有人能够保证通货膨胀仅仅是结构性的（这是与 2004 年价格上涨不同的背景）。事实上，由于 CPI 权重中存在的问题和对服务价格上涨的行政控制，价格上涨的真正压力可能更大。此外，房地产价格和其他资产价格上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总供求关系趋于协调

张立群：





今年以来非食品价格涨幅回落，食品价格涨幅提高，并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也影响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综合供给潜力与总需求增长状态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总供求关系趋于协调，供不应求和通货膨胀的可能不仅没有增加，而且未来可能出现局部的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问题。

外资投行看法

长期通胀基础不存在

王庆：

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如果说中国进入通胀时代，那就意味着中国将进入长期的通货膨胀。但我认为，构成长期通货膨胀的基础，是一定要出现劳动力工资长期上涨趋势等状况。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出现紧张状况：其一，市场还有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其二，尽管近年工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名义 GDP、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更快，这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比名义工资增长快。

通货膨胀最终是否会传导至非食品价格，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但是，目前长期通货膨胀的基础不存在。在任何经济形势下，不管存在多少剩余劳动力，如果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一定会有通货膨胀。如果这一轮通胀最终形成通胀预期的话，最后还是体现为劳动力工资上涨压力。

因此，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通胀预期，而不是是否进入通胀时代的问题。央行需要通过加息等手段不断向市场传递信号，表明央行不会坐视不动、而会积极采取调控政策。

未来两个月最关键

陆挺：

现在处于关键时期。接下来两个半月，如果央行、发改委等部门不能成功实施调控政策，那么通胀风险可能会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导致价格整体上涨。

中国是个贸易大国，通胀向其他地区和国家传

导也是有可能的，比如中国香港和亚洲周边经济。但是目前没有事实证明，中国通胀已传导到其他经济体。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 8 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仅上涨了 1.1%，而美元对人民币在同期却贬值了 5.1%。如以人民币计价，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品价格其实是下降了。

中国进入全面通胀时代

陶冬：

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通胀时代，而流动性过剩是根本原因。中国流动性过剩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在过去几年，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迅速加强，央行不得不大量在外汇市场干预，由此带来突然增加的国内资金流动性，导致经济过热，但一开始的主要症状是过度投资、房地产热等。

最近，使得通胀上扬的催化剂是粮食、肉类短缺，把过去一直在价格上被掩盖的经济过热现象给挑明了。

食品价格不会有比较大的下降，但我担心，非食品价格会迅速上涨并扩散。资产价格的上涨，更能反映目前的经济过热情况，无论是房价、股价，过去几个月都出现失控性上涨，背后还是流动性过剩。

这轮通胀至少维持 5 年

谢国忠：

中国真正进入全面通胀从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时就已开始了。这一轮通胀周期很长，至少维持 5 年左右。现在不是讨论是否进入通胀时代的问题，而是应该讨论怎样应对通胀了。流动性过剩只是造成通胀的因素之一。

第一，通胀主要因为经济过热，出现的瓶颈很多，大家又很乐观，从而引起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又给投资和消费带来很大刺激。比如上海房地产；第二，股市等价格上涨，会带来很大的财富效应。大家就开始拼命消费，带来通胀；第三，受此刺激，很多做实业的人开始转向投资，炒房产、股票等。

资产价格泡沫领先出现，从 2005 年开始就全面





进入泡沫化。现在我们讲这些话题可能都有些晚了。中国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不讲通胀，是为了让泡沫持续下去，因为这是对某些既得利益者有利的。所以，每个国家在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候，都没办法挡住这个泡沫。中国可能在奥运会之后有小调整。

通胀可能已见顶

黄海洲：

通胀没有“失去控制”，也没有进入通胀时代。很有可能，我们已经看到今年通胀的最高点，就是 8

月份的 6.5%。我们对 2007 全年 CPI 的预测是 4.6%。未来几个月，通胀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但是通胀水平会下降。我们预测明年的 CPI 是 3.6%。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作者：丁燕敖 石贝贝

2007.09.27

中国保留对股市进行干预的权利

中国一位高级监管官员表示，虽然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建立相应机构，让市场在其监管下按自己的规律运转，但中国政府保留在必要时干预股市的权利。

特别报导

· 聚焦中国股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简称：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现年 48 岁的屠光绍周三在北京对记者做出了如上表述，但他并未暗示中国政府是否正在酝酿什么措施，也没有讨论目前中国股市的股价水平。

屠光绍强调指出，投资者应该进行自我教育，对投资股市的风险要有充分认识。随着中国股市不断飙升，有关投资者风险教育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股市当前的涨势已是难以为继。中国股市基准上证综合指数已经突破了 6,000 点，比一年前激增了两倍有余，仅今年迄今就上涨了一倍多。

屠光绍称，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发挥作用是证监会的基本原则，但是该机构也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他还表示，无论市场成熟与否，一旦市场行为扭曲导致市场失灵时，政府的宏观调控都不可避免。

他还表示，证监会一直在试着减少对股市的行政干预，以便加大市场的可预测性。但作为一位对中国股市拥有十余年经验的老将，屠光绍不愿将行

政干预的可能完全排除在外，这一事实表明如今股市的飙升已使中国政府处于非常微妙的境地。

中国官员一直以来都有操控股价、影响投资者预期的做法，目前也有人呼吁政府在这方面有更多作为，以警示投资者对似乎已经过热的股市退避三舍。中国证监会并未响应这样的呼声，这更被一些投资者看做是政府对当前股市狂飙的默许。还有一些人表示，监管机构的角色并非用来评判股价是否过高，政府应该把精力集中放在改善公司信息披露以及防止投资欺诈等问题上面。

中国股市攀升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推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令投资者对各家上市公司的前景保持乐观、中国的利率水平偏低，以及普通中国家庭缺乏其他投资渠道。这些因素还在继续推动中国股市不断上涨，尽管其估值水平已经高于其他市场。上海股市基于 2006 年收益的市盈率已经超过了 60 倍，而美国股市标准普尔 500 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还不到 20 倍。

中国股市的飙升吸引了数千万中国散户投资者首次投身股市。据美林(Merrill Lynch)估计，总体来看，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有大约 22%是证券资产，这一比例在 2005 年仅为 8.6%。然而，股民数量的猛增也意味着股市的萧条将影响到更多中国百姓。(中国的资本控制措施令沪、深两市的外国投资者数量非常有限。)

屠光绍称，面对在过去一年多来不断增加、数量庞大的新入市投资者，中国证监会正在为加强投





投资者的风险教育而付出特别努力。但他指出投资者应该自己寻找关于公司及股票的信息，毕竟证监会不是老师。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作者：Andrew Batson

2007 年 10 月 18 日

吹不破的中国“泡沫”？

两年半前，当中国股市在 1000 点附近徘徊时，中国证监会(CSRC)主席尚福林经常因为股市令人沮丧的表现而受到攻击。现在，随着主要股指已远远超越 5000 点，他又不时被人批评为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市场的陡峭上扬走势。

尚福林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投机气氛更浓了。市场的迅速上升意味着股价水平可能超越企业收益的增幅。”

中国内地股市的复苏是近年来相当值得一提的投资故事之一。在经历了 5 年的萧条之后，随着散户资金涌入股市，中国内地股市在过去两年中大幅攀升。

在中国内地，虽然有些分析师认为市场会出现短线调整，但大多数人对目前的状况比较放心，因为他们觉得股价的上涨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情况的反映。

长江证券(Changjiang Securities)驻上海的分析师钟华表示，中国内地股市相对于其它市场已不再廉价。“然而，长期而言，尤其是如果你将股市规模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比较时，我们仍认为它正处于一个合理水平，并可能继续上涨。”

然而，对于许多海外分析师而言，中国股市正日趋危险。侯伟(Fraser Howie)曾与他人合著了一本关于中国股市的书籍*。他表示：“这是个泡沫，但这个泡沫可能再持续一年。”

怀疑者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市场估值。2007 年，中国内地股市的市盈率约为 50 倍，而对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其 A 股较 H 股溢价近 100%。

另外的警告信号是不断上涨的股价对于公司利润的重要性。今年上半年，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企业收益增长了 70%。

然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驻香港的策略师娄刚(Jerry Lou)估计，今年上半年，企业的非核心业务收益（主要是股票投资）占其利润总额的比重高达 31%。因此，如果股市下行，企业收益可能

会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尽管公司治理标准有所改善，但分析师仍认为，企业对待小股东的方式存在严重不公。

纽约研究机构 RateFinancials 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对在纽约证交所(NYSE)上市的 10 大中国企业进行了研究。报告总结称，其中多数企业收益质量较低，包括坏账准备较低和现金流不足。报告还对这些企业董事会的软弱无力以及不同国有企业之间高管人员的调动提出了批评。

尽管许多分析师对目前的股价水平表示担心，但股价仍可能继续走高。经济学家担心，中国通胀率的飙升（已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将促使银行存款继续流入股市。

“持币需求可能会崩溃，”北京一位要求不具名的知名经济学家表示。“这意味着更多现金在追逐少量股票。”

当股市规模相对较小的时候，其走势对宏观经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根据某些标准衡量，中国股市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股市，且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今年开设了股票交易帐户，因此，股市大幅下跌的潜在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今年 5 月，由于担心潜在泡沫扩大，为了减少投机，中国政府出手干预，将股票交易印花税提高了两倍。然而，在股市大幅下跌后，政府官员则改变了论调，开始鼓励股市上扬。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政府将再次出手干预，为股市降温，但不是通过税收手段。“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月，政府将出台更多的政策措施，为股市降温，”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HSBC Jintrust Fund Management)驻上海的首席投资官麦家仪(Losa Mak)表示。“但这些措施可能是旨在控制流动性的市场机制。”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允许一系列大型企业在 A 股市场进行大规模首次公开发行(IPO)，以吸收市场的部分流动性。今年 9 月，中国建设银行(CCB)和中国





最大的煤矿企业中国神华(Shenhua Energy)先后打破了内地 IPO 最高纪录。政府可能还会批准设立更多投资基金用于购买海外股票,加速散户储蓄资金流向海外。

摩根大通(JP Morgan)中国股票业务主管李晶(Jing Ulrich)也认为,政府官员希望通过发行更多股票和允许更多资金投资海外,逐步为股市降温。

她表示:“政府认为,随着企业收益不断提高、股票供应扩大、中国公民投资渠道拓宽以及股指期货的推出,市场估值将逐渐下降。”然而,如果这些

加大股票供应的努力没有起到为股市降温的效果,尚福林和其他监管者将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届时,他们将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引导股价下跌,同时还不能引发投资者信心崩溃和数以百万计新一代小股东的强烈抗议。成功也会带来挑战。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杰夫·代尔(Geoff Dyer)

2007 年 10 月 12 日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再攀新高

国际清算银行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在 9 月再次创下汇改以来新高,继 8 月的 98.69 之后,9 月数值更达到了 100。该指数今年以来的升幅高达 6.19%,大大超过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升值幅度 3.96%。

在谈及有效汇率指数上升原因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推高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主要力量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和通货膨胀率速度的加快。

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与策略主管汪涛也持相同意见。她指出,在最近两个月中,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对实际有效汇率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中国 7 月 CPI 的同比增速为 5.6%,8 月 CPI 同比增速更是高涨至 6.5%。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贸易伙伴国的 CPI 平均值仍比较低,例如日本的物价上涨几乎为 0,而美国的 CPI 也仅在 2%到 3%左右。

在谈及汇率变化对中国贸易前景产生的影响时,汪涛评论道,如果一国汇率上升,其出口价格会变得贵一些;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出口价格的升幅还不及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升幅,从这方面来看,汇率变化对贸易尚未表现出很大的影响。汪涛还指出,汇率变动的影响一般要经历六到九个月的“反应期”后方能显现。

汪涛还预计,中国的通胀将会比较快地稳定下来并有所下降,所以实际有效汇率不会再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上涨。“除非中国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力度,

也就是名义汇率升值的力度,”她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那么如果名义汇率的调整不能反映,那么就会从实际汇率上反映出来,也就是国内价格上升;而如果中国的名义汇率调整,则反过来会对通胀有一定抑制作用。”

哈继铭认为,这次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对外贸顺差将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据其研究机构的计算,从长期来看,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1%,中国出口增速就会下降 1 个百分点。但哈继铭也指出,目前决定中国出口变量更重要的因素是外部需求,其弹性高达 6,也就是说,如果全球经济增速下降 1 个百分点,那么中国出口增速将下降 6 个百分点。

针对此次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幅超过美元的现象,哈继铭表示,中国的名义汇率对于美元的升值速度相对较快,但对欧元在今年以来却还是贬值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构成中,对美国的出口及增速会有所下降,而对欧元区的会有所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过去更好地抵御由于美国经济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来源:《财经》网络版 [2007-10-11]

作者:吴燕





金融书评

《货币战争》：中国版的“阴谋论”？

滑铁卢之战、六位美国总统之死、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1997-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甚至还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

在《货币战争》这本中国最新畅销书中，这些跨越两个世纪、且互不关联的事件都有着一个根本原因：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银行业家族王朝对货币发行的持久控制。

该书作者宋鸿兵声称，即便在今日，美联储仍然只是私人银行的一个傀儡，而这些私人银行最终效忠于无所不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阴谋论，可能会像那些讲述着“苏黎世侏儒”（gnomes of Zurich，传说中的一个小欧洲秘密结社组织——译者注）和华尔街操控全球金融的小册子一样无关紧要，这些散发着陈腐气息的阴谋论书籍现在仍能在西方找到。

但围绕着是否应在美国压力下开放本国金融体系，中国目前正进行着一场长时间的论战。值此之际，此书出人意料地畅销，并得到政府和商界高层人士的阅读。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Ha Jiming）表示：“某些企业的高管最近来问我，这一切是否确有其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

中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顶住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压力，这本书为他们提供了佐证，无论这些佐证多么离谱。

这本书的出版商是国有中信集团的一个下属机构。它表示，该书的销售量已达到 20 万册，并估计其盗版发行量为 40 万册。

宋鸿兵是一位信息科技咨询顾问和业余历史学家，他从 1994 年起移居美国，现居于华盛顿。他表示，他的兴趣源于揭露 1997 年亚洲危机内幕的尝试。

一开始，他将自己的发现发表在博客上，之后，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应当联系出版社，推出一个比较翔实的版本。他承认，他对这本书的成功也感到意外。

他在上海的一次新书宣传活动中表示：“我从未想到，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就连高层领导人都会阅读。中国人对金融市场中发生的事情感到紧张，但

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真正的危险。此书为他们提供了一些设想。”

他表示，最令他震惊的一件事，是他“发现”美联储是一家由私人拥有及运行的银行。他表示：“我根本想不到，央行可以是一家私营机构。”

美联储的确将自己描述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公私营元素混合体”。虽然它的 7 位行长都由美国总统任命，但私营银行确实在美联储的 12 家地区储备银行中持有股份。

但宋鸿兵忽略了政府的作用，并提出，美联储的关键职能最终是由花旗银行（Citibank）等 5 家私人银行所控制，而这些银行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对于该书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焦点，以及该书所谓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宗族特性，宋鸿兵小心谨慎地作了辩护。

他表示：“中国人认为，犹太人聪明而富有，所以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包括我在内，我认为他们真的很聪明，可能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

英国犹太人代表局（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首席执行官负责人乔恩·本杰明（Jon Benjamin）表示：“中国人最为欣赏犹太人在知识和商业方面所表现出的智慧，而这并不带有或很少带有同时代文化中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但他补充称：“不过，这本书的说法与那些关于犹太人及其影响力的最不足信及过时的谣言如出一辙。而这种说法在全球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得到流传，令人深感忧虑。”

这本书在中国的网络上受到了嘲讽，一些网评称，它夸大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残余的影响力，重复了西方原有的一些阴谋论。

哈继铭认为，这本书受到欢迎的原因是日本经济 10 多年的停滞和亚洲金融危机。他表示，这些事件给很多中国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官员仍对西方有关开放金融系统和浮动汇率的建议抱有深深的怀疑。哈继铭称：“他们认为，这只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新的手法。”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7 年 9 月 28 日

作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动荡年代》中的格林斯潘

《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冒险》(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著。

不管你是否喜欢艾伦·格林斯潘，他那完美的时机把握能力并没有因为退休而有所削弱。在执掌美联储(Fed)近20年后，这位前主席于去年卸任。就在自传出版之际，他设法安排了一场扣人心弦的金融市场危机。

有些周期性事件暴露了央行行长们之间兄弟般的神秘关系，今年夏季的市场动荡就是其中一例。在每位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初，市场通常都会设法安排一个事件。1979年，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接掌美联储两个月后，就不得不经历一场债市崩盘；格林斯潘本人上任不久就遭遇了1987年的股市崩盘。

凯恩斯：经济学应该像牙科

剑桥大学(Cambridge)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句名言(至少在央行行长圈子里颇为著名)，说他希望有一天经济学将变得像牙科那样平凡和普通。牙医们大可安枕无忧，知道自己手艺的无趣特点仍未受挑战。

央行行长渴望秩序：制定利率，调控按已知方式运行的经济，并实现价格稳定。1987年至2006年，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漫长的经济扩张期间，看上去不仅在地缘政治方面，甚至在货币政策方面也似乎达到了这种“极乐”境界。结果没有这么好运。经济增速发生了变化；金融市场以奇特的新方式发展。今年夏季的市场动荡带来了新的矛盾。资本市场的透明领域突然暴露出问题，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对此，各国央行有不同的答案。

格林斯潘自传的吸引力应该相对比较广泛——至少，与他在任时素以晦涩著称的言论相比，其行文更为流畅易懂。但从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出，即便是比多数人所知更多的格林斯潘，也远比多数人想象中知道得更少。

央行行长是与众不同的一类人。在某种程度上，既像一个国际工会，又拥有兄弟会的秩序。他们拥

有深不可测的权力和强大的内部团结(尽管近来在如何处理市场动荡方面存在分歧)，通过精心灌输的敬畏，在外人眼中树立权威。有人曾经问现任欧洲央行(ECB)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对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一个说穿了颇为古怪的计划有什么看法。日本央行当时计划购买股票，以提振日本陷入停滞的经济。“我们是一个互相赏识的协会，”他带着高卢式的幽默向一群困惑的记者表示。“因此，日本央行的任何提议一定是最好的方式。”

央行行长们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绝地议会”(Jedi Council)——一个苦练修行者的精英组织，通过天生的智慧和艰苦的训练，被委以一个重任：维护长期被黑暗世界(价格不稳定的混乱旋涡)威胁的银河系的秩序。而正如格林斯潘所表明的，在央行工作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少“仙奇”元素。央行行长们最大的秘密，是他们使用的数据基本上与其他人相同。

对美国经济的全方位深入了解

而格林斯潘本人并非如此。任何经常与他交谈的人可以证实，他最卓越之处，并不在于对货币经济学理论的高度理解，而是他在脑海中对美国经济的“螺丝钉”(当然还有日益增多的“电路板”和“光缆”)形成了确实非同一般的数据库。正如我们在《动荡年代》一些引人入胜的个人叙述中所看到的，他将儿时对于棒球统计数据以及收集与传播信息之奥妙的书生式沉迷，升华成一条职业道路，首先是在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然后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也许，只有孩提时代的艾伦·格林斯潘，才会在看完牛仔电影后崇拜电报员而非牛仔。或许，也只有艾伦·格林斯潘，才会在与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Andrea Mitchell)第一次约会时，邀请她前去他的住所，阅读他撰写的一篇有关垄断的微观经济理论论文。

正是这种对细节的了然于胸，才使他采取了一位央行行长职业生涯中最明智的举措，一个使他当之无愧受到人们崇敬的举措：他在上世纪90年代看



出了美国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并认识到,一辆刚刚增加汽缸容量的汽车,无需过早猛踩刹车以防止发动机过热。

发现事态的发展趋势(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是一回事,做出政策回应则是另一回事。美联储观察人士会从这本著作里挑出两件事,其中一件甚至并不属于央行行长的管辖范围。第一件是格林斯潘有关处理90年代股市泡沫的回忆。第二件是他承认自己错误地支持布什总统的大幅减税的措施,事实表明,这是偏离财政稳健轨道上的第一个失误。

泡沫破裂后再收拾残局

格林斯潘有关股市泡沫的叙述,似乎为他本人增色不少。当今各国央行一般把目光放在商品及服务的价格上。而格林斯潘曾做出半心半意且并不成功的尝试,以求抑制股价。他在1996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探讨“非理性繁荣”是否已主导整个股市,试图以言论来击破股市泡沫。但股市无视他的言论而大幅飙升,于是他得出结论,只有大幅上调利率(这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才能结束这种局面,而且最好是在泡沫破裂后再收拾残局,即采取措施以缓解其对经济的冲击。无论你对这场持续辩论的看法如何,他对政策回应如何演变的叙述至少非常清晰、明白和连贯。“实际上,投资者在给美联储一个教训,”他写道。“你无法说出什么时候市场估值过高,你也无法抗衡市场力量……我们再也没有试图去抑制股价了。”

相比之下,在减税问题上,他的不到位的道歉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格林斯潘的金字招牌意味着,国会各个委员会经常邀请他就各项主题发表看法。虽然美联储的权限要比职能范围更加狭窄的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和欧洲央行(ECB)宽泛得多,但有些主题与货币政策最多只有皮毛关系。

实际上,其中一些主题正是该书令人失望的下半部分的内容之一,如果将其删减,也不会对该书产生多大影响。他详细叙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他的国会证词和其它一些言论,他的思想不仅已经广为传播,而且对于任何熟知他的自由市场立场的人而言,并不令人惊讶。例如: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宣扬的那样,私有产权是个好东西;中国必须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并加快推行市场经济;对美国

和全世界的能源需求而言,液化天然气是石油的一项有益补充,不过目前提炼和交付设施的规模尚不足;法国人对于自由市场的拥护程度不如美国人;等等。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如果问格林斯潘关于纽约杨基队(New York Yankees)投球轮换问题,这位终生喜爱棒球的美联储前主席无疑也会对此提出一个拥有实证基础和经过广泛调研的观点。至于税收政策——美国政治中两三个最具冲击力的问题之一,也是国会山正当权限范围内的问题——格林斯潘对发言权的痴迷造成了真正的危害。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格林斯潘曾支持过削减结构性联邦预算赤字的艰难努力,但布什在2001年刚刚就职,格林斯潘就对其提出的大规模减税计划给予了致命的支持。

格林斯潘对此辩护称,他还支持了相关“触发方案”,如果财政盈余开始下降(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触发方案”就会降低减税的幅度。这种幼稚近乎狡辩。他肯定看到了布什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立场。正如民主党财政保守派提前警告过他的那样,他的证词被一个倾向于将勉强赢得(或者说根本未赢得)的选民授权运用到极致的政府所利用了。他的证词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更高联邦支出和更大幅度减税的毁灭性循环,从而破坏了格林斯潘的另一个共和党信念——由于减税幅度存在上限,因此,它比增加联邦支出的破坏性要小。联邦支出可以一直上升,但税率不可能降到零。由于布什的共和党统治着白宫,并且正如格林斯潘本人指出的那样,拒绝动用联邦支出否决权,因此,增加联邦支出和减税并不是两者取其一,而是同时实行。

误判华盛顿政治气氛

不出预料,布什政府随后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格林斯潘传达的主要信息,避而不谈这些观点的前提条件。格林斯潘现在承认,他误判了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但对其想法又做出了如下注释:“我是一名分析师,不是一名政客;如果我需要担心自己任何言论的政治影响,这份工作就没有乐趣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不是一名分析师,他是美联储主席,至少是世界上第二有权势的人。要么在他的任务排名中,“寻找乐趣”比应得的位置要高,要么正如人们一直怀疑的那样,这个在政治精明的人,是在迎





合一个将忠诚置于所有美德之上的新一届政府。

实际上，减税政策的失败，是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另一位美联储主席具有如此广泛影响力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件好事。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证明货币政策制定者应将其活动局限在设定货币政策上，并且仅对其它事件如何影响这一任务发表评论。

我听到过的关于格林斯潘的最明智的话之一，是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说的。他经常与格林斯潘争论，在大量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格林斯潘显然对他由衷地尊重。弗兰克是一位民主党议员，目前担任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而格林斯潘继任者直接向该委员会汇报。弗兰克表示，“无敌光环很不利于民主。马克思说自己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格林斯潘也从来不是一名格林斯潘崇拜者。”

正如格林斯潘本人提到上世纪 90 年代股市繁荣时说到的那样：“人们会在街上拦住我，感谢我为他们的 401k 计划（养老金储蓄计划）做出的贡献。我会很诚恳地回应。不过，我承认，我偶尔不禁想说：‘夫人，我跟你的 401k 计划没有任何关系’。人们为一些你没有做过的事而感谢你，这种感觉令人非常不自在。”

中央银行学无法成为牙医术，不仅仅因为在一个既定框架内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经济走向何方？利率应如何变化？其根本的原因，是各国央行行长需要的思考、判断和行动方式——无论“无所不知”的面具暗示着什么，他们都同其他人一样，强烈地感受着有关这种方式的不确定性。那么，艾伦·格林斯潘留下了什么遗产呢？这还需要更多的数据。目前谈论这个还为时太早。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世界贸易编辑。2002 年至 2004 年间，他在华盛顿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联储新闻。在 1998 年加入英国《金融时报》之前，他曾是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的一名经济学家。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7 年 9 月 29 日

作者：艾伦·贝蒂(Alan Beattie)；译者：何黎





Guide:

- ✧ **The Key for Successful Reader-writer Interaction: Factors Affec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L2 Revisited**
- ✧ **The TOEIC Game**

Abstract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a very complex process and in order to grasp how readers make sense of written symbols,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proces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the role of factors leading to the product of this process be

understood properly.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studie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iming to clarify its nature and attempting to illustrate how the task of comprehension is accomplished. However, there seems to be no systematic framework incorporating the vast array of factors involved in affect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writer.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learer framework for better appreciating the interplay of variables playing a part in the success of written communica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EFL contexts.

Key words: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ader-writer interaction, L2 reading, TEFL/EFL/ESL

Background

Reading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form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Kollers, 1973, p. 29) and is probably the 'most extensively researched' language skill (Bachman, 2000, p. x). Reading can be claimed to date back to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at least 5000 years ago (Orasanu & Penny, 1986, p. 1). Jennings (1982, p. 3) even asserts that 'reading is older than printing or writing or even language itself.' The complex processes involved in reading, however, remained largely uninvestigated until the mid-19th century (Vernon, 1984, p.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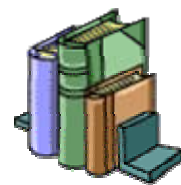
Since then,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looked at the same entity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have reached somewhat different conclus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ding. Discrepancy of views has partly been the result of the different purposes with which researchers have approached reading. While some have studied reading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processes, others have tried to identify its sub-skills for teaching and testing purposes. Although many researchers have endeavoured to reveal its true nature, all attempts to do so have only partially been successful; and the literature on reading is lacking an organized model accounting for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ommunication attempts between the text-producer and the receiver. The present paper, therefore, aims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through illustrating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which exist between so many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success of the reader-writer interaction, namely reading comprehension.



Generally speaking, two factors may influence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nal factors, called reader variable here, refer to everything related to the reader such as his/her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strategies,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affective characteristics. External factors, called text variable, context variable, and writer variable in this study, refer to all factors external to the reader. Text variable includes such elements as text modality and text-characteristics (lexical density, structural complexity, etc.). Context variable refers to all situational elements such as the time of reading and the place of reading, as well as the larger socio-economic context. Writer variable refers to the text-producer. Each variable is discussed in some detail in turn.

Reader variable

There is little dispute among researchers that the reader plays the central role in an act of reading. While the reader was once believed to be a passive receiver of information, he/she is now considered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a reading activity. The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reader,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other variables have no influence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Rather, the ultimate product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other variables. Based mainly on the research and arguments of Goodman (1968; 1970; 1973) and Smith (1971; 1973a, b), it is now accepted unanimously that the reader contributes more than 'the visual symbols on the page' do (Grabe, 1991, p. 377). However, each reader's contribution will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s because readers are different in their 'shared knowledge, language skills, strategies ... and "othe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lderson, 2000, p. 128).



Although visual input is necessary for reading to take place, it is not enough for successful comprehension. Non-visual information, or what the reader already has, plays a major role (Smith, 1973a). This non-visual information, or what the brain imposes upon the eye (Smith & Holmes, 1973, p. 50), has generally been known as background knowledge. This knowledge, also referred to as content schemata (Singhal, 1998, p. 2), refers to one's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he culture, and the language. According to Anderson and Freebody (1981, p. 84) 'background knowledge is crucial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hnston (1983, p. 30) distinguishes betwe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background knowledge. While the former refers to inappropriate background knowledge leading to a 'completely inappropriate model of text meaning' (p. 31), the latter refers to a reader's lack of related background knowledge (e.g., a rural student reading about city metro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differences in background knowledge 'may indeed account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variance in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s in normal reading situations' (Jenkins & Pany, 1981, p. 167), and that such differences affect the ease or difficulty with which one understands a text (Singhal, 1998, p. 2).

In discussions on background knowledge, particular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schema in organising and activating the reader's background knowledge. Schema theory, which come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owes much to the work of Bartlett (Rumelhart, 1981, p. 3) and Piaget (Orasanu & Penney, 1986, p. 6). Schemata, the plural form of schema, also called '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 (Rumelhart, 1981, p. 3), refer to 'abstract knowledge structure[s] stored in memory'



(Garner, 1987, p. 4). In fact, 'The role tha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lays in comprehension has been formalised in schema theory' (Kitao & Kitao, 2000, p. 2). 'According to schema theories all knowledge is packed into units ... [which] are the schemata. Embedded in these packets of knowledge, in addition to the knowledge itself, is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is knowledge is to be used' (Rumelhart, 1981, p. 4; Rumelhart, 1984, p. 2). In schema theory, comprehension of a text involves activation of relevant schemata, which are initiated as a result of 'bottom-up observation' (Rumelhart, 1981, p. 18), and proceeds through a constant process of testing the activated schemata, evaluating their suitability, and refining or discarding them (Johnston, 1983, p. 17; Rumelhart, 1984, pp. 3, 6). The schemata or old information which 'provide general "ideational scaffolding" for new information' (Garner, 1987, p. 7) are activated to make new incoming information comprehensible. According to Alderson (2000, p. 17) schemata act as 'filters' for new informati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schema theory 'is not a well-defined framework for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Grabe, 1991, p. 389), 'it has been an extremely useful notion for describing how prior knowledge is integrated in memory and used in higher-level memory processes' (p. 390).

A similar theory to schema, proposed mainly to account for learning, is 'constructivism'.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i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Jean Piaget, who articulated mechanisms by which knowledge is internalized by learners. As its name implies, constructivism emphasises the building (i.e., constructing) that occurs in people's minds

when they learn. Based on this theory, what a learner intakes depends more on what is already stored in that his/her brain than on what is actually read, heard or observed. In other words, every individual constructs a unique mental image by combining information in their heads with the information they receive using their senses.

Proponents of this theory contend that human beings are not passive recipients of information; namely, learners actively take knowledge, connect it to previously assimilated knowledge and make it theirs by constructing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Cheek, 1992). A similar phenomenon may be claimed to take place while a reader is trying to decipher written symbols.

Singhal (1998, p. 2)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ree types of schema: content schema, which refers to one's background or world knowledge; formal schema, also known as textual schema, which refers to one's knowledge about a text's organisational and rhetorical structure; and language or linguistic schema, which refers to one's knowledge of lexicon, syntax, and semantic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hile L2 readers bring their L1 content and formal schema to L2 situations, they need to develop L2 language schema from the beginning.

Sometimes the existence of the relevant schema may distort rather than facilitate comprehension (Rumelhart, 1981, p. 21).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y rely too much upon what one might know. Lack of relevant schemata has also been reported to hinder comprehension. Studying 7-year-old pupils' story comprehension, Rosowsky (2000, p. 46) reported that while all the pupils 'unanimously "understood" the word "heroine" in a story



they were reading ... What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was how and why this class A drug had turned up in a story about heroes.'

A component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called cultural knowledge in this study, is responsible for distortion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s a result of a mismatch in L1 and L2 cultural schemata. Cultural knowledge gains importance when a reader reads a text with cultural elements with which he/she is less familiar. Steffenson, Joag-Dev and Anderson (1979) and Steffenson and Joag-Dev (1984) report that cultural knowledg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and Indian readers led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exts about marriage in these cultures. Comparing Iranians and Americans on their comprehension of culturally-biased folklore stories, Johnson (1981, p. 169) found that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e story had more effect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ESL students than the level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mplexity.' Rosowsky's (2000, p. 50) study with Asian bilingual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K also revealed that reading comprehension was much influenced by 'cultural bias'.

Accordingly, a beginning Iranian EFL learner may become puzzled on reading that Johnny goes to school on Fridays and that the school is closed on Saturdays and Sundays. The simpl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he/she uses understanding the text but since and L2 situations in this regard, the (In Iran, and many other Islamic Thursday and Friday, rather than the notion that the Iranian calendar (Saturday), whereas in L2 situation



his/her L1 cultural knowledge in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L1 attempt for comprehension fails. counties, weekend days are Saturday and Sunday). Likewise week starts with the first weekday (American culture) it starts with a

weekend day (Sunday) rather than the first weekday, may cause some comprehension problems. Also an Iranian EFL learner reading texts about traffic regulations may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that drivers should keep left rather than right while driving, as is the normal practice in the UK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Similarly, Iranian EFL readers may have problems in understanding why plugs and sockets are three- rather than two-pinned; how it is possible to hear a public phone ringing in the street; how one can have his/her photo taken using a machine with nobody else to take the photo; and so on. No doubt, some of th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progress made in technology.

Another element of reader variable is knowledge of language, or linguistic knowledge. According to Alderson (2000, p. 80), linguistic knowledge includes 'phonological, orthographic, morphologic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information' and 'discourse-level knowledge, including ... text organisation and cohesion, text types and associated conventions, as well as metalinguistic knowledge'. An example of phonological-orthographic language knowledge is the knowledge that not all types of consonant cluster in English can occur at the initial or final word positions (Zakaluk, 2000, p. 8).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phon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pattern of Iranian EFL readers' L1 and L2 may introduce some problems at least for beginning readers. For example, no consonant clusters can occur at the initial word position and none with more than two phonemes anywhere else in a word in Farsi,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Iran.



Along the same lines, one's knowledge of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patterns of the language will facilitate the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speed (Anderson & Freebody, 1981, p. 80). In the case of L2 learning, similar patterns brought from the L1 situation will help at all linguistic levels (i.e., phonological, orthographic, etc.). Semantic knowledge, or the knowledge of word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compared to other linguistic knowledge types. There is no dispute among researchers that vocabulary knowledge is crucial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erson & Freebody, 1981, p. 77; Jenkins & Pany, 1981, p. 176; Johnston, 1983, p. 14; Grabe, 1991, p. 392; Schoonen, Hulstijn & Bossers, 1998, p. 98; Khaldieh, 2001). Coleman (1971) reports that lexical complexity of texts account for 80% of the variance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Anderson & Freebody, 1981, p. 80), implying that the higher one's degree of lexical knowledge,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comprehension. Schoonen et al. (1998, p. 87) bring evidence that in the case of L1, 60% of the variance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related to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that 'FL [Foreign Language] vocabulary is the best predictor of FL reading comprehension' (p. 89).

One's knowledge of discourse and text structure has also been reported to affect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example, understanding coherence, or superficially non-existent relations between sentences, is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aylor, 1985, p. 2). A difference in text-organisation in L1 and L2 is a potential source of misunderstanding. An instance of this is the system of writing addresses in Farsi and in English: while Farsi speakers move from more general to more specific in writing addresses and do not begin each heading on a separate line, the reverse is true in English.

Readers from a different linguistic environment and speaking a non-standard dialect may face problems in reading not only because of sub-culture differences but also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knowledge. As Zakaluk (2000, p. 8) points out, in some non-standard dialect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pronunciation of special items between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codes, such as 'test' pronounced as 'tess', 'mend' pronounced as 'men', 'find' pronounced as 'fine', and 'cold' pronounced as 'coal'. However, whether such differences in pronunciation pose any reading difficulties has not been shown (p. 9). In a nutshell, it seems that even though cultural and background knowledge play a great role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without linguistic knowledge, no reading may exist at all.

Another reader characteristic that influence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one's cognitive abilities. Readers with normal cognitive abilities vary slightly in their performances and this is perhaps why some scholars relate reading to thinking. Goodman (1970, p. 108), for example, notes that efficient reading results from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ought and language.' Others have emphasised readers' cognitive strategies and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in affec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Baker & Brown, 1984, p. 34; Aslanian, 1985, p. 20; Johnson, 1998, p. 23; Schoonen et al., 1998, p. 75).

The point is not, however, having a certain type of knowledge; rather the reader's ability and success in activating and using that knowledge and relating new information to old information seem to be vit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der's (cognitive) ability to link al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writer-intended meaning has been recognised by Trabasso (1981, p. 56), Lorch and van den Broek (1997, p. 214), and Johnson (1998, p. 22). Lorch and van den Broek (1997, p. 244), for instance, assert th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good predictor of variance in both overall reading ability ... and specific reading skills.' Similarly, Rumelhart (1984, p. 19) compares reading comprehension to 'a detective act' where the reader has to use his/her cognitive ability to connect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 situ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This implies that one's degree of comprehension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his/her background, cultural, and language knowledge but also by his/her cognitive abilities including intelligence. The resulting comprehens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and other factors elaborated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n often-neglected aspect of the reader is his/her affective state. The affective state refers, on the one hand, to a reader's purposes, perspectives, motivation, emotional mood, etc., prior to read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ers to the affective responses brought about by the text while

reading. A reader may read the same text at different time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n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attention paid to information on the page, and therefore,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comprehension. The influence of one's goals, views, and emotional state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has been documented by Garner (1987, p. 7), Lorch and van den Broek (1997, p. 237), Pressley (1997, p. 248), and Alderson (2000, p. 80). The way affective responses during reading may affect the direction of reading and the extent of the reader's cognitive involvement have been discussed by Carroll (1970, p. 30), Lorch and van den Broek (1997, p. 233), and Alderson (2000, p. 83).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several factors contribute to shaping the ultimate comprehension. First, all aspects of the reader variable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secondly, they interact with textu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 and finally,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writer. All of these affect the success of communic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has been documented by Smith (1971, p. 195), Johnston (1983, p. 21), Alderson and Urquhart (1984, p. xvi), Aslanian (1985, p. 20), Geva (1992, p. 734), and Alderson (2000, p. 3). The reader-writer interaction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Smith (1971, p. 13) and Colley (1987, p. 113). It seems almost impossible, however,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exact degree of contribution of each variable to the final product.

Text variable

The second important variable which considerably affec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text variable, since without written material, there will be no reading at all. Nuttall (1982, p. 15) believes that text is 'the core of the reading process'. Text, or written discourse, is the product of the writer's thought expressed through some visible shapes, whether alphabetic or ideographic, printed or hand-written, something kinesthetic or written in Braille, written on a piece of paper, carved on a stone, or displayed on a computer screen. The factors



subsumed under the text heading include graphic, para-linguistic, linguistic, and organis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 text, and text types. What follows is a brief look at these text-related elements.

No doubt the first text characteristic is whether the symbols and the code used are familiar to the reader or not, i.e., whether it uses Latin symbols, Chinese symbols, Arabic symbols, etc., and whether the code or language is familiar. Although there should be a complete match between the symbols and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text and those possessed by the reader, this is by no means a guarantee for the reader's success. Goodman (1973, p. 26) believes that because readers read for meaning and with minimal use of graphic cues, the differences in L1 and L2 in terms of direction of reading (right-to-left in Farsi, top-to-bottom in Japanese, left to right in English) will not affect 'the basic reading process' considerably. While Grabe (1991, p. 387) agrees that direction of reading will not influence reading comprehension, Kitao and Kitao (2000, p. 4) contend that Japanese English readers may face problems for this reason. It seems that while such differences may be problematic in early stages of reading, they will become less important as readers get more exposure to and fluency in L2 reading (Grabe, 1991, p. 387).

Similarly there has also been some attention paid to whether para-linguistic features of a text, i.e., capitalisation, underlining, paragraph headings, and subtitles have any influence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ccording to Johnston (1972), these graphic cues signal meaning, but ESL students do not give such cues due attention; instead, they focus on 'phonologically related graphic aspects of individual words' (in McLeod & McLaughlin, 1986, p. 115). Lorch, Lorch and Klusewitz (1995, p. 51) report that underlining, or 'light signalling', helps the reader's recall in comparison with no underlining and 'heavy signalling' in which important information is underlined along with some non-important information. Their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while capitalisation reduces reading speed, it improves the memory for recalling capitalised information.

Jenkins and Pany (1981) cite studies by several researchers, in some of which paragraph and title headings helped readers to 'answer more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correctly' (p. 169), and in others, carried out with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separately, 'no advantage was found for passages with paragraph headings' (p. 170). Pictures in text have been recognised as having a positive effect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give the reader 'broader and deeper background knowledge' (Jenkins & Pany, 1981, p. 171). On the other hand, Maxwell (1994, p. 69) brings evidence from a study done by Grant and Davey (1991) in which paragraph or title headings did not seem to influence 'overall comprehension'.

More important text characteristics in affecting comprehension include lexical density, syntactic complexity, and semantic abstractness. The influenc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lexical density as well as passage length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has been emphasized by Johnston (1983, p. 21) and Alderson (2000, p. 127). Complexity of structure accompanied by sentence length has also been reported to reduce text comprehensibility (Pearson & Camperell, 1981, p. 33). An issue in structural complexity has been the transformational distance between a sentence's surface and deep structures, i.e., the shorter the distance, the



easier the comprehension. Therefore, kernel sentences (simple, active, and declaratives) are expected to be understood more easily and rapidly than non-kernel transformed sentences such as interrogatives and passives (Pearson & Camperell, 1981, p. 32). Differences in syntactic structures between L1 and L2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as a source of reading problems for L2 learners. For example, German EFL readers might face problems because they 'attend more to function words' in their language, while English readers 'attend more to content words' (Grabe, 1991, p. 388).

To reduce the degree of lexical density and syntactic complexity, some have suggested simplification, arguing that linguistic simplification increases readers' comprehension (Yano, Long & Ross, 1994, p. 189). 'Elaborate modification' has been used as another alternative to reduce text difficulty, in which texts are elaborated with the hope that 'redundancy and explicitness compensate for unknown linguistic items.' Simplification has, however, proved to be a better tool than elaboration (Yano et al., 1994, p. 211). Alderson (2000, p. 82), however, questions the former on the grounds that simplification 'not only does ... disauthenticate the text, it also risks making the texts harder to understand.' As an alternative, he suggests developing easier tasks or test questions.

Structural complexity, also called micro-structure variation, is different from macro-structure variation in that the former operates on the intra-sentential level, but the latter deals with organisational variation on the inter-sentential and discourse level. The changes in a text's macro-structure, e.g., changing the place of main and subordinating ideas, have been reported to disturb comprehension (Pearson & Camperell, 1981, p. 32). Johnson (1981, p. 169) notes that organisation of ideas in a text affec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more than its language complexity. Johnston (1983, p. 25) cites a study by Freebody (1980) in which 'the order in which subjects read passages affected their comprehension.' Grabe (1991, p. 338) mentions a study done by Carrell (1984) with readers from Spanish, Asian, and Arabic language backgrounds in which different cultures favoured different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s, which in turn affected readers' recall and comprehension. Similarly, Maxwell (1994, p. 68) reports a study by Dee-Lucas and Larkin (1990) in which the change of rhetorical organisation affected the degre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Singhal (1998, p. 4) confirms that 'differences in text structure can lead to differences in reading.'

Semantic abstractness refers to the notion of whether ideas expressed in the text are easy enough for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an issue also connected to the reader's background knowledge. Apart from semantic abstractness, the 'density of arguments in propositions' also affec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hnston, 1983, p. 22).

Text type, topic, genre and writer's style have also been recognised as factors affec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Alderson, 2000, pp 83, 127). Welrich (1998) distinguishes five text types: descriptive, narrative, expository, argumentative, and instructive (ibid.). To be added to this list is poetry. Clearly, the kind of reading and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each type requires are somehow different from others. As Johnson (1998, p. 22) points out, while narrative texts are

mainly read for enjoyment, expository texts have the goal of giving information, and therefore, 'narrative texts can never be comprehended; they can only be experienced.'



Another text-related factor important for comprehension is coherence and cohesion. Text-related context, or co-text, has been shown to facilitate comprehension, recall, and reading speed (Smith, 1973a, p. 75; Smith & Holmes, 1973, p. 60; Zakaluk, 2000, p. 15). Text meaningfulness is usually conveyed through local coherence, or cohesion, and global coherence, simply called coherence (Colley, 1987, p. 129). The existence of logical relation markers or discourse markers, such as conjunctions has been reported to facilitate reading comprehension (Geva, 1992, p. 731). Coherenc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more crucial than cohesion because, as Nuttall (1982, p. 16) points out, a text which is not coherent will be nonsense, although it may be cohesive.

The way new and old information is organized in the text has also been shown to affect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example, Colley (1987, p. 130) observed that if 'the given information and its antecedent are separated by intervening material,' cohesion is reduced or lost,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the text. Therefore, foregrounding the given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backgrounding it, i.e., keeping it active in the mind of the reader by keeping it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its antecedent, makes the text more cohesive and easier to understand.

One of the text characteristics is how far it presumes the reader to have the necessary background knowledge. Some texts have been reported to lead to incomprehension or misunderstanding because they do not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effective bottom-up clues to activate the related schemata (Rumelhart, 1981, p. 22, & 1984, pp. 7, 19; Kitao & Kitao, 2000, p. 2). Another text-related factor is the nature and the number of inferences the text invites the readers to make (Lorch & van den Broek, 1997, p. 219). The time it takes a reader to make inferences, such as referential and causal inferences,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these inferences are made may be pot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eed and the degre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L2 reading, inferences can be made using L1 or L2 cues or a combination of these (Ringbom, 1992, p. 100).

Context variable

Although researchers have mainly emphasized the role of reader and text and als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Alderson & Urquhart, 1984, p. xvi, for example), the role of context has largely remained unnoticed. Context refers to something beyond the text itself, and therefore, is not to be mistaken with textual context or co-text. Generally, context variable refers to all reader-, writer-, and text-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and situational elements, and the larger socio-economic context. As Walberg, Hare and Pulliam (1981, p. 154) rightly emphasize, comprehension may not be blocked due to the absence of linguistic or background knowledge but 'due to environmental distractions'. Comprehension may, therefore, be affected by the time of reading, i.e., early in the morning, after a day's work, etc.; and also by the place of reading, i.e., in the library, in the classroom, in an exam session, in a car, etc. Although such environmental elements may be considered trivial, their potentiality for affecting comprehension, small as it may be,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ere seems to be little research addressing the above issues. Studying 368 Nigerian primary students, Williams (1981, p. 31)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elements like school type (whether private or public, for example), degree of exposure to mass media, and subjects' language environment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ir reading performance in ESL. Walczyk, Kelly, Meche and Braud's (1999)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ime-limit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veals that with no time-limit, 'readers are not probably being optimally challenged' (p. 158), and with severe time pressure, readers do not think critically (p. 157), and that 'the best reading comprehension was observed under mild time pressure' (p. 156) because of the readers' being probably more mindful (p. 164). 

Another contextual factor is the social setting in which the act of reading takes place. Reading does not take place in a vacuum (Alderson, 2000, p. 25) and the situation in which it occurs may have an impact on how it is comprehended. For instance, the sign 'No entry' means 'Please, do not enter.' However, the situation in which a reader reads it may change its meaning. If one notices the sign on a private room, it tell 'outsiders' not to enter the room, but not to the occupier himself/herself. However, if one notices the same sign at the entrance to a street, it means different things depending on whether one is driving or walking. To use Widdowson's (1978) terms, while the sign has a single significance, it has different values depending on settings in which it occurs. The kind of comprehension gain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context, which may be called pragmatic comprehension, indicates how differences in situational contexts can result i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are, therefore, a potential source of miscomprehension if the reader does not attend to contextual elements. Similarly, the meaning of 'prayer' depends on whether it is said in a church or in a mosque. Here, the difference both in situation and in culture contributes to the value of the word.

The influence of pictures, charts, etc. was examined in the discussion under text variable as para-linguistic elements. Goodman (1968, p. 21), however, believes that such cues are external to language and reader, thus forcing them to come under our category of contextual elements. However, they are, in essence, different from our definition of context which covers environmental, situational, and social elements.

Writer variable

Undoubtedly, the essence of a text owes much to its producer, i.e., the writer. Although the writer does not influence the reading act as directly as other variables do, he/she contributes the most to the reading act, indirectly though. The kind of interaction that the reader has with the writer may not be similar to the kind of interaction he/she has with the text, or the kind of communication a listener has with a speaker, as in both these latter cases both of the communication or interaction parties are present. However, the reader and the writer can be supposed to have some abstract form of interaction/communication, because when producing the text, the writer most certainly tak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her readers into account (Nuttall, 1982, p. 14; Johnston, 1983, p. 14).





Similarly, while reading a text, the reader intuitively constructs a picture of who the writer had in mind; and the more the reader is familiar with the writer's style and purposes, the more successful he/she will be in 'getting' his/her message,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In reading, the reader cannot consult the writer to clarify ambiguities, which is why readers ultimately get less or more than the intended message, and that the 'intended meaning is ultimately unknowable' (Johnston, 1983, p. 11). Taylor (1985) argues that there is an a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writer in that the reader tries to get the meaning out of the text by bringing meaning to the written material.

Obviously, the writer's assumptions about the reader will not always come true, and because no two people may have exactly the same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re always is a mismatch of some kind' between the writer's and the reader's background and expectations (Nuttall, 1982, p. 7). Nonetheless, the writer should still be as helpful as possible, adhering to what Grice (1975) called 'co-operative principle' for oral discourse (Pearson & Camperell, 1981, p. 30; Johnston, 1983, p. 27). Therefore, the degre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depends on the 'a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writer and reader' (Taylor, 1985, p. 5)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nteraction of other factors previously described on the other.

L1-L2 relationship



All the variables discussed so far influence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any language. When a reader can already read in a language and tries to read in a second language, another element, i.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and L2, is added to the previous factors. The following is a short review of research and argumen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Most of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read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comes from research in first language (Alderson & Urquhart, 1984, p. xv; Grabe, 1991, p. 378; Chun & Plass, 1997, p. 61), and therefore, the majority of findings from L1 situations have been readily generalised for L2 situations with little consideration given to potential differences. However, such generalisations may not always be true and, as Grabe (1991, p. 389) puts it, L1 research findings 'cannot always be applied directly to L2 contex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has been studied from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le some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reading i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in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other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the role of L1 reading ability in L2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udies in the former group have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in L1 and in L2 and virtually in any other language (Singhal, 1998, p. 3), they have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dimensions to reading which are unique to a second language (Wade-Woolley, 1999, p. 448). Researchers in the latter group have spoken up for a balance between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reshold hypotheses (Ulijn & Salager-Meyer, 1998, p. 83; Taillefer & Pugh, 1998, p. 98; Yamashita, 2002, p. 92).

In terms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Goodman (1973, p. 27) argues that reading is 'much the same for all languages' implying that a good reader in L1 will also be a good reader in L2. Such a similarity between L1 and L2 not only in terms of reading but also other





language skills and mainly spoken skills has been proposed by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ers (e.g., Krashen, 1981). MacLean (1984) reports another similarity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in terms of the speed of reading. His longitudinal study with one subject who read a variety of texts in L1 and L2 showed that she read all passages at nearly the same speed and that 'she exhibited minimal flexibility in her reading rate across the passages' (p. 61).

Jonz's (1994, p. 305) study showed that non-native speakers were less sensitive than natives to textual sequence and he concluded that 'the non-natives depended more on bottom up processing ... than on top down processing'. It should be mentioned, however, that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ing Jonz is talking about is based on reading cloze-format texts rather than normal texts. Singhal (1998, p. 1) argues that reading in either language requires the possession of certain types of schema (content, formal, linguistic); in both cases reading is do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both L1 and L2 readers use similar read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While Singhal's last assertion seems to have been confirmed by studies done by Block (1986; 1992), who found that L1 and L2 readers used similar reading strategies and comprehension-monitoring processes (Li & Munby, 1996, p. 201), his claim that effective readers in L1 and L2 use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processes (p. 1),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substantiated by Jonz's study above. In either case, howev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variab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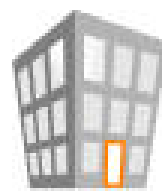
While Alderson and Urquhart (1984, p. xv) suggest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are less clear, many other researchers have pointed out differences and explained the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Chun and Plass (1997, p. 63) note that while L1 readers are mainly involved in higher-level processing such as generating inferences, L2 read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lower-level processes'. They divide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into three groups: background knowledge differences; language processing differences; and social context differences, i.e., 'expectations about reading and how texts can be used' (p. 62).

On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is that while L1 readers are already proficient enough in the spoken language, having acquired 5,000 to 7,000 words and a working knowledge of the grammar by the time they start reading (Grabe, 1991, p. 387), L2 readers only start learning these aspect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t the time they start reading. However, many L2 learners already do have the experience of reading in their own language from which they will have built up additional 'world knowledge' (Chun & Plass, 1997, p. 62). The case is different for L2 readers who do not know reading in L1 (Alderson, 2000, p. 24). An L2 reader's L1 can help or disturb his/her reading depending on the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in orthographic, lexical, syntact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Ringbom, 1992, pp. 88, 90; Chun & Plass, 1997, p. 62).

Cziko (1994, p. 151) cites a study done by Hatch, Polin and Part (1974), who found that while L1 readers mainly relied on contentives, L2 readers relied both on contentives and syntactically redundant elements in comprehending cloze passages. His own study showed that only advanced non-native readers as well as L1 readers could use semantic constraints in cloze tests while less



advanced L2 students were able to use syntactic constraints only (p. 154). According to Ulijn and Salager-Meyer (1998, p. 81), while L2 reading problems are attributed to L2 language problems, L1 reading problems are attributed to problems within reading itself. According to Li and Munby (1996), translation, which may take the form of mental conversion, is a reading strategy unique to L2.



To summarise the research findings discussed so far, several reas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by different researcher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Grabe, 1991, p. 387; Singhal, 1998, p. 3; Mitchell & Myles, 1998, p. 61). The above researchers have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 L2 learners are cognitively mature;
- L2 learners already know at least one other language;
- L2 learners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motivation for reading in L2 than L1 learners have for L1 (L2 learners are motivated both instrumentally and integratively) (Mitchell & Myles, 1998);
- L1 readers already have a big vocabulary repertoire and know grammar when beginning to read, while L2 readers begin from scratch;
- Older L2 readers have a more well-developed conceptual sense of the world;
- L2 readers make elaborate logical inferences from the text;
- L2 readers make more us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Grabe, 1991);
- L2 learners draw upon strategies of first-language learning, knowledge of likely language systems, and knowledge of how language operates socially;
- L2 readers operate in a different linguistic context (use different vocabulary and grammar);
- L2 readers may not have the relevant cultural/background knowledge (Singhal, 1998).

The above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makes the task of the L2 reader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L1 reader; and comprehension failure may occur for an L2 reader if he/she is either not fully competent in the language and/or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cultural knowledge he/she processes and that required to function successfully in L2 context (Wallwork: 1978, p. 83; Montgomery, 1986, pp. 174-75).

A controversial issue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is how far reading ability in L2 is affected by L1 reading ability. The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 or reading universals, assumes that the process of reading in all languages is the same (Goodman, 1973, p. 27) and once the related ability is acquired in one language, it is easily transferable to all other subsequent languages; that 'we really only learn to read once' (Taylor, 1985, p. 4); and that L2 readers do not need to gain proficiency in L2 reading ability if they have acquired such an ability in L1 (Chun & Plass, 1997, p. 63).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called threshold hypothesis, 'short circuit hypothesis' (Chun & Plass, 1997, p. 63) and 'lexical threshold' (Ulijn & Salager-Meyer, 1998, p. 81), was introduced by  Alderson (1984; 2000). In this hypothesis, before L1 reading ability can be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o L2 situation, a certain language threshold level needs to be attained by L2 reader (Alderson, 2000, p. 23). In this view, both L1 reading ability and L2 linguistic knowledge contribute to the reading ability in L2 (Alderson, 2000, p. 122). Both hypotheses presuppose that reading ability in any language is different from linguistic ability or language-specific knowledge, and therefore, a good reader in L1 would be a good reader in L2 (Schoonen et al., 1998, p. 73).

Empirical studies, however, have not found a high degre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L1 and L2, indicating that not all L1 reading ability is transferable to L2 situations. For example, Groebel (1980) conducted a study with 454 university students (L1 was Hebrew and L2 was English for most subject in the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L1 and L2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as 0.315 (p. 57). She concludes that when reading involves higher levels of comprehension,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comprehension (p. 59). Studying Dutch EFL learners, Schoonen et al. (1998, p. 96) found that L1 and L2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rrelate substantially, but not highly; about 38% ... of the variance is common.' They also report other studies in which a low degree of correlation has been found between reading ability in L1 and L2 (p. 73). Schoonen et al. (1998, p. 74) rightly emphasise that even if L1 reading ability transfers to L2 reading, not all that ability is transferable because the reading ability is composed of both L1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language-independent general reading skills, of which only the latter are transferable.

Taillefer and Pugh (1998) studied the L1-L2 reading relationship with 39 subjects for whom French was L1 and English was L2. Thei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strong L1 readers who were weak in L2 linguistic knowledge were poor L2 readers, but they were better readers than those who were poor L1 readers and also weak in L2. They also found that those readers who were strong in L1 reading and in L2 linguistic knowledge were equally efficient readers in either L1 or L2 (p. 96). They conclude that good L1 readers 'who are good "linguists" in L2' have no difficulty in transferring their L1 reading strategies to L2. They also assert, based on their findings, that 'reading is not "just" reading' for those L2 readers who are weak in either L1 reading or L2 linguistic knowledge or both (p. 105).

Reviewing a few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and L2 reading, Yamashita (2002, p. 82) concludes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L1 reading ability increases when learners' L2 proficiency level becomes higher' and that 'L1 reading ability is more likely to be transferred when the [L2] reading task is less demanding.' She cites a study carried out by Carrell (1991) with English Spanish readers and Spanish English readers, in which it was found that Span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for the former group, but the Spanish reading ability was a stronger predictor for the latter group. Such a finding seems to support Taillefer and Pugh's (1998, p. 98) claims tha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predictor variable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ality of learning' (i.e., L1 English to L2 Spanish vs. L1 Spanish to L2 English), and also on 'the nature and cognitive demands of the task itself'.

Yamashita's (2002, p. 81) own study with 241 Japanese EFL students, in which the compensa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reading ability and L2 linguistic knowledge in L2 reading comprehension was studied,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mutual compensation between the two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arriving at the highest comprehension in L2 reading. Yamashita (2002, p. 92)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a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L2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L1 reading proficiency or cognitive ability. The same idea is supported by Ulijn and Salager-Meyer (1998, pp. 82-83) who state that researchers now call for a 'balanced blend' of the threshold hypothesis and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 They assert that 'empirical research has largely resolved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L2 reading is a linguistic or a cognitive problem. It is neither one, but both of these' (p. 83).

In brief, the general consensus seems to be that while L1 reading ability affects L2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role of L2 linguistic knowledge seems to be much more significant at least for low-proficient L2 readers (Chun & Plass, 1997, p. 62; Taillefer & Pugh, 1998, p. 98; Ulijn & Salager-Meyer, 1998, p. 82; Alderson, 2000, p. 23; Yamashita, 2002, p. 92). A somewhat different finding has been reported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and L2 *writing* by Schoonen, van Gelderan, de Glopper, Hulstijn, Simis, Snellings and Stevenson (2003, p. 166), in which L2 writing proficiency correlated highly with L1 writing proficiency, which was more than its correlation with L2 linguistic knowledge.

Conclusion

To reiterate, four broad variables were discussed as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cess and the product of the act of reading: the reader, the text, the context, and the writer, each with some other inter-related elements. It was also made clear that none of these variables or their elements act separately; rather, the resulting outcome, be it comprehension or miscomprehens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all the variables on the one hand, and all the factors within each variable on the other hand. To arrive at comprehension, therefore, all variables and elements inside them have a share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contribution. In the case of L2 learning,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variables, another variable enters the scene, i.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1 and L2 on the one hand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and the degree of L2 readers' literacy in L1 on the other. The success of the communicative activity in question here owes much to a proper interplay of all the factors discussed above. The implications for both reading/literacy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are far-reaching: they need to regard their students' or subjects' reading process not as a simple activity but a complex multi-facetted process, and when analyzing their comprehension failure or success,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should not neglect the potential interactive role of so many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Materials needed: paper and something to write with.

I find it hard to just test my students over and over, so from time to time it is good to play a game and see just how much TOEIC vocabulary my students have acquired. The first thing I do is break the class down into small teams. Two to four students in a group seems to work well.

They are each armed with pencils and pieces of paper.

Objective: To write down more words in a category than the other team.

Time for each round: two minutes. At time all pens and pencils are to be put down! My students feel that not only is it perfectly all right to cheat but it is their obligation to try.



They seem to think that this behavior will keep me on my toes or consider that preventing their cheating is an all round IQ test for professors.

Game Rules: Teams are to write down, in the allotted time, all the words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category such as: "All things found at the airport."

After time has run out, each team has a chance to present one of their words to the group, then it is the next team's turn and so on until no one has any words left.

A point is awarded if the other teams did not also write down the proposed word. If another team has written down the same word no points are awarded. This does not include synonyms, for example if one team wrote steps and another stairs then both teams would get points.

Also, I don't generally penalize teams for writing: chair, armchair, desk chair, lawn chair since it shows and demands increased vocabulary.

The word has to be in the chosen category.

Usually there are some very convoluted arguments in defense of their "words" which in themselves indicate a growing mastery of the language.

The whole class votes on if the word is or is not in that particular category. I may elect to step in if it gets too dicey.

An optional rule but one that is very useful is to ban words that were used in an earlier round. Traditionally, the game is over after three rounds with the teams totalling all their points from the three previous rounds to determine a winner.

(Unless, of course the students protest too much or I've got an extra ten minutes to kill.)

Hints to students: If you can't think of a word in English whisper to your partners "how do you say _____ in English."

- The categories are chosen to reflect different settings and situations found in the TOEIC
Some sample rounds:

Please list things found 1. in or on the ocean or the sea 2. at a factory 3. in the city	Please list words that you think are associated with 1. Business in general 2. Human Resources or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3. Technical areas
Please list words that you think are associated with 1. business purchasing or personal shopping 2. travel 3. Entertainment or the media	Please list things found: 1. at the airport 2. in a hotel 3. in the office
Please list things found: 1. in a hospital 2. at a restaurant 3. at a famous resort area	Please list words that you think are associated with 1. Real estate 2. The weather 3. Banking and finance





SIFT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本期要目
法 学 动 态	➤ 新法解读
	✧ 修改刑法打击贿赂犯罪的五项建议 ✧ 新刑法典施行十年来立法分析
	➤ 法治论坛
	✧ 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反倾销的滥用及其贸易保护主义效应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 法学教育
2007 年 10 月	✧ 法科研究生的学习研究方法和为人生活态度
第 6 期 [总第十五期]	

新法解读

修改刑法打击贿赂犯罪的五项建议

——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

刘为波 周 斌

2007 年 10 月 1 日，新刑法颁布实施 10 周年；10 月 27 日，将迎来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 周年。关于如何修改刑法，以更好地与公约衔接、打击贿赂犯罪的讨论，由来已久。

其中，以“贿赂的范围”、“影响力交易罪的成立”、“定罪量刑的数额”等问题，学界争论最为激烈。是照搬公约、移植国外经验？还是依据现实，中国特色？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从实务部门的角度，就贿赂犯罪相关立法调整问题作探讨和思考，并提出初步立法修改建议。

1. 当前理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将贿赂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但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社情和民情等因素，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更为妥当

记者：我国刑法对贿赂限于财物，其范围小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关规定，且与公约不符；目前有一些专家也提出，应将贿赂从财物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您如何认为？

熊选国：将贿赂规定为财物，源于 1988 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贿赂扩大到“财物或者其他手段”，但是 1997 年修订刑法未对贿赂范围作出相应调整，因而就立法而言，贿赂仍仅限于财物。

从司法层面看，在原则上坚持贿赂为财物的同时，当前对于贿赂范围的理解和掌握上有一定程度的突破，部分可以直接物化的财产性利益如免费旅游、无偿劳务、债务免除、消费权证等有时也会视具体情况被认定为贿赂。至于非财产性利益如招工提干、调换工作、迁移户口、晋升职务等则一般不被视为贿赂。

按照公约规定，贿赂可以是任何不正当好处，其字面涵义明显要宽于刑法规定中的财物。据此，当前理论界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应将贿赂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凡是能够满足受贿人需要或欲望的有形或者无形利益均可以成为贿赂。主要理由是：第一，将贿赂范围限定为财物，放纵了大量实质上的受贿犯罪。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贿赂犯罪的手段也呈现出不断翻新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用设立债权、无偿劳务、免费旅游等财物以外的物质利益以及晋职招工、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非物质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频繁发生。这种利益虽然难以计价，但同样可以使受贿人获得以钱财买不到或难以买到的实际利益，同样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思想腐蚀性。第





二,从贿赂犯罪的本质看,其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受贿行为的对象无论是财物、财产性利益,还是非财产性利益,侵犯的客体始终是一样的。第三,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对此,我持不同看法。将贿赂限定为财物,的确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打击各类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因而有必要扩大其范围。但是,是否应当将贿赂扩大至任何“不正当好处”,却不无商榷之处:首先,国际公约的国内法转化,需要综合考虑一个国家的国情、社情和民情等因素。注重人情世故和礼尚往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直在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种背景下,将非财产性利益一并作为贿赂处理,非但无助于贿赂犯罪与不正之风之间界限的应有区分,而且其现实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失去本土文化的支撑,再严密的法网也将是一纸空文。其次,将贿赂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将使行、受贿双方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无从体现。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相互利用权力进行非财产性利益的交易中,究竟谁受贿、谁行贿势必无法区分。再次,将贿赂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还将因为无法计量而面临一个具体司法操作问题。

我认为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更为妥当。与公约的衔接,不仅要注重形式上的契合,更要强调实质精神的一致。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既有利于区分刑事犯罪与一般不正之风之间的界限,确保当前反腐败体系、架构、机制的基本稳定,突出刑事打击重点,又有利于确保贿赂范围的立法修改最终能够在司法中落到实处。这样修改,尽管形式上,范围是比公约要求窄了些,但是可以较好地避免司法上的一系列问题,实际效果反而可能要好于直接规定非财产性利益或者不正当好处。

2. 刑法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公约中“以作为其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两者本质是相同的,不应当取消前者

记者:现行刑法中,受贿罪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这一规定是否缩小了对腐败的打击面,甚至会培养出一批拿人钱财却不为人“办事”的“流氓官员”?

熊选国:鉴于公约没有明确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理论界多数意见主张取消受贿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主要理由是:第一,受贿罪的本质是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只要公职人员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就已经构成收买职务行为的事实,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等均不需要在受贿罪的构成中考虑。第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易理解和掌握。“为他人谋取利益”无论作为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都会放纵部分受贿犯罪。如果将其作为客观要件,则行为人为他人收受了贿赂尚未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正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尚未成功,就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将其作为主观要件,则行为人为他人收受了贿赂但根本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又被排除在刑法的否定性评价之外。第三,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定罪要件的缺陷,正在成为权力寻租的突破口。有些人对握有实权的公职人员刻意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长线投资策略,常常把过节、祝寿、婚丧嫁娶、探视病情等作为正常的礼尚往来机会,不惜将重金分期投入,但在行贿时又并无明确的请托事项,其目的在于建立感情,为将来请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公职人员收受贿赂后既不立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也不作出将来要为其谋取利益的明确承诺,但双方都心知肚明,只要时机成熟时即可兑现,依照现行规定对此也难以惩罚。第四,这种立法给人们传递的信息并不是刑法要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即受贿行为本身,而只是禁止收受了贿赂以后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这就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一批拿人钱财不办事的“流氓官员”。因为,拿了别人的钱财,为别人办了事,就构成犯罪;不为别人办事,则不构成犯罪。

这些意见和理由,虽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仍存在偏颇之处。首先,公约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在字面上确实没有出现“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措辞,但是明确规定了“以作为其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两者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利用职务便利或者执行公务的具体体现,所以,关于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保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在逻辑上便难以成立。其次,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司法实践中查证、认定权钱交易关系存在的重要环节。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外化事实来反映。至于“培养感情,为将来请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创造条件”的问





题,本身即具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受贿与正常人情往来两种可能性,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进一步佐证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对于区分罪与非罪的必要性。再次,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可能导致的放纵罪犯问题,司法实践中已经不复存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不论有无实际的谋取利益行为,所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有无为他人谋利的真实意思,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所送财物是希望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予以收受的,就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受贿。

我认为,保留“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不仅有利于突出受贿罪的权钱交易特征,更好地区分现阶段受贿犯罪与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的界限,也与公约规定的“以作为其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实质一致。同时,为从立法上根本解决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问题,建议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中增设一款规定,“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财产性利益的,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以此惩治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承诺为请托人谋利益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收受财物后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受贿犯罪。

3. “影响力”包括公职人员的影响力和非公职人员影响力。我国刑法对公职人员影响力交易犯罪已有严谨的规定,对于非公职人员影响力交易犯罪,刑法有必要作专门规定

记者:郑筱萸、吴振汉、李嘉廷等人的落马有一个共性:亲属通过特殊身份的影响力收受财物,对此我国刑法如何规定?公约中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犯罪,结合我国刑法,如何理解?

熊选国:从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犯罪与刑法相关规定比较看,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力交易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关系;二是影响力交易犯罪主体的国内立法转化。

首先有必要澄清影响力交易罪中“影响力”的理解问题。对此,理论界一般认为,“影响力”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公职人员的影响力,即公职人员因一定的职务关系所具有的影响能力,如上级对下级的影响力、某一职能部门的公职人员对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另一职能部门公职人员的横向影响力;另一类是其他人员的影响力,即公职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因其与公职人员具有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老同事关系而具有的影响力。该理解紧密结合公约第十八条规定,并充分注意到了“影响力”与公约关于贿赂犯罪中所规定的“公务”之间的区分,因而是一种较为全面而中肯的理解。

基于此理解,结合《纪要》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认定意见,并考虑到刑法规定的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与公约规定仅限于“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基本一致,公约第十八条第二款就公职人员影响力交易部分,已完全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三百八十八条规定所涵括。而且,考虑到刑法三百八十五条和三百八十八条关于谋利条件规定上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影响力交易定罪问题上刑法规定得更为宽松。所以,就此部分而言,无需对现行刑法规定再从内容上进行调整。至于文字上,较之于“影响力”,第三百八十八条关于“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显得更为具体、明确,因而也无需修改。

对于非公职人员影响力交易部分,刑法中没有直接的对应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非公职人员影响力交易而接受不正当好处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得以认定,可以根据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按照受贿或行贿的共犯,或依介绍贿赂进行处理。我们认为,刑法有必要对此专门予以规定。首先,从查处的案件情况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需要看,领导干部“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已经查处的李嘉廷、刘方仁、石兆彬、慕绥新、麦崇楷、田凤歧、吴振汉、郑筱萸等人收受贿赂都有其配偶、儿子、儿媳以至情人参与实施的情形。这些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通过为他人走后门、批条子、揽项目、提官职等等,从中大肆收受钱财,败露以后往往还转移赃款,隐瞒真相,为腐败分子推卸责任。一些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甚至情人往往成为权钱交易的中介,对腐败犯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受贿犯罪共犯的认定,因其行为的隐蔽性、收受与谋利的复合性,在实践认定中更具难度。所以,





尽管公约在影响力交易刑罚化问题上采用的是弹性条款规定,但是,实现其国内立法转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至于非公职人员影响力交易犯罪的法律文本表述,可以考虑直接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的第二款规定,而无需新设一条。即建议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财产性利益的,以受贿论处。前款规定以外的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从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财产性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4. 根据实际需要,刑法应增设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但暂不规定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合作的日益加深,贿赂的当事人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国外公职人员,相比公约,我国刑法中没有任何相关规定,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熊选国:公约规定了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和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两个犯罪。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对合犯的行贿罪的指向对象也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该两个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当前理论上的多数意见是全盘移植公约规定,我认为有必要区分行、受贿两种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增设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首先,公约要求各缔约国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规定为犯罪,属于强制性条款。其次,从维护我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形象、申明中国政府同国际贿赂犯罪作斗争的严明立场和坚定、顺利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我国有必要根据国际刑法的发展,把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行为刑罚化。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急速发展和我国在国际商业舞台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规定商业领域的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犯罪,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整体商业声誉,规范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国际商业活动中的行为。

第二,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暂不作规定。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固然可以立法上解决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在中国境内收受贿赂行为的定罪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却困难重重,其中涉及到管辖权尤其是有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等复杂的法律问题,同时,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属于弹性条款。

我建议,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财产性利益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单位犯前款罪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5. 刑法对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作了独一无二的数额规定,其弊端正日益凸显,实践证明并不科学,应当取消

记者:刑法主要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公约中并没有类似规定;现实中,受贿同样的数额,其社会危害性可能迥然不同,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熊选国:刑法对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与贪污罪同)作了独一无二的数额规定,其初衷在于力求立法的严密性与确定性,防止司法擅断,但是这一特殊立法例并没有能够准确反映受贿罪的性质,其弊端正日益凸显,实践证明并不科学。

第一,受贿罪主要是渎职犯罪而非财产犯罪,以受贿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础并不妥当。视受贿为渎职犯罪,是多数国家刑事立法的通例,在德国、日本等国刑法典中,受贿罪莫不是归入渎职罪或者妨害公





共管理罪中,因为其妨碍的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廉洁制度及其在公众中的威望和声誉。主要以数额为基本依据对受贿行为定罪量刑,与渎职罪这一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危害性不相一致。

第二,计赃论罚容易导致量刑失衡。实践中,一些案件的数额虽然相差不大,但由于其他犯罪情节轻重不同,导致其社会危害性差别很大。由于现行刑法主要以受贿数额确定定罪量刑幅度,容易造成数额相同但其他犯罪情节不同导致社会危害性差别较大的犯罪,只能在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刑,不能做到不同案件不同处理。同时,一些案件受贿数额虽然不同,但因情节不同社会危害性相当的犯罪,不能在一个量刑幅度内量刑,导致类似案件不能得到类似处理。此外,受贿一、二十万元的案件和受贿一、二百万元甚至更多的案件,在量刑上不能得到有效反映,通常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忽视其他情节之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意义,容易出现打击不力问题。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按照贪污罪法定刑处罚的规定,虽然体现了党和国家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并重的立法精神,但从实际情况看,贪污罪与受贿罪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形式有较大差别: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是通过数额大小体现的,而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除了受贿数额大小以外,更多地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情况或者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情节表现出来,在有些案件中,其他情节的危害性甚至比受贿数额的危害性更大。从前些年判处的綦江垮桥案主犯林世元受贿案,到最近新判的郑筱萸受贿案,就很好地说明了该问题。前者受贿11万元,后者受贿600多万元,两案犯均被判处死刑,主要原因即在于其造成的重大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第四,规定具体犯罪数额,不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刑法修订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样的数额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存在差别,而现行刑法的数额规定难以反映这种差别。加之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不同地域的司法机关在同一时期所处理的案件很难做到相互平衡,也很难体现刑法平等原则,这严重妨碍到了刑事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一些地区甚至在立法规定之外,另行制定受贿罪的追诉标准。

因此,我主张取消受贿罪(包括贪污罪)中的数额规定,一方面,在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问题上,确立受贿数额与其他情节并重的观念;另一方面,由“两高”通过司法解释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作出规定,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

具体修改为:“受贿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受贿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受贿数额较小或者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来源:法制日报 2007年10月14日第五版

http://www.legaldaily.com.cn/bm/2007-10/14/content_717318.htm

新刑法典施行十年来立法分析

李希慧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崇文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编者按 新刑法典自1997年颁布、实施至今已有十年。在此期间,我国立法机关相继制定了一部单行刑法和六部刑法修正案。这一阶段的刑法立法有什么特点呢?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是否适应?我们特约请中国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李希慧教授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此进行点评,以期在回顾历史之时,更好地促进中国刑法立法发展和完善。





我国立法机关1997年对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后相继颁布的20余个单行刑法进行了全面地修订、整合,从而形成了于该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人们称之为新刑法典。在新刑法典施行后,我国的立法机关又先后制定了一部单行刑法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六部刑法修正案。

新刑法典施行后刑法立法具有以下特点:

★将刑法未规定为犯罪但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增设为犯罪

《决定》及修正案将一些新刑法典没有规定为犯罪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增设为犯罪。具体是:《决定》增设了骗购外汇罪;《刑法修正案》第一条增设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修正案(三)》第四条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第八条增设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法修正案(四)》第四条增设了走私废物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条增设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第三条增设了过失损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刑法修正案(六)》第三条增设了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第四条增设了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第六条增设了虚假破产罪,第九条增设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十条增设了骗取贷款、金融信用证罪,十二条增设了背信运用受托资产罪、违规运用资金罪,第十七条增设了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第二十条增设了枉法仲裁罪。

★扩大某些罪名已有犯罪范围

即通过修改犯罪主体、行为方式、行为对象或者降低构罪标准或者同时修改几个方面的内容将原有犯罪范围予以扩大。

通过修改犯罪主体扩大已有犯罪范围的有:《刑法修正案》第二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规定的犯罪的主体“国有公司、企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条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原规定列举的犯罪主体

删除,使犯罪主体由特殊主体变为一般主体;第二条删除了《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列举的主体,扩大了该条犯罪主体范围;第七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

通过修改行为方式扩大已有犯罪范围的有:《刑法修正案(三)》第五条将《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条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第一种行为方式“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基础上增加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内容。

通过修改行为对象扩大已有犯罪范围的有:《刑法修正案》第三条将《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对象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修改为“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并将《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对象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修改为“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第五条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规定的行为对象“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修改为“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并将该条第二款(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规定的“买卖证券”修改为“买卖证券、期货合约”;《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非法占用耕地罪)规定的行为对象“耕地”修改为“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刑法修正案》第七条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在《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三类犯罪的基础上增加了恐怖活动犯罪。《刑法修正案(六)》第十六条则进一步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上述四类扩大为七类,即在前述四类犯罪的基础上增加了“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三类;第八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公司、企





业人员行贿犯罪的对象“公司、企业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

通过降低构罪标准扩大犯罪范围的有：《刑法修正案（四）》第一条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构罪标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修改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从而使该罪由实害犯变为危险犯；《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一条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原规定的“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修改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从而减少了犯罪构成要素；第十五条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构成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的标准由“造成损失较大”修改为“情节严重”。

通过修改两个以上方面的内容扩大已有犯罪范围的有：《刑法修正案》第四条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由原来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修改为证券交易、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从而扩大了其主体范围；同时，将作为该罪对象的内幕信息由原来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扩大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和期货交易内幕信息。《刑法修正案（三）》第五条将《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原规定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修改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有毒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既扩大了犯罪的行为方式，也扩大了行为的对象。该修正案第六条将《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基础上增加了“盗窃、抢夺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内容；并在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民兵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抢劫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内容。第六条将《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修改为“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从行为方法和行为对象两个方面扩大了犯罪的范围。第七条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款“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修

改为“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扩大了犯罪地点的范围，增加了犯罪方法。第十九条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从而扩大了行为对象和行为方法的范围。《决定》第三条将逃汇罪的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并将作为构罪标准的“情节严重”修改为“数额较大”。

由上所述，新刑法典施行以来，原有犯罪的范围扩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加重某些犯罪法定刑

《刑法修正案（三）》第三条将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罪的法定最高刑从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条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最高刑由七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第十一条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最高刑从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第十八条将《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开设赌场）的法定刑由原来的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第十九条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赃物的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由原来的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有期徒刑。

★刑法立法与我国社会现实和立法现状相适应

新刑法典施行后我国刑法立法的内容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三个特点，是由我国的社会现实和立法现状所决定的。

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政治不断变革、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变革、发展迅速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会随之出现，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使社会进一步发展，就有必要对一些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例如，随着信用卡被广泛使用，妨害信用卡管理，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时有发生，从而就有必要将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又如，在日益重视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安全意识越来越淡薄，因而安全事故不断发生，不报、谎报安全事故





的行为也随之出现,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理所应当。

对一些已有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有的是因为立法者在当时立法时考虑得不够周全,将应该规定为犯罪的情况没有纳入犯罪之中,例如,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修改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就是因为立法机关在制定新刑法典时忽略了公司、企业之外的其他单位从事管理但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也会实施受贿行为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

对一些犯罪的法定刑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刑法立法具有重刑化的趋势,而是因为立法者原来对这些犯罪所确定的法定刑没有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立法者当时没有正确地估价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能达到的严重程度,导致法定最高刑过低,对其调整势在必行。

新刑法典施行以来的我国刑法立法的形式走向刑法修正案单一化,即无论增设新的

犯罪,修改、补充已有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是提高已有犯罪的法定刑,都朝统一于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发展。10年来只有一部在新刑法典施行后不久颁布的单行刑法,其后均采用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之所以我国刑法修改统一于刑法修正案,是由刑法修正案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决定的。由于刑法修正案是对原有刑法条文内容的修改,因而,修改的内容直接列入原有条文之中,具有不破坏原刑法条文整体性的优点,便于查阅。而采用诸如“决定”、“补充规定”之类的单行刑法对刑法典进行修改、补充,会导致刑法立法文件多样化,破坏刑法的整体性,查阅起来也不方便。

总之,新刑法典施行后中国刑法立法的内容和形式的走向是正确的,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笔者相信,中国刑法立法将根基于中国的实际,在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来源:检察日报 2007年10月6日 <http://www.jcrb.com/n1/jcrb1444/ca644270.htm>

法治论坛

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蔡奕 副研究员、法学博士、西方证券法博士后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法学研究员

一、我国股改后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相关规定

规范我国股改后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规范可分为三个层次:行政规章、自律规则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一) 证监会行政规章

2005年9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股改后非流通股的转让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这一原则可概括为“锁一爬二”。所谓“锁一”,指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所谓“爬二”,指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即所谓“大非”),在1年锁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得超过5%,在24个月内不得超过10%。

(二) 交易所自律规则

2005年9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对非流通股流通的程序性问题作了规定。公司董事会在股改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应当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非流通股份可上市交易手续,提交相关法律文件;在获得证券交易所关于同意办理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相关股份变动手续的





通知之后,由公司董事会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股份变更登记、资金结算等事项;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股份变更登记完成后两个交易日内,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后股份结构变动报告书和有关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限售期满,由公司董事会提交相关股份解除限售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复核后,可以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解除限售手续。

2006年5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中小板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细则》对中小板限售股份的流通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其具体内容包括:

1、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应当在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提示性公告,披露包括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时间和数量、限售股份持有人股改承诺及履行情况、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及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2、“大非”爬行减持的披露义务。持有、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减持非流通股每累计达到该公司股份总额1%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出售股份的数量、平均价格、出售前后持股变动情况等。

3、大比例持股变动的暂停和披露程序。当持股变动超过或预计超过公司股份5%,或者出售后持有、控制公司股份低于5%时,限售股份持有人应当停止买卖公司股份,直至作出公告后的两个交易日后。

4、不得出售限售股份的情形。在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15日内,上市公司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或上市公司发布对公司股票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告前5日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出售限售股份。

5、控股情形变化的披露义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售限售股份导致持有、控制公司股份低于50%,或导致持有、控制公司股份低于30%,或导致其与第二大股东持有、控制的比例差额少于5%时,应当及时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和本所报告,并对进一步出售或增持股份计划作出说明并予以公告。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应当就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别发表意见并予以公告。在发布公告前,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当停止出售股份。

(三)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与非流通股上市有关的股改承诺有三类:预设最低持股比例、延长股份禁售期、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最低减持价)。

1、预设最低持股比例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改结束后任何情况下均保有某个最低的持股比例。最低持股比例可能在两种情况下作出:一是有关部门强制性要求非流通股股东保有某个最低持股比例,股改中常见的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保持最低持股比例;二是非流通股股东自愿承诺持有最低比例的股票。

2、延长股份禁售期

股改法定的禁售期是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12个月。由于非流通股股份数量较大,从稳定股价的角度来说,适当延长禁售期的时间,有助于控制市场上股票的供应量,增强投资者预期,稳定市价。因此,许多非流通股股东在法定承诺之外,作出了特别承诺,在法定禁售期之外延长了禁售非流通股的期间。

3、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最低减持价)

限定减持价格也是稳定股价承诺的一种,如果非流通股转流通后完全按市价减持,会对股票的供求产生剧烈影响,进而造成股价波动,因此设定适当的减持价格,对约束非流通股股东的减持套现欲望,维护稳定的股票价格具有一定的意义。

按减持价确定标准分类,最低减持价承诺可以分为固定价格减持与浮动价格减持,前者是以某个确定





的价格作为最低减持价,后者是以某个计算参数(净资产、收盘价等)为依据设定的某个不确定的价格。按减持价标准是否唯一,可以分为唯一标准的减持价与选择标准的减持价

二、非流通股上市流通规定的国际比较

比较我国与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关于非流通股上市的规定,可以发现境内外的规定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 非流通股的性质与流通背景不同

境外的非流通股多指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高管等持有的,受法律和上市规则的限制,不能自由流通的股份。法律限制该类股份流通的目的在于维系持股人和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避免内幕交易,减轻流通压力,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

我国的非流通股有特殊的背景,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出于维护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考虑,人为地将占总股本约2/3的国有股设定为“暂不流通”的股份。我国的非流通股不是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而是源自政策和契约的实际安排,限制该类股份流通的目的也并非出自经济目的,而是一种政治和政策考量。

(二) 非流通股的流通依据不同

境外的非流通股流通多以交易所上市规则为依据,辅之以证券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形成“以契约为主,法律为辅”的流通依据。

我国的非流通股流通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后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而实现的,其流通的主要依据是证监会的行政规章,并辅之以交易所根据规章精神制定的业务规则,此外还有非流通股股东的自我承诺为补充,形成一种“以法规为主,契约和承诺为辅”的流通依据。

(三) 非流通股的流通层次不同

海外非流通股的流通规则一般根据市场层次的不同而有区别,例如香港的主板和创业板、英国的主板和AIM市场、美国的交易所和私募发行转让市场、韩国的主板和科斯达克,都有着不同的非流通股流通规则。这反映了成熟的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内在需求。

我国的非流通股流通规则由于是自上而下统一制定的,市场层次本身也比较单一,因此流通规则基本是趋同的,除了中小板在限售股份流通上作的一些局部制度修改外,没有大的本质区别。

(四) 非流通股流通规定的灵活性不同

由于海外非流通股流通的规定“以契约为主,法律为辅”,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往往由持股人自行设定一个较为灵活的期间,如美国通常根据股权结构状况对大股东的持股锁定三个月到二年,或者根据公司或交易的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锁定期,如新加坡。

我国非流通股“锁一爬二”的规定较为刚性,虽然有股改承诺作为补充,但仍显得灵活性不足。对于不同的上市公司、不同的股份流通需求基本适用同一的流通标准和要求,也缺乏对于特殊流通情况(如苏宁电器小股东巨额减持)的特殊处理规定。

三、借鉴海外经验,完善我国非流通股上市流通规则

我国目前的非流通股流通规则有三大特点:一是规定趋于刚性,只能在“锁一爬二”的法定要求下补充新的流通规则;二是规定过于原则性,在主板领域,除了“锁一爬二”的法条规定外,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三是缺乏个案的灵活处理机制,对那些对于市场造成重大影响而现行规则不能规范的事件,没有叫停的权利和处置的手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海内外非流通股流通规定无论是背景、性质、内容还是具体制度都存在差异,但我们仍可以遴选出一些可借鉴的有益经验:





（一）增强我国非流通股上市流通规则的灵活性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意义，我国在设定股改后流通规则时采用了“以法规为主，契约和承诺为辅”的刚性做法。刚性规定对于果断推进股改，迅速树立市场信心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非流通股解禁期的临近，也暴露出灵活性不足，不能满足非流通股特殊的流通需求，不能有效抑制非流通股集中流通压力的问题。

我们认为，随着股改的基本成功和限售股流通高峰的到来，单纯以刚性规定抑制流通股流通需求的做法并不明智，在刚性规定的基础上，应强化相关非流通股上市流通规则的灵活性。借鉴境外的经验，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强化非流通股上市流通规则的灵活性：

1、设定弹性锁定期。现行的一年锁定期较为僵化，可更改为“六个月至两年”的弹性锁定期间，由交易所审核掌握股东的股份流通申请。

2、根据上市公司和非流通股股东的不同情形，设定不同的流通规则。例如，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紊乱或非流通股股东违反股改承诺的情形，设定为较长的锁定期或较为严格的流通要求。

（二）细化既有的非流通股流通规则

境外非流通股上市的规定均较为详细，对持股主体、锁定期、流通前后的信息披露、流通具体要求等均有比较具体的规定，国内的相关规定则较为原则化。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国外的非流通股流通依据以交易所上市规则为主，可操作性较强，国内的非流通股流通依据以法规为主，有赖交易所规则的配套。

2006年5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中小板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细则》（以下简称《流通细则》）是对规则细化的一次有益尝试，半年多的实践表明，《流通细则》所规定的限售减持及其信息披露具体制度对于完善非流通股上市制度框架、加强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监管具有重要的作用。今后可以考虑将中小板限售股份流通的有益经验推广到主板中，细化和完善主板非流通股上市流通规则，增强基本法规的可操作性。

（三）预留“安全阀”，防范个案风险

在境外实践中，一些交易所上市规则有类似的“安全阀”的规定，意在防范股价波动风险，防止投机套利行为，维持公众投资者信心。例如香港主板《证券上市规则》第14章、香港创业板《上市规则》第19章规定，若出售其股份若属于《上市规则》规定的交易类别，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取得股东同意，通知香港交易所或取得其批准，并发布公告予以披露；美国证监会规则144e规定，持有人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股份总数的1%和每周的平均交易量。

“安全阀”的特点在于：（1）用于监管和控制现有规则无法约束的个案风险；（2）除了传统的减持股份比例限制外，还增加了减持交易量限制；（3）并不普遍适用，而是个案适用；（4）交易所确信股份流通行为有投机套利且危害股市稳定的不正当动机或不公平后果；（5）该措施由交易所审慎适用。

目前我国的非流通股流通规则没有类似“安全阀”的机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和股本结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股份流通环节，可能出现在法定减持比例之内却数额巨大的减持行为，例如苏宁电器第四大股东赵蓓在锁定期满后短期内减持股份2373.23万股，累计套现5.99亿元。

监管者处在稳定股市与维护资本自由流动性的矛盾之中，对于这种减持行为的合理性和应规制与否并无定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限售流通股解禁，非流通股股东尤其是“小非”抛售套现的冲动将会增强，在特定时机（如股市走低）特定情形（如减持额巨大）下可能会对股市的稳定性和投资者信心造成冲击。因此，从稳定股市，维护市场信心，未雨绸缪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在相关交易规则中预留“安全阀”，设定“备而不用”的预警或限制交易指标，并由交易所审慎适用。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





反倾销的滥用及其贸易保护主义效应

蒋德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反倾销措施本来是对倾销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补救措施。然而,近年反倾销的案件大增,某些国家滥用反倾销措施,以反倾销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对于反倾销的滥用已成为一种隐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事实。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积极的行动,同滥用反倾销的行为进行斗争,以使我国的出口贸易免受这种不正当反倾销的影响。

一、滥用反倾销已成为某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

(一) 对于滥用反倾销保护主义性质的认识的发展与深入

正如当年西方国家对于反倾销问题的积极作用的认知有一个过程一样,对于反倾销的滥用成为一种非关税壁垒的形式的认识也有一个不短的过程。许多年来,由于人们根深蒂固的对于倾销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性的认识,人们总是从反倾销的正义性来看待各种反倾销的行动,而对反倾销背后的动机的探究则总是显得不足。久而久之,就导致了某些国家的企业或政府出于不正当的动机而滥用反倾销措施。当出口国起而抗争时,那些滥用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则总是援引其国内法规作为挡箭牌。时至今日,我国学者在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的有关著述中,虽然还很少有人将反倾销的滥用也列为一种非关税壁垒措施并加以详细的分析,但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反倾销措施影响的两重性。在滥用反倾销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形式的认识或研究方面,倒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学者认识得较早,研究得也比较深入一些。

2005年9月5日至7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下属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与商品和服务贸易及初级商品委员会在日内瓦联合召开了“非关税壁垒的处理方法、分类、量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此次会议是关于非关税壁垒问题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与会的各国专家对非关税壁垒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有的人还针

对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建议。在此次会议的报告的“结论”部分还特别提到:“针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日益增加的问题,与会者强调应当在贸发会议的‘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TRAINS)数据库中纳入更多的资料。TRAINS数据库尤其应当能够纳入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准确信息,从而提升分析手段的能力。”

在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准入谈判组拟定的“世界贸易组织非关税壁垒措施的最新清单”中,也将“反倾销税”列为“海关和行政清关程序”部分的非关税壁垒措施的首项。

最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出版的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著作中注意到了欧共体和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重叠”反倾销案件:“第一,是‘重叠’案件数较多:为58起,分别占美国和欧共体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投诉案件的75%和68%。这些反倾销投诉案件通常都是在1年之内欧共体和美国相互独立地提出来的,当然,这些案件提出之后的发展结局是有所不同的。除3个案例外。其余的所有的反倾销指控案件结果都导致了某种形式的反倾销措施的实施。‘重叠’案件的比例如此高。其结果如此相似。表明反倾销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反倾销的投诉者在成功地使用这一战略手段来分割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市场。”该书还指出: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国与反倾销措施目标国之间的严重的不对称。“前10位反倾销措施使用大国实施的反倾销案例数占世界贸易组织备案的反倾销案例总数的90%;它们代表了世界GDP的70%和世界贸易额的50%。”然而,“前10位反倾销措施使用大国所遭受到的已生效的反倾销案例数不到总数的1/3,而且,2001年到2002年期间。这个差距还在急剧扩大。总之,目前反倾销措施只是少数几个大国对付世界其它经济规模较小国家的工具……”。

总之,滥用反倾销已成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不争的事实。





(二) 利用反倾销措施推行保护主义的隐蔽性与歧视性

非关税壁垒措施区别于关税壁垒措施的特点之一是其隐蔽性与歧视性。这一特点在滥用反倾销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实施都有其国内法律法规的依据,对于反倾销的不正当使用更是这样。关于这一点,反倾销诉讼的主要策源地之一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例如,美国在进行反倾销时曾依据的下列3项立法,要么早已不合时宜,要么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性。

1. 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1916年,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通过了作为《威尔逊关税法》一部分的反倾销条款。后称此部分法律条款为《1916年反倾销法》。该法将对违反者施以严厉的民事和刑事处罚:“任何人违反或与他人联合或共谋违反本节的规定,为犯有轻罪,定罪后应由法院酌情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和)1年以下的监禁。”而起诉人则“应获取相当于所受损失(损害和诉讼成本,包括合理的律师费)3倍的赔偿。”

2. 美国反倾销调查中的“归零法”。“归零法”,是某些国家在反倾销调查时估算涉案产品倾销幅度的一种方法。如美国商务部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将涉案产品分成若干不同的产品组。在计算倾销幅度时,首先比较每一组产品的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和加权平均正常价值。若有些产品组的正常价值高于出口价格,其差额即被认定为倾销幅度。但是,若发现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倾销幅度则被视为零。“归零法”即由此得名。这样的“归零法”,排除了负倾销幅度,从而人为提高了倾销幅度和倾销税率。因此,“归零法”的使用常常可以成为反倾销裁决胜败的关键。

3. 美国《2000年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该法案亦称《伯德修正案》。该法案修改了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七篇,即新增加了第754节“持续倾销和补贴的抵消”。该法案适用于所有根据1999年1月1日以后生效的命令或裁决,及2000年10月1日以后做出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征收。根据该法案,海关专员应将所有来自前一财政年度所征税款资金(包括利息)分配给受影响的生产商,只要生产商能证明它有资格并且期望得到这种分配。根据美国政府统计总署(GAO)的研究,

伯德修正案税款的2/3都支付给了钢铁、球轴承和蜡烛三个行业的5家大公司。这一法案的规定,既可以使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得到保护,又可以使它们得到额外的利益,这就极大地激发了某些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的积极性,导致了反倾销的滥用。被有的学者谑称为“反倾销大王”的美国钢铁企业提出的反倾销申请最多,与此项法案的偏袒性质有很大关系。

二、滥用反倾销的保护主义效应

(一) 滥用反倾销使反倾销企业得到更严格的保护而被反倾销企业受到严重损害。一项非正当的反倾销申请提出后,若最终通过不公平的法规而征收反倾销税。则会严重地影响该项被反倾销产品的出口,进而影响到该国的就业状况,甚至会影响到该国整个对外贸易或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频繁的、使用不当的反倾销行动。因为本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严重依赖一些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若这些产品被反了倾销,则无异于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而那些实施反倾销国家的产业,则受到了更加严格的保护。

(二) 滥用反倾销对出口国企业的阻吓作用。关于那些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件对出口企业造成的严重影响自不必多言,在许多情况下,仅仅提出反倾销的申诉立案就是一个胜利,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进口的活动;有时,甚至发出要进行反倾销的威胁也可以达到一定的阻吓效果。例如,在美国对钢铁反倾销立案后的数月中,美国市场热压钢板的进口数量就下降了65%以上,切割钢板下降了33%,冷压钢板下降了20%。到2000年时,美国的钢铁企业利用美国的贸易法已经将进口的钢铁产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降到了22%,但是,反倾销的申诉仍然会不断地冒出来。

(三) 滥用反倾销使进口国国内企业获得额外的利益。某些国家的反倾销法具有很强的偏袒性,这些法律的实施会给申诉方带来额外的利益。如当美国的钢铁企业注意到某一产品的进口有所增加时,可能就会提起反倾销的诉讼。在美国发起的全部反倾销案中,美国的钢铁企业实际上“输”掉了或者撤诉了至少一半的反倾销申诉。然而,从实际





的利益上看,它们并没有输。例如,在1993年,美国的钢铁企业对碳钢条的出口商发起反倾销诉讼,仅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前几个月中,美国市场上此类产品的价格就上升了大约25%。最后美国的企业输掉了官司或撤销了诉讼请求。不过,它们获得的额外的收益,可能是它们打官司的花费的50倍之多。

(四)滥用反倾销使进口国某些使用进口原材料的产业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从实际效果看,滥用反倾销伤害的不仅是出口国的企业,对进口国中以受反倾销影响的产品为投入品的企业也是一种伤害,因为它们不得不改而使用国内或进口的价格更高的原料品,从而使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的效益下降。而对实施反倾销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其总的福利会下降,因为他们不得不转而购买国内或其它国家的价格更高的消费品。

三、制约滥用反倾销行为的对策

(一)出口国家政府的积极斡旋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最后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税的案例并不很多。这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积极的斡旋是分不开的。在出现反倾销的威胁或已立案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同提出反倾销申诉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积极进行磋商和谈判,使很多反倾销的申诉最后撤诉。此外,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已经使50多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方面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因为我国的三大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对我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经济体一欧盟、美国和日本在此问题上仍然固守成见。

此外,还应当认识到,通过双边政府的斡旋达成的妥协,往往是以出口方承诺“自动出口限制”为代价。这对于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只能说是退而求其次,要取得更好的结果,往往需要求助于其他方面的措施,如向多边的争端解决机制投诉等。

(二)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在反倾销措施目标国与实施国的政府之间不能达成妥协时,有些世贸组织成员选择了使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DSM)。截至2006年7月,被

控诉到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的案件达60个,约占该组织受理的全部案件的18%。在60个反倾销争端案件中,美国控诉其他成员的案件有4个,占全部反倾销案件的6.7%;而美国为被诉方的有24件,占全部反倾销案件的40%。在这24个案件中,15个案件经过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全部程序。其余各案件要么由美国自行撤销了反倾销措施,要么是争端双方达成了妥协方案。在这15个已审结的案件中,只有4个案件美国被裁定没有违反世贸组织有关规则,另外的11个案件,美国则被判违反了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世界贸易组织网站,有关数字由作者统计得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美国3个反倾销法案的争端,这些法案全部被判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依据这些错误规则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也被要求停止或进行修正。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关于美国3项反倾销法案的裁决:

1. 关于《1916年反倾销法》的撤销。(1)欧盟诉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WT/DS136)。1998年6月9日,欧盟要求就《1916年反倾销法》同美国进行磋商。由于磋商未果,欧盟提出成立专家组的请求。印度、日本和墨西哥提出保留其作为第三方的权利。1999年4月1日,专家组成立。2000年3月31日专家组报告散发给各成员。专家组认为:由于未能提供《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6条所确定的排他性损害检验,《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违反了《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6条第1款的规定;由于规定了实行3倍的损失赔偿、罚款或监禁而不是实行征收反倾销税的方式,《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违反了《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6条第2款的规定;由于未规定《反倾销法》中所定立的一些程序上的要求,《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违反了《反倾销协议》第1条、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由于违反了《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6条第1款和第6条第2款的规定,因此,《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第4款的规定。2000年5月29日,美国提出上诉。上诉机构将此案的上诉连同“WT/DS162案”的上诉一道进行了审查。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做出的全部结论。2001年12月18日的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美国称它已于2001年7





月23日向国会提交法案,撤销《1916年反倾销法》,并终结依照该法案所采取的所有行动。(2)日本诉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WT/DS162)。1999年2月10日,日本要求同美国就《1916年美国反倾销法》进行磋商。磋商未取得成果。应日本的要求,1999年6月26日,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做出了与“WT/DS136案”相似的结论。2000年5月29日,美国对专家组援引的法律及其所作的法律解释的某些方面提出上诉。上诉机构将此项上诉及“WT/DS136案”的上诉一并进行了审查。2000年5月28日,上诉机构报告散发给各成员。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报告的所有发现及结论。2000年9月26日,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了上诉机构报告及经其支持的专家组报告。

2. 关于废除“伯德修正案”的斗争。多个成员诉美国:“伯德修正案”案(WT/DS217、WT/DS234)。2000年12月21日和2001年5月21日,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泰国。和加拿大与墨西哥分别向世贸组织提出控诉,要求与美国就“伯德修正案”进行磋商。阿根廷、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以色列、挪威作为第三方参加了申诉。上述各国指控美国该法案违反了《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有关规则,使这些国家在上述协议项下的利益受到侵害。由于磋商未果,世贸组织于2001年8月23日成立了专家组对两组成员分别提出的控诉进行统一的调查。2003年1月27日,争端解决机构裁定“伯德修正案”违反了世贸组织有关协议,应予撤销。因为美国没有按照世贸组织要求的时限撤销“伯德修正案”,加拿大、日本、欧盟和墨西哥等11个成员依照世贸组织的授权实施了大约1.14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2005年12月21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50票的结果,撤销了“伯德修正案”。

3. 关于美国反倾销中的“归零法”的裁决。

(1) 欧盟诉美国:反倾销中的“归零法”(WT/DS294)。2003年6月12日,欧盟与美国进行磋商。欧盟称,在美国发起的21起反倾销案中,若不是用“归零法”来计算倾销幅度的话,每一项的倾销幅度就会降低、忽略不计,或者是负值。欧盟认为,美国的这种计算倾销幅度的方法,违反了

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规定。随后,印度、韩国、日本、墨西哥等先后加入磋商。由于磋商未果,申诉方要求成立专家组。2004年10月27日专家组组成。2005年10月31日,专家组报告散发。专家组在其报告中全体一致支持欧盟的申诉,建议争端解决机构要求美国采取行动以使其反倾销的措施与世贸组织的规定相符。2006年1月30日,美国提出上诉。2006年4月18日,上诉机构报告散发。上诉机构支持了专家组的调查结果,认为与原始调查相关的“归零法”与《反倾销协议》第2条第4款第2项的规定不符。2006年5月9日,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了上诉机构的报告以及经上诉机构修订的专家组报告。由于自知理亏,美国商务部已于2006年3月6日发布公告,宣布将放弃“归零”做法,重新制定反倾销调查中对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

(2) 日本诉美国:反倾销中的“归零法”案(WT/DS322)。2004年11月24日,日本提出就美国反倾销中的“归零法”、《1930年关税法》等一系列反倾销做法与美国磋商。日本称美国的做法违反了《反倾销协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许多条款。同年12月,印度、挪威、阿根廷、中国台北、欧盟和墨西哥也要求加入磋商。由于磋商未果,日本提出成立专家组进行调查。2005年2月28日专家组成立。欧盟、中国香港、印度、韩国、墨西哥、中国、阿根廷、挪威、泰国和新西兰等,先后提出保留它们作为第三方的权利。2006年5月10日,专家组通知争端解决机构,由于涉案问题的复杂性,专家组在预定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其任务。并希望在2006年8月或9月初完成其工作。

(三) 诉诸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参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通常都建立了本组织内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双方通过双边的磋商不能解决争端时,求助于一体化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能是解决争端的最简单、快捷的办法。例如,美国与加拿大木材反倾销争端案,加拿大曾首先诉诸《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获得了有利的裁决。不过,由于美加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美国挟其经贸第一大国的地位,并没有认真地执行这一裁决。





（四）进口国国内的斗争

在某些国家的反倾销行动，最终获益的可能是某几个大垄断集团，而不少进口企业，特别是广大的消费者，则是反倾销行动的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应该同反倾销措施的目标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同这种滥用反倾销措施以谋取私利的行为作斗争。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甚至实施反倾销国家的政府也会同反倾销的目标国家政府一道，为废除某些不公正的反倾销立法而站在一起。

文章来源：《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3期

（五）对世贸组织反倾销规则的修订

目前的世贸组织反倾销规则存在许多缺陷，正是这些不完善的地方，被某些国家或地区利用，形成了对反倾销措施的滥用的局面。因此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制定更严格的反倾销规则，弥补有关的缺陷，是一项很艰巨的谈判任务。中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国，也是众多滥用反倾销案件的受害者。因此，中国理应担当起世贸组织反倾销规则改革中的主要角色。

法学教育

法科研究生的学习研究方法和为人生活态度

莫于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作者附言：作为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学年伊始我都会召集新生（包括本专业博士生、硕士生和法律硕士生）开一个见面会，进行入学思想教育和学习方法辅导。师生亲切交流，有助于增进了解信任，坚定成功信念，明确努力方向。本文是我最近一次入学教育谈话要点。

入门不易，祝贺大家，欢迎大家。有缘相聚，初次见面，彼此关照。

新的学习阶段和环境是新的起点和机遇，但号称法学教育重镇的人大法学院并不是各位成为法学栋梁之才的保险箱。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时间不长，但也不短，希望大家跑好这个长跑，努力达到更高的境界。学习收获主要反映在最后的学位论文质量上，也综合反映在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几点要求，与大家共勉：

1. 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健康的身体是“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所”。作为高起点的法科学子，要长期保持强大的学习力和竞争力，一定要把学习生活安排好，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特别是要保证营养、睡眠（希望各位务必养成吃早饭、吃鸡蛋的习惯，因为长年坚持去食堂吃早饭就自然能够避免睡懒觉，长年坚持吃鸡蛋就能保证最基本的营养，各位也就精力充沛、不易衰老），坚持锻炼身体，乐观对待人生，保持身心健康。

2. 恰当定位人生目标与职业方向。有一种比喻，说是人生大致有红、黄、黑三条路可走：到党政机关工作是走红道（戴红色的乌纱帽），从事商务工作和其他实业是走黄道（衡量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是财富拥有量，而黄金是财富的象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走黑道（因为硕士、博士毕业时要穿黑色的礼服、礼帽照相，以后可能成为法学家）。这三种道路，年轻学子都可选走，而且选走哪一道都可走得通（个别奇才甚至最终能将这三条路都走通了）。当然可作多种人生尝试，但俗话说“志当存高远”，“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人生目标和职业方向要尽早确定下来，不宜变来变去。老师也会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但立志、择业和行动还得靠自己。

3. 改进阅读方法，完善知识结构。如果知识面太窄，与他人交往缺少共同语言，工作中会遇到更多困难。故须扬长补短，学会缺项阅读和重点阅读。针对现在的法学教育现状，对于法科学生来说，在法学专业课程之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等等也很重要，哪方面有欠缺、较薄弱，就要尽快弥补上这一块“短水桶板”，才有利于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君不见法制工作





第一线的法律人不是经常都要审票据、看账本、算成本吗？没有财会知识怎么行？还要与学位论文选题和今后发展目标相结合，有计划地阅读，有利于学用结合。

4. 加强科研和写作能力训练。研究生要成为素质高、适应性强、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立研究能力的人才，即使仅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科研也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较强的科研写作能力会终生受益。读研期间要珍惜机会，配合教研室和导师组织的科研活动锻炼自己，有针对性地多练笔并积极投稿，通过科研、写作等训练使得动手能力不断上台阶，最后再上一步台阶就可较有把握地、高质量地完成学位论文。作业和写作可以结合，论文可从作业中提炼出来。现在许多学术期刊为青年学人开辟了专栏，为研究生发表原创性论文提供阵地，这是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的，因为一个人大致在35岁（理工科）或者40岁（文科）之前的学术思维和研究活动是最具有创造性和效率性的。

5. 多听学术讲座，利用学术资源。通常来说，学术讲座的信息量很大，就学习效率而言，听讲座可谓事半功倍；而且在讲座上提问能够得到锻炼和检验，因为即席提出高质量的问题非常不易，故应结合自身实际有计划地尽量参加（包括参加研究生组织的定期讨论会），还应多提问、多发言，抓住机会锻炼自己的判断、提问和表达能力。有些研究生不重视学术讲座，丧失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锻炼机会，十分可惜。高校里高人很多，**一位名宿就是一座大山**，要注意挖掘“大山宝藏”，有意识地主动利用好本校的师资条件。学习过程中常会遇到难题，可在学生之间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必要时主动找老师请教，常可收到“轻轻一下捅破窗户纸”的效果。

6. 高度重视、不断提高外语能力。精通一门外语，就多一个宽阔清晰的窗口看世界，能有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交流。外语和专业相结合会产生极大效用，有利于出重要人才、重大成果。国家为何重视海归人才？海归人才的实际教学科研能力未必都很强，但至少外语好就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外语学习贵在坚持和强化，希望研究生都能特别注重这个问题。尽管现在普遍存在“读完研究生，外语水平反而下降一多半”的现象，但愿此种现象不发生在各位身上。

7. 积极承担、认真做好公益事务。研究生的学习、研究任务很重，但也要适当参与学校、学院、年级、班级的社会工作，承担一些公益事务。这也是一种民主实践活动，且能增强组织协调工作能力。研究生要懂得并践行“吃亏是福”的道理，有机会为大家服务是一种缘分和福气，时间越长你们越能感觉到这一点。虽然时间就是生命、效率，但在时间问题上也不要一毛不拔。有的研究生虽然学习研究抓得并不紧，甚至经常早上睡到十点钟、下午睡到四点钟，却敢于在宿舍门口贴出一个告示说“拒绝询问”或者“谈话不得超过一分钟”，我觉得这样做实在不大好，似乎表明此人缺乏奉献和服务精神。

8. 坚持良善的为人、处事原则。要认认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择善而行，与人为善，保持良好人际关系和感恩之心，还要保持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和良好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办事作风、生活作风等等）。要有大智慧，不靠小聪明。法林中人的致富机会真的很多，要切忌贪利、暴富、侥幸心理，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今天踏越法律边界获利百万，明天成为阶下囚痛悔不及”的例子很多。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要加强沟通，互帮互助，和谐相处，共同进步。这似乎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那一套，但经由此道走出校门，可能有助于各位成家创业、健康成长，成为法学家或者其他什么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广义的学习具有丰富的内涵。我有一句申请了“发明专利”的座右铭，现在免费赠送给大家共勉：**学习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茶话一番，仅供参考。谢谢大家！期盼大家！

——此文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法学家茶座》第16辑

来源：中国宪政网 <http://www.calaw.cn/>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高教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7 年 10 月

第 6 期[总第十四期]

本期要目

- 教育部关于开展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的通知
- 教育部长周济：坚持教育公益性 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 外校生鸠占鹊巢 大学更应该大气

教育部关于开展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的通知

教发〔2007〕1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精神，进一步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07〕2132 号）。“节能减排学校行动”是“节能减排全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切实组织开展好“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的重要意义

节能减排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有 2.6 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搞好“节能减排学校行动”，不但直接的节约环保效益巨大，而且帮助青少年学生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养成珍惜能源、爱护环境的行为习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识“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的重要意义，积极行动起来，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做好节

能减排各项工作，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二、“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的主要内容

1. 全面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认真贯彻《教育部关于建设节约型学校的通知》（教发〔2006〕3 号）精神，强化师生员工的节能环保意识，从学校发展、建设及日常运行管理的全局出发，对节能、节水、环保工作进行统筹规划。要建立健全节能环保制度，做好学校发展和校园建设规划，加强基本建设、维修改造及日常工作、学习、生活运行过程中的节能环保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节能环保标准，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2. 加强节能环保知识教育。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充实丰富节能、环保教育内容，将节能、节水、节地、节粮、节材等教育内容，以灵活多样的形式，纳入学校课堂教学，真正落实节能环保进学校、进课堂。



3. 组织开展以节能减排为内容的学校主题教育活动和学生社会宣传活动。采取各种生动活泼、青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教育和宣传形式,引导学生树立节能环保的观念,关注生活中的节约方式,学习和寻找节能的窍门和方法,熟悉要求、宣传群众、教育自己。

4. 开展节能环保社会实践活动。开发和建设一批满足广大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学习节能环保社会实践活动需要的基地,方便学生开展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深化环保意识、掌握环保技能、养成环保习惯。组织学生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活动,开展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和科技竞赛。

5. 营造节能减排校园文化。编写适合中小学宣传节能环保教育的挂图和光盘,免费发放到中小学校。利用各种方式,在广大师生中开展节能、环保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6. 探索推广教科书的循环使用。结合农村义务教育试行免费教科书制度,开展教科书的循环使用试点工作,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狠抓落实,讲求实效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把“节能减排学校行动”与“节约型学校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统筹规划、严密组织实施、加强督促检查、及时总结推广经验,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节能减排学校行动”和“节约型学校建设”涉及面广,工作任务较重。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统筹规划、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应与各基层单位签订责任书、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并在人力、物力、经费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保证。

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于年底前完成对“节能减排学校行动”工作的统筹规划和部署,并将有关情况报送我部发展规划司。

教育部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四日

来源: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长周济:坚持教育公益性 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10月16日15:00,教育部部长周济和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在十七大新闻中心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科技教育发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回答澳门澳亚卫视记者有关教育产业化和高考三十年的相关问题时说,这次十七大报告当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我们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这三十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现在我们的规模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同时质量在世界上也是优秀的。我们高等教育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奠基工程,将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巨大的贡献。



**相关新闻:****要把立德做人作为教育的重要工作**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回答合众国际社记者提问时讲到,中国下一步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就是要使得学生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整个教育的最重要的工作。

周济说,德育包括方方面面,中国将主要在三个层面上推进工作:一是在课程教学当中,进一步加强德育课。二是我们要充分利用课外的活动,在课余时间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建立起学校、家长和社区共同的网络,来推进学生的德育以及素质教育。德育的内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当中也讲到了,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他还说,儒学等一些传统的好的方面,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教育里,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领风尚,也是德育教育中的很重要的部分。当然给孩子们进行德育教育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讲法,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实际,使他们真心实意地能理解、能学习、能提高。

从三方面入手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回答中国教育报记者的问题时说,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周济说,中国有13亿人口,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么多的人口,素质低就是沉重的人口负担。经过29年的奋斗,我们国家已经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也已经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我们应该进一步努力,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把我们国家努力建设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

他说,在十七大报告当中,对我们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这样我们就可以建设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成为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使得广大人民群众都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二是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是我们可以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我们在这样三个方面实现了目标,就有可能建设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7-10-17





外校生鸠占鹊巢 大学更应该大气

大学是有着社会使命的公共机构，有责任向社会大众传播知识，有责任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它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而非封闭的、狭隘的。

高校扩招以后，有限的教学资源显得紧张是不争的事实。当本校学生的需求还不能完全满足时，非本校学生前来挤占资源，常会引起校方和在校学生的反感，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适当限制似乎在情理之中。比如，最近人大禁止外校学生和培训性质的学生进教学楼自习。（据《新京报》报道）

大学里“内”“外”人士因争座位引起争端的不独在人大存在，但“封校”的做法还是头一遭。此前，北科大曾经就发生过北京城市学院学生占用本校自习座位和本校学生发生斗殴的事件。我们知道，旅客依据掏钱的多少购买软卧、硬卧和硬座票，享受不同的服务且必须对号入座。那些没有卧铺票的旅客想在卧铺车厢站立片刻也会被列车员赶走。列车作为具有商业性质的交通工具，如此做无可厚非，可大学不能这样。大学之大，需要大楼，需要大师，还需要大气，要有一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和气质。大学不是商业培训机构，而是有着社会使命的公共机构，它有责任向社会大众不仅仅是在校学生传播知识，有责任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它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而非封闭的、狭隘的。

在校学生和“鸠占鹊巢”的外校学生产生了矛盾冲突，说明目前的公共教育资源依然面临着短缺的状况，但解决之道不应该是一刀切式的封校禁令。如一系列火车一个影院那样，按商业规则把那些没票的客人清走，如此做看上去是维护在校大学生的利益，但对大学生现代人格的培养未必有好处，封闭的环境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如果只希望享受开放的好处而拒绝任何开放带来的负面东西，显然不是一种成熟而理智的心态。或许是因缴纳高昂的学费，让学生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进教室自习的权利是用钱购买的，没出钱的不能染指。若是这样，校方更应该倡导一种共享、平等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像护犊子那样宠着自己的孩子。真正好学上进的人，也不至于自习座位被人占了而荒废了学业。

国外许多大学是没有围墙的，其教室、图书馆等教学资源向全社会开放，中国的一些大学值得担忧的不仅仅是校园的那堵围墙，更是一种无形的围墙使大学的精神气质显得封闭僵化，这样的环境里很难培养出大气的人物？大学的资源让社会共享，其实在上世纪初中国刚刚引进西方大学制度时就存在了，而那时候大学的资源远远少于今天。北大旁听生的轶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回忆，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到期末考试时才知道所有听课的都是没有在册的旁听生。

人大的国学院办得卓有成效，今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有复兴国学之雄心壮志的人大人，想必很熟悉孔子有教无类的理念。孔子具有仁爱之心，他的仁爱之心是开放的，而非只施于某一部分人。

来源：新京报 2007-10-18



大学变衙门，导师自然有问题

陈 愚

《中国青年报》近日进行了两项关于“读研值不值”的调查，第一项调查结果是：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研不值。第二项调查结果是：53.6%的青年学子认为读研值不值的关键在于“跟了哪个导师”，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自己的努力”和“学校的名气”。而且，在被调查者中，58.1%的人对导师太“忙”表示失望，54.6%的人不满于导师“带学生太多”，并且有51.1%的人对导师最为失望是“学术水平太低”。

由于高校文理工医差别很大，不同高校的差别也不小，所以，这一数据的有效性是必须质疑的。但是，这些数据中显示出来的是，中国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着重大问题，读研学生的时间、精力的付出，与他们在知识、人格和经济上的收益已经不成比例，因此才会出现“读研值不值”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中，导师的问题，是研究生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

当前的导师制度下的导师问题成为青年学子不满、失望的重点，是有其社会背景的。在近十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大规模升级，导致了硕导、博导的人数急速扩大，平均水平急速下降。

在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中，许许多多的二三流大学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硕士点、博士点，而在现行以核心期刊为中心的学术评价体制中，很多几近不学无术的老师靠几篇论文，从讲师慢慢熬成副教授，乃至熬成教授，并成为硕导、博导。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高校，所奉行的并非高校自治，而是仿照政府建置模式设立高校的科层结构，由此导致学术的行政化极其严重，一些官员、行政人员因“红顶”而成为“学者”，手上握着大量的资源，手下带着大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导师水平的好坏，道德水准的高低，确实对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有极大的影响。媒体不断爆出教授把研究生当廉价劳动力，导致研究生不堪重负愤然退学的新闻。当大学成为衙门，老师就成了“小老板”，而处在最底层的学生，自然变成了“廉价劳动力”。上海大学甚至制定《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职责（讨论稿）》，提出一项规定：“导师不得把研究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这样的规定，在性质上和银行门口贴出“不准抢劫银行”的告示一样，完全是《儒林外史》中绝佳的材料。

在当前，研究生教育问题，是与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用衙门的方式来办大学的时代，在一个用核心期刊作为唯一指标来评判学术能力的时代，在一个大学在官僚与市场中摇摆并且既有官僚面孔又兼商人角色的年代，许许多多奇闻怪事更迭不休地出现，是不奇怪的。前几天，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广州演讲，就发出过“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的声音。而这正是现在大学所发生的几乎一切病态的总病根。

来源：新快报 2007-10-17



高校就业率的“真实性”从何而来？

福建省人事厅、教育厅最近发出通知，决定对省属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检查评估，重点检查就业率的真实性，对于将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户口、档案关系挂靠到人才中介机构，实行人事代理并以“已就业”形式上报的学校，一经查实立即实行“一票否决”，其评估结果定为不合格。

福建省严查高校就业率真实性的做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全国范围看，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几年来，各地高校都对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工作抓得很紧，其重视的程度，比各地高中对升学率的追求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校如此，教育主管部门也是如此。2003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对毕业生就业率明显偏低的高校及专业，控制或减少招生指标。前些时候，教育部更是明确表示，对连续两年就业率不足50%的专业要严控招生规模，就业率连续3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直至停止招生。

高校对毕业生就业率格外重视，有的甚至不惜在就业率数字上弄虚作假（最常见的手法是，学校让未能就业的毕业生找一家“挂靠单位”，签一份虚假的就业协议，以此作为统计就业率的依据），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的角度看，应当与教育主管部门将就业率作为考核高校工作的一项硬指标，并具体用于调控高校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有一定关系。那么，如果教育部门取消这项硬指标，结果又会如何呢？

可以预料，由于仍然要面对招生的压力，要承受社会的评判，各高校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视将不会有所降低，但由于卸下了教育主管部门施加的压力，一些高校在就业率数字上弄虚作假的“积极性”将有所降低。而事实上，依照《高等教育法》，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上拥有办学自主权，所以，一所大学该不该设置某个学科和专业，该招收多少学生，应当由高校自己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人才市场的供需状况做出决定，而不必由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某些人为的指标来裁定。

应当看到，目前以高校上报、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汇总的方式统计生成的高校就业率，由于在统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的空间，其公信力已经受到不小的影响，不但社会对此颇有微词，连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也对一些高校表示不信任，要对他们上报的数字打假。为此，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更科学、更权威的高校就业率统计体系，由与高校和教育部门没有利益关系的审计部门、统计部门，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有关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参与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工作，以保证得出更加真实可靠、全面详尽的数据，作为公共信息向全社会公开披露，供广大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用人单位和有关方面比较、权衡。只有保证了高校就业率的真实性，社会据此对高校进行的评判、监督、“考核”才有真实的意义。

此外，这几年教育部门查处了一些高校在毕业生就业率上的造假行为，却未听说有哪个学校或院系的负责人受到了严厉惩处。此次福建省人事厅、教育厅表示，对通过人才中介机构“人事代理”虚报就业率的学校，“一经查实立即实行‘一票否决’，其评估结果定为不合格”，如果处理手段仅限于此，其惩处效果实在是值得怀疑的。

必须强调，高校在就业率问题上造假，与报刊夸大发行量、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等一样，是性质十分严重、影响十分恶劣的欺诈行为——香港一家报纸曾于1994年至1996年间伪造账目和文件，共虚报发行量过千万份，结果该报总经理被判入狱6个月，发行总监和财务经理各被判入狱4个月。对于教育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而言，现在该是认真思考“高校就业率的真实性从何而来”，并拿出切实办法保证就业率真实性的时候了。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7-10-16



细数大学生争奖学金怪现状

功利主义腐蚀象牙塔

薛冰 徐燕平 孙思颖

“你今年有没有机会拿奖学金啊？”近日，随着广州各高校 06~07 年度奖学金评比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这句话成为大学生们讨论最激烈的话题。

争夺奖学金学子失去平常心

广州各大高校奖学金评选工作进入白热化，渴望获奖的大学生们也是铆足了劲，千方百计为自己获得加分而“努力”，你争我斗中，不能不让人慨叹“功利主义”正在腐蚀象牙塔……

高校奖学金的设立在于对大学生一年学业和各种表现的鼓励。

据调查，现在高校奖学金特等奖奖金高达 5000 元，而且每个班、院系的奖学金颁发名额有硬性规定，即使一个班或者一个院系有很多同样优秀的学生，但是基于名额固定，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而且现在奖学金评选不是只靠分数评定，而是综合测评，即学业成绩测评占总成绩的 75%，综合表现测评占总成绩的 25%。因此奖学金的评比就引发了争夺者在 25% 的综合表现做文章，因为综合表现有加分环节。

在这样的情况下，奖学金评比的过程中就出现不少怪现象，诸如为拿奖学金特意去献血、用 photoshop 伪造专业论文、托熟人盖假章等等，更有甚者为了争名额反目成仇。

评比小组成员直喊“受不了”

有着 3 年奖学金评比小组经验的周同学说起多年来自己参与评奖的体会时，不断摇头。“每年评

奖时我都会特别累，因为我成了学生的出气筒和传声筒。”

“假如不小心出了点问题，学生就会在面前说个不停，还会被人说是使‘暗招’，材料审核时同学就会天天来问这个问那个，都希望能加分。”周同学说，奖学金评比那一个月，他宿舍的电话非常频繁，十有九个是找他的。“主要是很多人都在关心加分问题，总时不时找些材料问能不能加分，还有是关心对手的一些状况，对奖学金的热情非常高。”

某高校奖学金评比小组的学生则说，“这学期的奖学金评比因为班别人数的差别，名额上相差一个，为争这个名额的，班与班的班委开骂，同学与同学闹矛盾，最后还闹到学院。”

辅导员“钦定”学生倍感不公

除了学生间的不良竞争，一些高校辅导员也会参与到竞争中来。在采访时，华南某农业大学张同学反映他们的辅导员私自“钦定”获奖者。张同学说，他们的奖学金评比分两大部分：一是成绩，二是平时表现，班里 30 人有 6 到 7 人能拿到奖学金。

“成绩部分是没什么水分的，不过平时表现主观性比较强，加分也没什么细则。我们班的蔡同学成绩加平时表现在班里也只排到第 15 名。”张同学说，蔡学生一直在学校和学院的学生会工作，和老师的关系比较好。“辅导员找到了班长说蔡同学成绩好，表现好，应得奖学金，最后她从 15 名蹿到了第 6 名，主要是平时表现那有水分。”不少班里的同学出面印证了张同学的说法。

联系事件中的辅导员，但对方一直关机。

**争夺奖学金之怪现状**

**晕血女生“献血”不为公益为加分
结果 从三等奖学金升到二等奖学金
手段 献血加分**

这些天,大学城某知名高校大学生小莹心中暗暗窃喜。因为班里刚刚宣布奖学金评选情况,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二等奖,拿到1500元的奖学金。小莹说,比起其他同学,她算是幸运的,毕竟这个奖在全班30人中只有二人能拿到。而且这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得的。

原来,广州大部分高校评奖学金政策中都有义务献血加分的规定,加分的高低在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院系会有区别,不少学生为使评奖学金的加分多一些,特意跑到义务献血站献血。

小莹说,该年度的奖学金评选她本来应得三等奖学金,离二等只差0.15分。当她了解到献血可以加0.2分的时候,害怕打针晕血的她毫不犹豫地去了献血。“二等奖学金是1500元,三等奖学金是1000元,我献一次血相当于多了500元;而且二等奖学金听起来比三等奖学金好,这次献血是值得的。”

小莹说,她一直很害怕打针,也有轻微晕血,以前看到别人献血时也会有为公益献血的想法,不过最终都放弃。

除了为加分特意献血外,不少学生通过加入学生会或者社团来获取加分。在学校学生会工作了3年的陈豪说,他加入学生会说得好听点是为了自身的锻炼,不过“因为学期末能在综合测评中加10到15分”更是主因。

伪造论文博加分争奖金

**结果 获得特等奖
手段 PS造假伪装曾刊发论文**

小磊目前读大三,广州某著名高校计算机专业。他说,初评奖学金时,他和他的好朋友小L的综合分数是一样的,在班里并列第一,但是特等奖学金只有一个名额,他们两人只能有一个获得。

“因为是好朋友,我觉得谁拿都没所谓,不过我没想到我会被欺骗和背叛,那种被‘出卖’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在知道初评结果的第二天,小L就向辅导员递交了一份他作为第二作者的学术论文,于是小L很顺利获得了加分,并最终取得特等奖学金。小磊说,他知道小L发表那么高水准的专业学术论文后都替他高兴,还准备等大家有空时出去吃顿饭,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他有点难以接受。

“不久之后,我上网查资料,看到了那篇学术论文,让我惊讶的是那篇文章并没第二作者,也就是说小L欺骗了大家。”当小磊跑去询问小L时,他很快就承认是用Photoshop合成的,并恳求小磊不要去告密。“当时就有被欺骗和背叛的感觉,我一直把他当成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我没想过我的友情那么脆弱,并且败在了那几千块钱上面。”小磊说。

尽管小磊无法像以前那样和小L做朋友,但他考虑到告发后小L面临的处分,最终选择了沉默。“希望他不会有下次了。”

托关系盖章混个实践分

**结果 获得三等奖学金
手段 托关系盖章获得加分**

同样,五山路某著名高校大四学生小曾也为奖学金采取了“手段”。成绩排列全班第二名的他获奖学金原本不成问题,但却因为缺少社会实践,在分数上略低于其他几个竞争对手。

小曾说,“暑期时大部分同学都去参加社会实践,但我为了准备毕业后的考研,一直泡在图书馆里看书。”直到后来听到消息自己有可能落选,小曾才急急忙忙跑到评比小组中一位关系较好的“哥们”那去“支招”。

“哥们”叫他找间公司盖章证明他参加过社会实践。小曾立刻找父母托关系,在朋友自办的公司内开了个假证明。如今他稳稳地获得了该学年的三等奖学金。



大学生的烦恼 友情在金钱面前败得一塌糊涂

当小许知道自己拿了二等奖学金时，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评比奖学金的那个月里，小许身心疲惫，她从来没想到很要好的朋友会因为奖学金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

“阿 L 和我的成绩分别是班里的第一第二名，我们俩的其他加分都差不多，一等奖学金肯定在我和她之间产生。”评比开始后，班里一评比小组的好友就告诉小许，说阿 L 天天打电话给她询问加分情况，还说小许的一些证明材料是假的。小许说，阿 L 接下来的做法更让她有点难以接受。“她在辅导员那一再强调要审核我的资料，说我在做假，经常给班的评比人员电话打小报告。辅导员给我电话问我怎么回事，这对我人格上是绝对的侮辱。而且她在我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有时候还会在 QQ 上和我讲她不在乎奖学金。“我觉得很累，友情在金钱面前还是败得一塌糊涂！”

小许的感受或许代表了大多数参与评比的大学生的的心声。“奖学金让我看透不少人。”广州大学城网名“看破风尘”在曾在论坛发帖说。

对此，有学生在 BBS 上留下这样的话语：“每年此时，都是班里最忙碌，最‘黑’的时候……因为奖学金……大家努力了一年后，本该收获属于自己的成果，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同学，在不知不觉中玩起了阴谋，踩着别人去抢奖学金。特别严重 BS 某些学生干部……每次有通知做苦力的时候，总会拿出加分的幌子来吸引同学，而真正可以加分的活动，总是自己先报了名再通知下来，更有甚者完全隐瞒……不就那一千几百元吗，难道某些人真的看得比自己的人格更重要？？？”

学校看法 不要用功利心态去看奖学金

采访时，高校的老教师们对此颇为惊讶，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学生处老师一再表示，对此并不知情，即使有也不是普遍现象。老师们表示，大学生应该以平常心去看待奖学金问题。

广州大学学生处张老师接受采访时表示，奖学金的评比是在综合测评的基础上进行，采取测评主要是体现学生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一种客观的要求和规律。奖学金涉及到学生自身利益，但学校不赞成学生用功利的心态去对待它。“就像献血为拿奖学金，出发点就不对，是不可取的，学生在这方面不要有投机行为。同时献血这样的行为是值得鼓励，但学校不会以奖学金进行诱使，而应换一种方式去鼓励。”张老师说，奖学金是对学生学业和综合表现的鼓励，不要把它“剥”得赤裸裸，即使再怎么样需要资金也不要因为奖学金而伤害身边的人。

老师们说，事实上，在高校奖学金的评比中，有着严格的条款细则，如果按照评比细则一条条对应评选，学生是做不了手脚的，但对于一些“大体上公正，小范围的人情世故上”的做法，学校也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在发现问题后采取教育的手段予以纠正。

部分奖学金评比加分标准

在综合表现测评条例中有突出表现的会予以加分，所有的加分都要递交证明材料经过审核才能加分。

在全国、省、市、校、学院学术报刊、会议上发表或宣读论文者，国家级计 30 分，省级计 20 分，市级计 15 分，校级计 10 分，学院级计 5 分。

参加校内外组织的科技知识、学科竞赛及小制作竞赛活动的最高分成国家级、市级、校级和院级，加分最高为国家级 25 分，并逐渐递减 5 分。

参加一些专业考试如四六级、普通话考试并通过者可以加 10 分。

参加校、内外体育竞赛获奖者，国家级计 20~30 分，省级计 10~20 分，市级计 6~12 分，校级计 4~10 分，院级计 1~6 分，破纪录者按双倍分计。

一些学生干部包括学校学院学生会和班干部优秀者加 15 分，良加 10 分。

来源：信息时报 2007-10-18



经济学家温元凯：大学生在校创业九成会失败

刘辉 张志雄 刑文旭

“高考只能证明学生的考试能力，却不能证明其他能力。”日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做客武汉商贸职业学院时表示，当下大学毕业生不适应社会已成普遍现象，反映出现行高考制度急需改革。

高考造就大批能力不足的学生

有一份全国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不到 50%。与企业打交道多年，温元凯听得最多的评价是“大学生能力不够，好高骛远。”这也说明，从小到大，学生最被看重的是学习成绩，而忽略了其他能力的培养。

温元凯称，领导力、创造力、协调力、社会实践力也应该是评价学生高考成绩的四大大要素，考试分数充其量只占总成绩的 60%。他建议中国不妨借鉴西方，分数是项参考，考生的综合能力也很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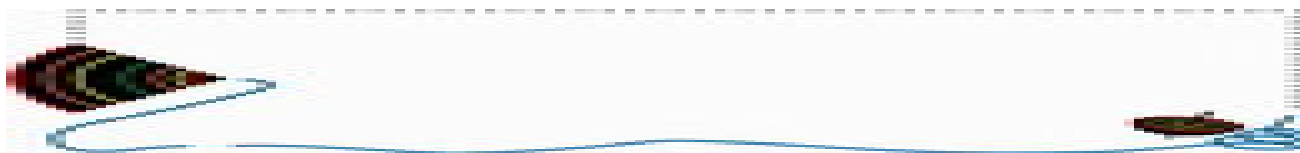
大学生在校创业九成会失败

当下大学生自主创业已成高校里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校园“小老板”也比他人更早掘得人生“第一桶金”。但温元凯对这股自主创业潮并不看好，当好的机会降临，尝试一下不是不可以，但盲目追随创业风并非好事，“大学生在校期间自主创业 90%将会失败。”

他不看好的理由是：大学生的经验、能力都不够。创业是走上社会上的事情，将来的路还长得很，不急于现在挣钱。在学校就应该珍惜青春、好好读书。大二时论文已达到讲师水平，自学并精通德、俄、英三门外语，温元凯以自己的学习经历告诉现在大学生，只有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才可能在事业上走得更远。

来源：楚天金报 2007-9-29





南大联手旅游集团 今后学生可到港澳实习

张 丽

10 月 12 日,南开大学商学院旅游学系与香港中旅集团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南开学生今后可有机会到该公司下属的内地、香港、澳门 40 余家酒店实习。

香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将按照南开大学旅游学系教学计划,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安排学生实习地点和内容,指导实习过程,并从中选拔出优秀人才。此外,双方还将在人员培训、教学科研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合作。香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还设立了“香港中旅维景奖学金”,用于奖励南开大学旅游学系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

香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是香港中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香港中旅集团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旅游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其在 80 年代中期兴建的“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大型文化旅游景区,至今仍是中國旅游主题公园的典范。南开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展旅游学教育的高校之一,旅游学系创办于 1981 年,已被世界旅游组织列入世界主要旅游教育机构名录。

香港中旅集团副总经理、香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慕韩先生表示,随着津港两地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两地旅游业界的全面合作也蓬勃发展。此次津港名校名企合作,对于推动中国旅游业发展和旅游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远教授表示,旅游学系始终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与实践双方面的教育。此次与香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作,使学生可以到中国规模最大的旅游集团中实习,对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来源:新华网 2007-10-17



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启示

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 王世华

摘要：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对社会的贡献、办学理念、师资力量、学生素质、学科建设及教育经费和资源等。其中办学理念是大学发展的灵魂，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具有改革创新、以人为本、求实崇真、使命导引、学术自由及服务社会等共同特点。这些理念特点对我国创办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一流大学，办学理念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百年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如何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笔者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提供我国创建一流大学的一点启示。

一、一流大学的内涵及其评价标准

（一）一流大学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这类问题，在教育界中众说纷纭，不同的研究专家、媒体与评估机构都从不同的角度和范围来评选一流大学，并且将他们共有的一些本质特征和形成条件，作为一流大学的内涵与评定标准。综合概括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英国《泰晤士报》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自 1986 年开始对英国大学进行评价，确定的 15 项指标分别是：入学标准，师生比例，研究、发展与咨询收入，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教授在教师中的比率，图书馆经费，政府对研究的资助，合同研究，大学提供的学生贷学金，学生人数的增加，学生住宿，研究或继续学习，一等奖获得情况，毕业率，研究生百分比。

2. 美国大学联合会（AAU）评价世界一流大学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水平方面，其中包括：竞争性联邦科研资助数量，美国国家研究院院士数量，教师队伍素质和获奖情况，研究论文的学术水平等。

3.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全美国大学进行评价，其评价指标及其权重每年都会有一些调整，但总的说来，基本包括：学校学术声誉占 25%，师资力量占 20%，财政资源占 10%，招生选择性占 20%，毕业率和新生保留率占 20%，以及校友满意率占 5% 等 6 项主要指标。

4. 香港的《亚洲新闻》对亚太地区评选最佳大学的评价指标是：学术声望占 20%，师资状况占 25%，科研成果占 20%，财政来源占 10%，学生择校占 25%，以及教师人均年薪、师生比例、教师论文人均国际刊物索引数和学生人均拥有互联网宽带端口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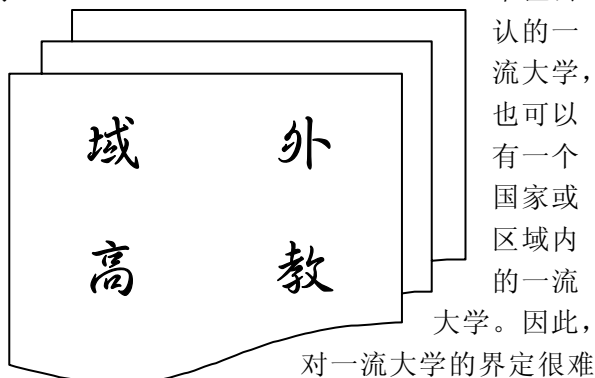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清时校长提出的“产品一流论”。他认为，大学类似于工厂，工厂的产品是一流的，我们就会说这个工厂是一流的。学校的产品是学生，如果一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普遍能取得一点成就，这样的学校就是一流的。所以评价学校是否是一流，更重要的应看

它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否普遍取得成功,能否对社会发展做出一流的贡献。

6. 香港科学技术大学的丁学良博士主张“指标一流论”。他认为评价一流大学的标准有:教员整体的素质,学生的素质,常规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等丰富程度,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师生比例,大学各硬件设施的量和质,大学的财源,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以及学校的综合声誉等。

7. 顾秉林院士提出“关键一流论”。他认为评价一流大学关键要看三点:首先要看大学是否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其次必须有一批一流大师;最后还要看是否具有影响未来学科发展的重要科研成果。

通过上述各种对“一流大学”内涵的阐释和评价标准的定位,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一流大学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都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虽然他们从不同程度对一流大学的内涵和评价标准有所反映,但对于究竟“什么是一流大学”,都还没有正面的界定,且表述都过于笼统,只给出了评价的标准。其实,关于“什么是一流大学”至今尚无公认的确切定义,而且我们也无法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一流”一词本身就是在比较研究中产生的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流总是某一范围内的一流,时代不同,一流的水准也大相径庭。”一流明显的具有发展性和历史性,那么,与它相对应的一流大学应该是在世界上或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在与其他的大学进行对比评估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从不同层面既可以



制定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而且不同的国家、机构和研究专家对它的认定也有所不同。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确也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因为判断一流大学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是由教育及科学本身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反映了一流大学的共性。因此,确立若干与其他大学,特别是教育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共性的评价标准是必要的,它主要在于大学对本民族、国家的贡献。因此,笔者将从一流大学共有的一些本质特征和形成条件来对其内涵和评价标准进行界定。

(二) 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

1. 对社会的贡献。社会贡献是指大学对人类社会的延续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大学通过履行自身职责而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的发展所起作用的综合。把社会贡献作为衡量一流大学的标准有其原因:首先,社会贡献是社会声誉的基础;其次,大学的社会贡献集中表现为大学对自身社会职责的良好履行;再次,社会贡献具有可比性,在不同大学之间可以进行社会贡献大小的比较和判断;最后,大学具有国家性和民族性,其社会贡献的比较范围最先是国家范围内的,在所在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前提。

2. 先进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大学发展远景和方向的指导原则,是大学发展的伟大构想、追求和展望,是办学者对大学的理想认识和理想追求,是办学者心目中大学的理想状态。它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为实现和保持它而努力奋斗,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具体来说,办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使命与价值观等基本发展思想的概括,是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以及内部管理运转的哲学基础。而大学办学的具体任务、机制、体制、方法乃至校训、校歌、校旗、校徽及校园布局与建筑等则是大学办学理念的外显,都受理念的无形制约,由此形成的大学传统总是有意无意地左右着大学的发展。

3. 雄厚的师资力量。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一所大学能否取得成功，能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关键在于它是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一流师资队伍。只有拥有了一流的师资队伍，才能培养出优秀杰出的人才，才能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美国教育家科南特在任哈佛大学校长时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脚，教师一定要出名。”这说明，一流大学的教师对大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 优秀的学生素质。世界一流大学都因其良好的学术声誉召唤着天下的莘莘学子，成为精英汇集的学府。对于学校来说，学生是学校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一流的学生，一流大学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一流大学一定要重视学生的选拔和培养，重点要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首先，在招生上要不拘一格，不仅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还要看学生是否具有发展潜力；要按照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来选拔学生，使人才培养独具特色。其次，在学生的培养上注重质量，同时不断增加研究生的比例。

5. 一流的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大学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学科发展水平是一所大学在国内外地位的主要标志。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一方面，它是教授们成长、活动的土壤，教授们通过学科与国内外同行建立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教师与学校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学科，教师对学科的忠诚大于对学校的忠诚。因而，只有有了一流的学科，才能更好地吸引一流的学者来校工作。

同时，也只有一流的学科，才有一流的教学。一流的教学，恰是先进理念的践行，从而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一流大学学科设置要享誉世界、形成特色。作为一流大学在具有若干个享誉世界的特色学科的同时，基础学科必须要强，而且学科门类相对要齐全。首先，要拥有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设置必须完整，形成理、工、农、医、文、史、哲、法、商等诸多学科相互交汇与综合优势明显的学科体系；其次，课程内容既能体现

高深学问，又能较好地解决现实社会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最后，要拥有几门举世公认的具有绝对优势的学科，一流大学并非要求所有学科都必须一流，但必须要有若干个一流学科。

6. 丰富的教育经费和资源。一流大学必须拥有充足的经费和优越的基础设施，比如先进的实验室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等。虽然一流的投入、一流的规模不一定能带来一流的教育产出，但是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也绝对不可能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除了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外，同时还要拥有先进的设备和充裕的科研经费，并成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另外，学校丰富的藏书也为教学研究创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为教学、科研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二、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的共同特点

办学理念是大学发展的灵魂。大学办学的具体目标、任务、体制、机制、方法，乃至校训、校歌、校旗、校徽及校园布局与建筑都无不体现着其办学理念。归纳起来，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共同特点有以下几点：

1. 求实崇真。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都追求真实、崇尚真理。例如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校训为：“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哈佛校徽上写着“真理”二字，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感，将为社会服务作为自己永恒的信条。哈佛在教学中鼓励学生的参与、探索、创造、竞争与领导精神，从而提高其能力，激发其兴趣，启迪其智慧，并最终使之在发展知识、增进理解、服务社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哈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绝非仅仅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方面，在强调社会责任感、伦理教育上也是堪称楷模的。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其教育宗旨，即校长、教授及家庭、教师应竭力教育青少年要虔诚、正义、崇尚真理、热爱祖国、人道与仁慈、勤奋与俭朴、节约与高雅等。为了履行这个宗旨，在公共基础课中专设道德伦理课程。





2. 使命导引。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创立都是有一定初衷的，正是在各自使命的引导下，大学才能得以不断地发展进步，最终形成世界一流大学。例如，耶鲁大学创立的初衷是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人才，其使命就是教育学生大有作为，并通过最丰富的思想训练与社会体验发展他们的智慧、道德、公民责任和创造能力。耶鲁大学已有 300 年的历史，它很注意并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使命。首先，它强调对学生进行人文学科的教育；其次强调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使学校服务于更广大的社会。正如查尔斯西莫校长在 1949 年耶鲁大学成立近 250 年时说：“耶鲁教育使命的核心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这就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要培养青年人在增进社区和国家福利方面作为公民的责任与服务精神。”

3. 学术自由。近代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是基于中世纪以后，教会、国家对于教育的严重干预甚至束缚而提出的，其主旨是大学内部有教学、研究、学习的自由，即教师与学生在进行有关高深知识的研究与探讨时，可以不受学术范围以外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干扰，独立解决学术领域范围内的问题。而现代学术自由的理念则产生于 19 世纪初德国，学术性大学从柏林大学以来形成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与大学自治、学术中立与科研超越社会要求的传统，它与通过陶冶教育发展个性的目标一道，不仅保证学生接受最佳的科学教育，而且能够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养成个人良好的品质。柏林大学强调“学术自由”，是与洪堡独特的知识观、学生观分不开的。洪堡认为，教授和学生“都是为了学术而在大学”，“学术自由”的保障是“教学自由”与“学习自由”，他们两者同等重要。他提出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校方针影响深远，逐渐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大学的基本制度之一，直到今天仍是全世界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所尊崇的教育理念。



4. 服务社会。现代大学的存在有两个哲学基础，一是认识论的，另一是政治论的，前者要求现代大学要“注重学

术”，后者则要求现代大学要“服务社会”。在古希腊时代，大学只是极个别贵族知识分子及其子弟进行哲学思维的场所，中世纪的大学则主要是向极少数富家子弟传授人文科学知识和绝对道德真理的圣殿。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古典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学逐渐成了推动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大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以德国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为首的新型综合大学和培养工程师的工科大学以及遍布全国的工业教育网构成了庞大完整的科技教育体系，使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并迅速取代法国，成了世界科技中心。

5.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现代大学的教育哲学观。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大学教育质量的高低，最终体现于所培养人才的素质上。培养优秀、杰出人才数量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所大学成就和知名度的标准之一。而世界一流大学的精英型人才，特别是杰出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把培养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因而，世界一流大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作为世界一流学府，牛津大学曾培养出 27 位诺贝尔奖得主，90 位皇家学会会员和大约 130 位英国科学院院士，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6. 改革创新。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它不仅能够取得创造性的甚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而且能将科技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柱。目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 80% 以上，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功不可没。近年来，东京大学为实施日本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建立了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对我国的启示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始终不渝地与时俱进，在吸纳整合别人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情，不断开拓创新，是几百年来大学沿革



变迁的动力,也是我国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的必由之路。

1.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以世界为背景,又要以“一流”为目标。大学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的过程必然要实现国际化。在这种态势下,世界文化教育的发展,总是和各国文化教育的交流相随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交流就难以发展,这已为世界各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民族特色的关系,处理好“面向世界”与“服务祖国”的关系,通过不断增强国际化意识,参照它国的成功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之路。同时,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一流”为目标。通过创建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产生一流的科技成果,在文化、思想等方面对世界产生影响,并且带动其他大学的发展,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整体达到高水平。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将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中国乃至世界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2.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注重学术质量的提高,又要服务于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学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通过学术研究产生思想文化和科技成果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社会组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每年一度的最佳大学排行榜的评估指标中,“学术声誉”一项占总分的 25%。大学既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同时又是高新技术的辐射源、生长点,是创新的策源地,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依托。因此,我国的大学,特别是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重点大学要采取多种形式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当今大学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的大学不应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引导人类社会财富创造的“火车头”,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支撑点。

3.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追求真善美,又要不断改革创新。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中

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不断追求真、善、美。同时,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逼近对大学提出了较 20 世纪更高的知识、人才、责任和其他方面的要求;科技进步、技术发明和人才成长的多渠道,又使大学面临较之以往更为严峻的生存竞争。如何在更具挑战性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和发展大学传统的知识领袖和人才库、思想库的作用,对各大学来说,都是更加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面向未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努力探索 21 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路子,在改革中发展,在创新中发展。

4.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以人才培养为载体,又要以未来发展为方向。能否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是一所大学是否达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首要标志。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的大学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强化以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高尚品德人格为核心的素质教育观念,树立多样化的质量观和人才观;要确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牢固地把一切为了学生作为工作的基点,把培养学生、促进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作为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未来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于带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对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把握未来科技与教育发展方向,借鉴发达国家人才培养机制的优点和经验,抓紧转换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

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很难创建一流大学,这是历史所揭示的一条重要结论。正在创建一流大学和热情关心创建一流大学的我国人士,充分认识这条重要结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的特殊国情给我们高等教育界带来了一个特殊的不足,即轻视高等教育理论和办学理念的指导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和必要。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07 年第 9 期

